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季刊）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主管主办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发行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4—1496/C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671—6949
地 址：广州市三元里大道 99 号
邮 码：510400
电 话：(020) 26297022、26297033
电子邮箱：gdsy_xbbjb@gd.gov.cn、
2001xb@126.com
出版日期：2023 年 4 月 18 日
设计排版：广州市天河彩佳印刷厂
印刷单位：广州市天河彩佳印刷厂
定 价：15.00 元

本刊编委会

名誉主任 李 心

主 任 吴显标

副 主 任 鲁开垠 潘 清 杨应棉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邓爱霞 冯颖红 吴显标

张 山 杨应棉 林少红

郑 锋 戚志恒 鲁开垠

潘 清

主 编 潘 清

副 主 编 张 山

编辑部

主 任 张 山

副 主 任 余 伟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共同凝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黄备粮, 麻伟峰, 李龙斌 (05)
- 牢牢把握好五项重大原则 提振前进道路上的五颗心 林洁纯 (11)
- 深刻领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 加强社会主义学院机关党的建设 孙振天 (1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从科学到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基础与实践创新 张 颖 (20)

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

- 试论新中国初年业绩辉煌的成因——以民族(国家)凝聚核心体的嬗变为视角 刘 娟 (26)

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

-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农民形象建构的统战价值 何燕青 (32)
- 熊雄对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历史贡献及当代启示 钟恢万, 万佳佳, 晨 铭 (38)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

-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差异研究 韩世龙 (44)

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研究

- 大统战工作格局下推进海归小镇建设研究 张彩云 (49)

声明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交流渠道,本刊现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不再另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研究

- 港澳回归后推行国家历史教育现状的比较研究.....曹艺凡,刘敏(56)
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视野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冯颖红,张山,陈童敏,杜联藩(62)
十九世纪晚期香港海港检疫制度述论.....周晓杰(69)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

-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逻辑理路探析.....路浩轩(77)

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

- “全过程人民民主”下基层政协工作的迭代升级——基于浙江县域“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实践的分析.....弓晋(84)
人民政协制度功能转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内在逻辑.....王丽(90)

民族宗教工作研究

- 我国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困境挑战及实践路径·张琛琪,刘继荣(96)

中华文化研究

- 关于推进广州市文旅融合发展的研究报告——以“保护开发东江纵队抢救香港文化名人历史遗迹”为例.....谭国骥(102)
从弘扬革命文化视域传承黄学增革命精神.....俞娟(108)

Main Contents

Deeply Study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Jointly Consolidating the Magnificent Power of Unity and Struggle.....	Huang Beiliang, Ma Weifeng, Li Longbing (05)
Firmly grasp the Five Major Principles and boost the Five Hearts on the Way Forward.....	Lin Chunjie (11)
Deeply understand the major deployment of adher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comprehensively enforcing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n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Socialist Academy.....	Sun Zhentian(15)
From science to practic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Xi Jinp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Zhang Ying(20)
On the Causes of th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in the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ore Body of National Cohesion.....	Liu Juan (26)
The United Front Value of Constructing the Image of New Farmer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e Yanqing (32)
Xiong Xiong'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United Front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Zhong Huiwan, Wan Jiajia, Chen Ming(38)
A Study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and Western Competitiv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Han Shilong (44)
Research o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Overseas Returned Towns under the Pattern of United Front Work.....	Zhang Caiyun(49)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mplementing National History Education after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and Macao.....	Cao Yifan, Liu Min(56)
A Study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United Fro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Feng Yinghong, Zhang Shan, Chen Tongmin, Du Lianfan(62)
On the Quarantine System of Hong Kong's Seaport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Zhou Xiaojie(69)
An Analysis of the Logical Path of Leading New Social Strata with Socialist Core Values.....	Lu Haoxuan (77)
Iterative Upgrade of Grassroot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Work under the "Whole 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Gong Jin(84)
The Internal Logic of Transforming the System Function of th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Wang Li(90)
The Value Implications, Difficulties, Challenges, and Practical Paths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mong Cross border Ethnic Groups in China.....	Zhang Chenqi, Liu Jirong(96)
Research Report on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Guangzhou City – Taking "Protecting and Developing the Dongjiang Column to Rescue Hong Kong Cultural Celebrities and Historical Relics" as an Example.....	Tan Guojian(102)
Inheriting Huang Xuezheng's Revolutionary Spir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moting Revolutionary Culture...	Yu Juan(10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共同凝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黄备粮，麻伟峰，李龙斌

(中共广州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广东 广州 510055)

摘要：“团结奋斗”是贯穿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主题词。大会的主题，鲜明地提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系统阐述“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并以“团结奋斗”四个字铿锵结语。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生动形象地指明团结奋斗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必须深刻认识团结奋斗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共同履行团结奋斗的实践特色，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凝聚起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关键词：党的二十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奋斗；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D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49(2023)02-0005-06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团结奋斗”是贯穿其中的主题词。大会的主题，鲜明地提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报告系统阐述“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并以“团结奋斗”四个字铿锵结语。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再次强调，“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生动形象地指明团结奋斗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

一、深刻认识团结奋斗的重大意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也是贯穿党的百年奋斗的鲜明主题。党的二十大立足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方位，深刻分析了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和挑战，全面部署了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力量源于团结、事业成于奋斗，只有团结才能赢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只有奋斗才会取得一次又一次伟大的成功。

(一)“团结奋斗”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民族在

收稿日期：2023-03-03

作者简介：黄备粮（1978-），男，籍贯湖南，广州市委统战部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机关党建、统战理论政策；麻伟峰（1983-），男，籍贯广东，广州市委统战部研究室四级主调研员，主要研究方向：机关党建、港澳工作；李龙斌（1990-），男，籍贯广东，广州市委统战部研究室二级主任科员，主要研究方向：统战理论政策、民营经济发展。

共同的奋斗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优良传统,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团结奋斗的价值理念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早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初始阶段,传说中的黄帝就以“会盟合符”的形式,把各个部族统一了起来,形成早期形式的民族共同体。历史各个时期,关于团结的思想数不胜数,《周易·系辞》中,就有“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一说。这些宝贵思想,为中国人注入了团结的民族基因。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团结奋斗”的精神存在,中国人民往往能想世人之所不敢想、为世人之所不敢为。

从实践来看,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中国人的团结奋斗史。中华文明作为世界所有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连绵几千年发展至今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之间尽管有分有合、有战有和,但主流始终是团结,反对和抵制分裂、渴望和维护统一,成为了民族思想的深层精神追求和内在价值尺度。每当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劫难时刻,中华民族“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意识就会迸发出来,依靠团结奋斗同内忧外患作坚决的斗争,捍卫了民族独立和尊严,书写了革新图强、共御外侮的壮丽史诗。

（二）“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标识。

综观古今中外,我们党是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先进政治力量,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我们党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这种远大的志向和抱负赋予了共产党人团结一心、顽强拼搏的强大动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以团结救国。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强调革命斗争过程中党和人民的团结与奋斗,要求“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提出了“争取和团结群众”“以斗争求团结”“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等重要论断。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勇往直前、浴血奋战,先后历经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推动中国实现从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到建立人民当家作主国家政权的历史性转变。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以团结兴国。这一时期,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我们党主动完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初步形成党领导国家工作的各项制度,党的纯洁、团结和纪律得到了维护。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指出,“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同时,党高度重视领导人民团结奋斗,要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增进人民团结。由此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崭新征程,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党的执政根基不断稳固,社会主义中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以团结富国。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历程的重要转折点,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党重新确立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被列为“实现四化的四个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我们党围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的奋斗目标,领导人民牢牢把握改革开放带来的宝贵机遇,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用数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困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以团结强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概述5年来党和国家工作的基础上,以“3”+“16”+“4”的结构,全面回顾总结了新时代10年伟大成就、伟大变革。3件大事彪炳史册,16个方面工作成就非凡卓绝,4个里程碑意义启迪未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新时代的伟大成就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三）“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创造14亿多人的幸福美好生活绝非易事，必须深刻地领会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的精神实质和时代价值，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

这是由宏伟的目标所决定的。百年来，几代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砥砺前行，向历史交出了优异答卷。今天，党团结带领人民踏上新的赶考之路，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愈来愈清晰。“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目标，就越是处于吃劲阶段，就越需要慎终如始，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只有咬定青山不放松，始终保持团结的状态、奋进的姿态，才能跑出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好成绩。

这是由艰巨的任务所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与西方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我们还有大量的改革难题、发展课题、矛盾问题需要破解，任务极其艰巨，难度世所罕见。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把14亿多中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地激发出来、凝聚起来，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才能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

这是由复杂的形势所决定的。从国际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影响深远，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各种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等威胁加剧，敌对势力处心积虑地阻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从国内看，形势环境变化之快、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只有广泛凝聚智慧力量，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用团结奋斗筑起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挑战的铜墙铁壁，才能打赢各类遭遇战、攻坚战和持久战。

二、准确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

围绕明确奋斗目标形成的团结是最牢固的团

结，依靠紧密团结进行的奋斗是最有力的奋斗。新征程上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需要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团结奋斗才会有主心骨；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才能夯实团结奋进的根基；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汇聚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一）新时代的团结奋斗，最根本的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两个确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最重大的政治判断、最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最确凿的历史结论，是时代、历史、人民的共同选择、郑重选择和必然选择。实践充分证明，对“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认识得越全面、把握得越深刻，我们发展的前景就越光明，对前途命运的掌握就越主动，团结奋斗的动力就越强劲。从百年党史来看，每到紧要关头、每临严峻考验，只有党的领导核心才能带领全党力挽狂澜，推动党和人民事业破浪前行。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之所以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核心点就是因为这次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面临形势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肩负任务的繁重性和艰巨性世所罕见。正是因为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全党才有了顶梁柱，14亿多中国人民才有了主心骨；正是因为有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才有了行动上的“指南针”、前进路上的“启明星”。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党的团结统一是党和人民前途和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只有在

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才能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更加自觉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确保全党全国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

（二）新时代的团结奋斗，最关键的是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永远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辽沈战役的胜利，是东北人民全力支援拼出来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这就是最深刻、最朴实的结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造福亿万人民群众的宏伟事业，同样是需要亿万人民群众为之付出辛劳和智慧的光荣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有着丰富的本质内涵和强烈的实践要求。

一是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我们要守好这个江山，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是坚持依靠人民不断取得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前进，正是因为依靠了人民；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只要紧紧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我们就一定能够使最

广大的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不断创造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三是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三）新时代的团结奋斗，最重要的是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儿女大团结。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

实践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要充分发挥党的先锋队作用，也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特别是当前，国际局势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显著增多，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更加繁重，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度调整，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频繁。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

新时代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人民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需要深刻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统一战线提出的新要求，坚持做到国内统战和国际统战相统一、国内团结和国际团结相统一。既要促进“五大关系”和谐，实现中华儿女大团结；也要秉持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理念，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人民大团结；既要维护好、实现好、

发展好包括所有同盟者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同时也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目标的指引下,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等制度体系,善于用制度促进大团结大联合。

三、共同履行团结奋斗的实践特色

团结奋斗,彰显着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担当,既要深刻认识团结奋斗的重大意义,也要准确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更要共同履行团结奋斗的实践特色。

(一)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意志和行动。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科学理论就像一面旗帜,旗帜立起来了,团结奋斗才有了目标和方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系统全面、内涵丰富、逻辑严密、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只有用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团结奋斗才能把准正确方向、夯实思想根基、激发内在动力。坚持用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指引团结奋斗的正确方向,持续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牢固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进一步巩固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坚持用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激发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切身体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真挚为民情怀、高度历史自信、无畏担当精神,筑牢信仰之基、把稳思想之舵、补足精神之钙,为团结奋斗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坚持用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破解团结奋斗的困惑难题,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想问题、办事情、抓工作的根本遵循,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的能力,用以消除认识上的困惑,破解工作中的难题。

(二) 坚持紧紧依靠人民团结奋斗。新征程上,能否牢牢掌握历史主动,团结奋斗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于能否以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让老百姓体会到“党始终在人民群众身边”。真正做到“无时不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共产党就是给人民办事的”。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更加需要我们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秉承“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真心做到“无处不在”。“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只有与人民群众坐在同一条板凳上,才能缩短心与心的距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加需要我们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驰而不息、久久为功。真情做到“无微不至”。“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对民之关切,时时在线、事事关心,把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当作自己的头等大事,主动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和期待,用实际行动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点赞和认同。

(三) 坚持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靠团结而兴。”统一战线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最大程度地汇聚起各方的智慧和力量。我们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凝聚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共襄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合力。构建完善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带头参加统一战线重要活动,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各部门各单位增强统战意识,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创造性地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共同把党外人士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深刻理解“三个更加重要”的重要论断,自觉摒弃统一战线过时论、统战对象上层论、统战工作无关论、统战成果装饰论、统战活动麻烦论等模糊和错误的思想认识,充分调动党政、群团、社会组织等方方面面的资源力量,切实形成全党上下一齐动手、有关方面协同联动的工作局面。积极为

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履职尽责、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搭建平台,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作用,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参考文献:

- [1] 丁薛祥. 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 2022-11-2.
- [2]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学习问答[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12.
- [3]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21.1.
- [4] 人民日报社论: 团结一心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EB/OL].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22/0304/c1003-32365546.html>.
- [5] 人民日报评论员: 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EB/OL].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22/0805/c1003-32494869.html>.
- [6] 人民日报评论员: 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EB/OL].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22/0803/c1003-32492654.html>.
- [7] 吴显标.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统战新篇章”[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s).
- [8] 潘清.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推动实现中华儿女大团结[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s).

【责任编辑: 张山】

牢牢把握好五项重大原则 提振前进道路上的五颗心

林洁纯

(潮州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潮州 521000)

摘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鲜明指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以下重大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这五个方面的重大原则,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针对性,对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把握;重大原则;前进道路上;政治自觉;

中图分类号: D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2-0011-04

牢牢把握前进道路上的重大原则,体现了百年大党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历史自信,彰显我们党强烈的责任担当和深厚的人民情怀,既是我们面临战略机遇、经受风险挑战,战胜重大考验的关键,也是不断推进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的根本遵循。

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让坚强核心领航掌舵凝聚人心

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来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和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党和国家事业就健

康发展。什么时候弱化和偏离党的领导,党和国家事业就遭遇挫折。党的历史充分表明,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一个全党高度拥戴的领导核心,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1]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2]事实证明,无论是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现在努力

收稿日期: 2022-11-10

作者简介: 林洁纯(1985-),女,潮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副科长。

奋斗的新时代，确立核心，自觉拥护核心，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才能不断走向胜利。党是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始终是全国人民可以依靠的核心力量。今天，我们党拥有 9600 多万名党员、490 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在前进的道路上，必须做到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切实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到行动上，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牢牢把握党的全面领导这一关键及根本，在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上，用更加具体、实在、有效的措施落实到位，实现“全方位”“全过程”“全领域”“全覆盖”，让党的领导更加适应实践、体现时代、贴近人民，更好凝聚起党和人民的力量，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人间正道越走越好振奋人心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道路问题直接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这是我们党在百年奋斗中，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出来并被实践证明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回顾历史，这条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来之不易。在古老的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开辟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为了找到能够救国兴国的道路，无数仁人志士进行艰辛探索，不仅他们先后作出的很多尝试和努力都宣告失败，而且未能扭转中华民族的命运，改变中国积贫积弱面貌，最后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前途命运。唯独党和人民领导下的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苦难中创造辉煌，在挫折中砥砺前行，在转折中开创新局，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奋斗目标，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支持的正确道路。回首来路，党正确的道路留下了“不忘初心”的车辙，昂

首阔步的姿势滴下“牢记使命”的汗珠，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发展之道，成功之道。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在我们国家，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其他道路能引领国家进步、增进民生福祉、实现伟大复兴。无论形势和任务如何变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重大考验，必须坚持道不变、志不改，坚定不移走好走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发展成果惠及人民守住人心

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深刻总结。^[3]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4]我们党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才改变了国家和人民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据统计，“从 1921 年到 1949 年，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有名可查的烈士多达 370 多万人”；和平建设时期，哪里有困难和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譬如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近 400 名党员、干部为抗击疫情献出了宝贵生命”，在“脱贫攻坚战中，1800 多名党员、干部将生命定格在脱贫攻坚征程上”。^[5]党的百年发展史，就是党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我们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实现社会生产力跨越发展，以人民的高品质生活诠释了发展的核心要义。进入新时代，一幅幅事关人民幸福生活的锦绣画卷徐徐展开，我们的发展，体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上一个都不能少；呈现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救治病患不惜一切代价，展现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映照在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上的一系列开创性举措上。以实际行动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信念融进党的血液，成为党员干部代代传承的独特基因。踏上新时代新征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比以往更加的强烈，民生领域需求日益复杂多元，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繁重。树立和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意味着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至上放到心中至高无上的位置，在创新中增进民生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协调中解决各种差距，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在绿色中赢得可持续发展，培育人民群众高质量生活新增长点；在开放中加强发展内外联动，让人民群众更多分享经济全球化红利；在共享中把握发展方向，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充分保障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更加自觉地以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四、坚持深化改革开放，让高质量发展谱新篇触动人心

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历史，是我们党带领人民群众开创科学发展之路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一次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深刻改变世界发展进程，丰富人类文明形态。从社会发展历史看，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显著提升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大势，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我国经济从 2013 年到 2021 年，总体保持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 30% 左右，稳居世界第一，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2021 年中国人均 GDP 达到了 12556.3 美元，遥遥领先全球许多个国家、地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三期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等背景下，取得这样的成绩，保持综合国力持续提升，相当不容易。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我们更加坚定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中华民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从整个世界历史看，进步需要改革开放。改革就是内部改革、外面开放。^[6]1500 年，当时的中国瓷器远销欧洲，深受欢迎，中国明朝海上力量

强大，但却因“海禁政策”，失去在世界海洋时代的一席之地，这个教训十分深刻，“明朝陷阱”不能重蹈覆辙。今天，在前进的道路上，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也要持之以恒用好改革开放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不竭动力，为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保障，以更加昂扬的姿态为“中国奇迹”积蓄深厚力量。

五、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深入人心

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是党长期执政的核心品质。党发展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不是强调单向的阶级对抗，而是蕴含着丰富的辩证发展逻辑，即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的创新实践以理论的守正与创新为前提，使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得到发扬、在追求本领的涵养与强化中得到传承、在意识形态引领和争论中得以巩固。^[7]坚持和发扬斗争精神，在党领导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百年社会变迁、中心任务转换、改革目标实现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党百年奋斗中经受住各方面大考的重要精神支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精神武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斗争是多方面的，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都需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8]为了维护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长期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巨大成就，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篇章，必须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一方面，主动在国际局势中找准定位，以主动斗争作为有力抓手，运用斗争智慧审时度势，乘势而上，主动求变，为中国发展道路赢得更加美好的未来。另一方面，激发党员领导干部深刻把握新时代斗争规律、提高斗争本领，在新时代新征程筑牢底线思维，凝聚在伟大实践中勇担责任、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的共识，切实推动民生领域斗争精神以点带面促进建设全局发展，把增强斗争精神作为新时代党提高执政本领的具体体现，通过勤学苦练强化斗争本领，实现对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的传承与追

求，增强新时代新征程运筹帷幄谋篇布局的底气和信心。

参考文献：

- [1][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01）.
- [3][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53.
- [5]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N].人民日报，2021-8-27.
- [6] 郑永年.大趋势：中国下一步[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580.
- [7] 曹洪滔，林常青.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的辩证逻辑与实践价值[J].岭南学刊，2022，（3）.
- [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28.

【责任编辑：余伟】

深刻领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加强社会主义学院机关党的建设

孙振天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社会主义学院是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门, 肩负着统一战线的人才培养、理论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等重要职责, 要深刻领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 坚决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争做“三个表率”, 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关键词: 党的领导; 从严治党; 社会主义学院; 党的二十大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2-0015-05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前进道路上, 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全党必须牢记,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绝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 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些重要要求, 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清醒和信念, 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意志和决心。社会主义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 是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的主阵地, 是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门, 肩负着统一战线的人才培养、理论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等重要职责, 必须坚决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推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 争做“三个表率”, 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一、深刻理解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部署的时代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 “打铁必须自身硬。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党, 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新时代历史大势, 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历史主动, 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共产党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就和实践成果, 具有重大时代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收稿日期: 2023-01-03

作者简介: 孙振天 (1988-), 男, 籍贯安徽,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办公室干部, 主要研究方向: 机关党建。

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根本保障,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回顾党的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 leadership 核心,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引领者。新时代,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前进的本质要求和根本政治保证。

(二)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传承党的优良传统的内在要求

党的全面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中国共产党治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以及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对从严治党提出了一系列思想举措,形成了从严治党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把管党治党推向了全新的高度,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新时代,必须一以贯之地传承党的优良传统,始终如一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

(三)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是坚守党的初心使命、确保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必然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

由之路”的重大论断。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把党的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使我们党始终如一地坚守初心使命,保持崇高政治使命、远大政治理想、纯洁政治品质。走进新时代、踏上新征程,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更加艰巨繁重、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更加严峻多变,同时,“四种危险”具有尖锐性和反复性,党内“七个有之”具有破坏性,要战胜发展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避免腐败、作风等问题反弹回潮、故态复发,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横发展,确保党始终坚守初心使命,确保党永葆生机活力。

(四)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的重要政治保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进入新时代,面对统一战线时和势、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发生的某些重大变化,统一战线要发挥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做好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增进政治共识,画好同心圆,把最广泛力量团结凝聚到党中央周围,形成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共同奋斗的力量,就必须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坚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政治圆心,这是不能动摇的政治底线。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的重要政治保证。作为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把准教学培训、理论研究的政治方向,把党外干部培养教育成为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的新时代党外干部,因此,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是社会主义学院的首要政治任务。

二、准确把握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和辩证统一关系

党的全面领导,“全面”是指党领导一切,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部门或单位都必须坚定坚持党的领导;“领导”是指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必须始终坚持党总览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

位。“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就是管党治党的范围覆盖党的建设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级党组织及全体党员；“从严”就是坚持严的主基调，把严的要求、严的标准、严的措施、严的查处贯穿于管党治党的全过程；“治党”就是要敢管敢治、真管真治、长管长治，强调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以及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责任。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两个重大现实课题，两者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一）党的全面领导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任务与制度保证

党的全面领导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目标。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旨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通过完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制定和落实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来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的领导、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采取了一系列有效举措，实现了“管党治党宽松软”向“管党治党严实硬”的跨越，党的领导显著增强。

党的全面领导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保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党各项事业顺利开展的制度保证和力量来源，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在党的全面领导下进行，才能确保正确方向、凝聚磅礴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切实保证，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有力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各项重大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

（二）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和主要抓手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党的全面领导离不开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建设必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管党治党，为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奠定自身基础，使党的领导这一根本领导制度的作用得以更好

地发挥，为持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供根本保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要以自我革命精神使党永葆青春活力，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党内政治生活等来强化党的领导。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全面领导的主要抓手。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的建设是加强党的领导的主要阵地，全面从严治党是管党治党的重要方式，全面从严治党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物质载体、实践空间和主要抓手。另外，以全面从严治党保证党的全面领导，是由权力与责任相对应的领导学基本原理决定的，各级党组织对经济社会文化事务有更多的领导职权，相应地也要承担更多更大的责任，为此也需要以从严治党为政治保证。

（三）党的全面领导与全面从严治党有机统一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党的全面领导与全面从严治党都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都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都是管党治党的重大战略部署，两者在内容和要求上互为一致、相互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管党治党的新举措，比如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强化政治监督，开展政治巡视，提高党员领导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对党忠诚、听党指挥、为党尽责；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等。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这些重大举措上相互贯通、互为一致、有机统一，也正是由于两者措施的一贯性、一致性、统一性，才促使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更加科学、规范、有效。

三、坚决落实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

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部署，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基本要求，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应长期坚持的根本遵循。社会主义学院要结合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任务要求，紧扣单位工作实际，坚决贯彻落实好党的

二十大作出的重大部署。

（一）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政治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在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肃，要害在治”。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坚持“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以党的政治建设确保正确政治方向、形成强大政治合力。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社会主义学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批示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工作中的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要情况要及时向党的各级组织请示报告；机关各部门、各单位要维护院党组在本单位的领导地位，自觉报告重大工作和重大问题；并在课堂教学上、理论研究上做好宣传、教育、引领，教育党外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

（二）把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相结合作为牢固基础。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事业的力量源泉、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只有把理想信念这个无形力量和党组织体系这个有形力量结合，才能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打牢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社院党组织要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继续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引导党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领导力和思想引领力；要强化党组织的组织力，把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及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重要方式，认真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谈心谈话等制度，以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来保持党组织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三）把党的制度建设作为长远之策。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和修订了一系列党的规章制度，构建科学严密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管党治党体系进一步完善，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了科学制度保障。社院党组织及全体党员必须认真学习贯彻党的规章制度，坚持对标对表，持续加强自身建设。要贯彻执行党的建设制度，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纲，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党支部工作条例》等制度为准绳，推进党组织建设，筑牢坚强战斗堡垒；要贯彻执行党关于本领域的相关工作制度，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等工作指导性文件作为开展工作的根本遵循、作为评价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尺；要贯彻执行党的纪律制度，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为行为准则，牢记规矩守住纪律，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四）把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作为治本之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作风问题和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必须把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任务来抓。社院党组织及纪委要履行党建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有纪必执、有违必查；要发挥巡视巡察的“政治体检”作用，用好问责利器，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要以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为突破口，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问题，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入推进“庸懒散拖”专项教育整治；要坚持领导党员干部带头，院党组从上至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形成上行下效的联动辐射效应，为杜绝腐败、改进工作作风树立榜样。

（五）把用好、选好党员领导干部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是党员干部的“领头雁”“带头人”，直接引领、引导着广大党员干部这个“大多数”。要充分发挥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及各级党组织负责人管党治党的关键作用，让他们切实履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要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发现、培养、使用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严格按照“好干部”“优秀党员”标准选拔培养优秀党员领导干部，真正地把好干部好党员选任在重要岗位上，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思想政治过硬、品学兼优、讲政治、懂政策的教师队伍，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新的历史起点上，社会主义学院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深刻领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加强机关党的建设，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应有之力。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2021年版）[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2] 盖逸馨.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依据与实践维度[J].科学社会主义，2020(4).
- [3] 本报评论员.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重要讲话精神[N].人民日报，2021-01-26.
- [4] 曹永森，袁航.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的基本内容、核心要义与精神实质[J].学习论坛，2020(12).
- [5] 胡志远，胡顺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特征及实践逻辑[J].理论导刊，2020(2).
- [6] 何旗.习近平关于从严监督“关键少数”重要论述的科学意蕴[J].行政论坛，2021(1).
- [7] 张士海，董敏.“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全面从严治党”专题教学论[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2022(2).
- [8] 王可卿.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百年历程、主要成就与基本经验[J].湖南社会科学，2022(1).
- [9] 叶华.认真贯彻全面从严治党，从严选人用人管人[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1).
- [10]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http://cpc.people.com.cn/20th/n1/2022/1025/c448334-32551580.html>.
- [11] 余湘.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基本经验之哲学阐释[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03).

【责任编辑：张山】

从科学到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理论基础与实践创新

张 颖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30)

摘 要：生态文明建设关系民生福祉、民族生存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从国家、全球生态发展两个全局角度深刻地回答了“何以必然的历史演变逻辑”“何以科学的生态文明理论基础”“何以践行生态文明实践创新”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一系列关于生态的重要理论与实践的阐述构成了完整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党和国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关键词：生态文明；理论基础；实践创新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49(2023)02-0020-05

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1]生态文明建设关系民生福祉、民族生存大计。中国共产党在坚定推进变革性实践中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其中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使得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从国家、全球生态发展两个全局角度深刻回答了“何以必然的历史演变逻辑”“何以科学的生态文明思想基础”“何以践行生态文明实践创新”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科学到践行建构形成了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一、何以必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历史演变逻辑

生态文明需遵循良性的自然规律与社会演变才能达成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积极成果形态，反之，违背规律的资源无度开发必然导致严重的生态问题。可以说，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一个国家城市化进程及工业化程度的推进息息相关。随着我国进入重工业阶段，并大力推进城市化城镇化发展，资源环境不断成为经济发展的代价，两者间的矛盾越发严重。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过度消耗与浪费的基础上，为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就必须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只要是“全球 500 强”就可以开绿灯，地方政府只管政绩，决然忽视环保承诺，甚至不惜放弃环境标准。粗放型发展不仅导致成本风险的增加，而且意

收稿日期：2023-04-09

作者简介：张颖（1979-），女，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研究方向：政治学。

味着资源环境的透支。中国共产党早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了当前环境形势和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要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问题；在党的十六大中强调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党的十七大认为，生态问题是一个关乎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问题，经济的增长付出的资源成本代价过大。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在经济发展中仍面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严峻现实。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3]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指出资源环境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这是首次阐述和部署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思路。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指出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2017年中央经济会议中，指出在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方面取得扎实进展；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指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是接续2011年以来，召开七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后的大会，也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召开的生态环境大会，会议对生态环境形势做出了“稳中向好趋势”的判断。在2022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中，提出了重点抓好有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思想。纵观生态文明发展进程，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的十年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发生了根本性、开创性的调整变化，不仅生态环境持续好转，而且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开始入脑入心，坚持生态文明观推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体现在其会议精神中，更产生于实践工作中。习近平总书记早年在陕北梁家河当知青时，他就带领百姓为改善生态，打坝造田，自费去四川学习沼气池的建设，学成归来在梁家河建立了第一口沼气池，用沼气这一可再生新能源代替传统不可再生的柴火，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尊重与维护生态秩序的原初生态观。在河北正定任县委书记时，他认识到粗放型经济对生态资源和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巨大破坏，制订了《正定县

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提出“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严格防止污染搬家、污染下乡”的政策，如此鲜明的主张表达了其对突破传统发展的决心，具有极强的生态意识前瞻性。在福建宁德从政时，他鼓励宁德开创绿色工程，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的生态发展思路。在浙江主政的六年间，面对浙江高速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他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生态思想，2015年这一战略思想被正式写入中央文件中，成为和谐共生绿色生态文明发展的根本思想。从生态理论思想出发到治国理政的实践经历，从完整的顶层设计到严密的制度建构形成了体系完善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大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

二、何以科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建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深厚的理论指引，不仅充分汲取了中华传统生态哲学价值观，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现代性创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阐发的内涵规律成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南。

（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价值观的传统哲学思考

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的经典诗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4]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5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这一讲话体现了其生态文明思想中所蕴含的深厚哲学智慧。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均在其典籍中阐发了尊重自然，尊重规律的文化理念，其丰富的生态思想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文化土壤。中国哲学中“主客合一”即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生态思想，

这种哲学思想表现在文化上便是“天人合一”。儒家倡导和合共生的万物观。儒家首先认为“天地生万物”，所以孔子讲“仁者爱人”、“成己成物”；孟子提出了“仁民爱物”的命题，均是认为要将爱物等同于仁民，如果对民众要仁爱的话，那么对待万物也应仁爱。宋明理学家进一步以“万物一体”为原则阐述了仁的核心要义，程颢在“仁”的内涵中指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即人与物的不差等才是真正的仁。再者，儒家认为“天地生人”，因此，人并非万物的统治者，而是自然界的产物，所以对待大自然应是保持着有如《周易》所言的父母关系，“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除了把大自然比拟成父母相亲的关系，还有将大自然看待成兄弟姐妹一般者，宋儒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物吾与也”的观点，将万物当成人类的同类。从儒家观点来看，无论是对人或是对物，都以仁爱待之，这不仅是为人处世的准则，也是对待大自然的道德标准。儒家还将环境保护与仁人志士结合起来，将爱护环境者提升到君子德行的标准。孔子劝君要仁民、爱人、乐山、乐水，认为“知者乐山，仁者乐水”，在孔子看来，“知者”，“仁者”都是德行甚高之人，他将“乐山乐水”与“仁人志士”结合起来作为培养理想君子的道德标准，将生态文明教育有机融入人伦道德中。道家明确提出“道法自然”的观点，老子曾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作为老子思想的精髓，“自然”乃天地万物运行规律，只有遵行自然法则的规律，才能返璞于本源。庄子在《齐物论》中道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观点，认为人类应顺应自然，人与天地万物应和谐共处，以此免除物我之别，才能融与天地万物之间。

中国古代先贤在其哲学观点中多有谈及自然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张合理利用、节制开发的自然规律。荀子在《荀子·王制》篇中道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鸛鼃、鱼鳖、鳅鱖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

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这是荀子关于圣人之治下的天人关系的论述，认为动植物有其生长发育的规律和过程，主张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吕氏春秋·孝行览·义赏》中的“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藪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则从反面论述了水干则无鱼，林灭则无兽的自然规律，揭示了人与自然应保持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关系。中华文明中的生态人文情怀对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无疑是一剂良药，展示了中华生态文明智慧的现代价值。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辩证关系的思想论述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观的阐述较早地揭示了生态发展的本质特性，自然规律，指出生态文明作为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产物，不仅是一个环境保护问题，更是一个可持续发展问题。马克思通过总结各个时期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演变来重新审视人和自然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体。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大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生活资料，而且还给人类提供生产资料，自然界就是人的“无机身体”，是人的生命不至于死亡而必须与之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场所。^[5]人类时刻都处在与大自然的互动中，自然是人类之根，只有互动才能互长，善待大自然实则就是回馈自我，两者相辅相成。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6]。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规律出发论证了两者的关系，一方面自然界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源泉，有大自然馈赠才有人类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人类要珍惜生存空间，需要节制欲望，过度消费自然必然破坏自然生态平衡。恩格斯曾用自然报复法警示人类不要陶醉于人定胜天的自信之中，因为大自然会反过来报复人类对其的摧残。所以，人类在劳作中要遵循自然规律，要着眼长远性，要自觉地将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统一起来，如果只是着眼于短期利益，人类将为之付出惨痛的代价。对于破坏生态环境的危害，习近平总书记一阵见血地指出要严守红线，绝不手

软。在2016年参加青海代表团的审议中他提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人类在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发展的前景，如果无节制地掠夺自然，自然也会给予惩罚，如果合理利用自然，自然才会回报人类，这是恒古不变的人类与自然发展的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观的重要判断来揭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自然规律，得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7]”的文明定论，揭示了人与自然共存的内在有机联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与自然认知的新境界。

三、何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发展创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人与自然观的中国思考，赓续且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考的新内涵；同时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与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求间平衡的重要体现；更是中国生态话语权的世界呈现，为人类现代化进程提供中国新范式。

（一）全人类视角阐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是一个民族锐意进取精神的情感表达，也是世界生态文明新样态的崭新呈现。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然观的论述从民族和世界两个视角出发，赋予了其崭新的时代新内涵。其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然观是民族奋斗精神的伟大体现。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精神财富是各民族人民一直追求的优秀品格。“精神所以是这种力量，乃是因为它敢于面对面地正视否定的东西”^[8]。在生态文明新家园的构建中，需要发扬自古传承的伟大奋斗精神。生态文明家园既是物质层面的意义，更是精神层面的体现，它与经济相辅相成，为人类生活质量的改变发挥作用，同样也激励鼓舞人类思想面貌的改善，充盈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其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然观以中国特色的理念与发展实

践向世界传递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生态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个全球性的问题，任何国家均无法回避此问题。在“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9]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0]习近平总书记用极富哲理性的中国式话语“两山论”呼应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绿色生产力理论，揭示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富涵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话语的生态发展观奠定其在世界生态文明体系中的时代地位。

（二）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民生观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主旨，坚定不移地走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发展之路。在建设生态文明与增进民生福祉双向生成关系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历史唯物观和群众史观出发，将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作为生态思想的前提和根本，以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根本目标，将人民群众是否有幸福感作为判断生态文明建设成败的标准，体现了人民性的特征。在实现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中，以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定位标准，以改善民生凝聚民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最终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顶层设计与发展好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权益间协同联动机制，有效地将生态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治理效能。在生态与民生的关系中，习近平总书记系统论证了两者间的密切联系，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环境就是民生”；“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这些重要论述旨在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需求，认为不仅经济是为民生服务的，生态也是服务于民生的，这正是对民生工作的积极回应。在生态与人的关系问题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还强调要善于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生态利益上的矛盾，建立科学生态

补偿机制,保障人民在环境受损中的利益,构建和谐的人类社会。在发展与民生关系问题上,强调发展应当解决好“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如何评价发展”^[1]四个基本问题。在什么是发展的问题上,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发展的核心,在为什么要发展的问题上,新发展阶段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怎样发展的问题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应以有序新型的高质量发展观摒弃粗放型发展模式;在如何界定发展标准的问题上,始终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是否达成了协调发展作为重要标尺。

(三) 谋求生态文明发展的共赢全球观

习近平既重视国内的生态治理问题,也积极投身全球环境治理,强调中国治理之道在国际治理中的作用,阐述如何携手国际社会探索可持续的发展治理道路。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从“重要参与者”到“贡献者”再到“引领者”的转变体现了中国在探索建设美丽中国进程的角色转化:从积极参与全球环境的治理者,到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自信贡献者,再到为全球生态观提供中国方案的引领者。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各国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在环境保护领域厘清责任分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提出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应保持“共同但有区别”的环境正义原则。也就是说,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12],每个国家都有责任肩负起承担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和义务,但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在绿色低碳发展与消除贫困之间的衔接问题,这就要求发达国家在不带任何政治附加条件下要力所能及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与财政支持,在引导规范其经济发展出路的同时,实现发展中国家践行全球环境治理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责任担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共谋全球生态文明

建设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环境挑战中构筑绿色发展的生态屏障,既充满着人文关怀,又充盈着对发展中国家环境发展权的捍卫,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的大国情怀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国际话语权。

结语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阐述生态文明理论,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双向统一文明论,在尊重自然顺应规律的生态思想与经济生产力理论中寻求文明新范式,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从中国传统生态价值观中寻求文化理念,形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国家内生性生态文化价值观,是中华传统生态文明的时代拓展与创新。在生态全球观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张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民生为价值导向,以环境正义为价值诉求,以合作共赢为价值根本,协调民族国家之间的生态利益矛盾,实现全球共同发展繁荣和全球环境治理的共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生态治国理政的经验总结与行动指南,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新视角,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新样态。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J].求是, 2022(21).
- [2] 新华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释放四大新信号(2018.05.20)[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5/20/c_1122857971.htm.
- [3] 肖小爱.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138-140.
- [4]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

- 学习一览(2013.05.25)[EB/OL]. <http://dangjian.people.com.cn/n/2013/0525/c117092-21614776.html>.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74-375.
- [6] 习近平.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 [7]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231.
- [8]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上卷)[M], 商务印书馆, 2017:138.
-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306.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23.
- [11] 习近平.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22.
-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364.

【责任编辑：陈童敏】

试论新中国初年业绩辉煌的成因

——以民族（国家）凝聚核心体的嬗变为视角

刘 娟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摘 要：新中国初年辉煌业绩的成因，与各族各界人民的凝心聚力、团结奋斗密不可分。但是，最为根本、牵动全局的成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得以正式登上中国政坛的中心，充分履行执政党亦即民族（国家）凝聚核心体的职能。否则，各族各界人民便难以告别旧中国“一盘散沙”的状况，更无从在短时期内创造出共和国的辉煌。因此，深化认知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来由和要义，有助于各族各界人民进一步凝聚在党的周围，进而与时俱进，再造复兴民族的新辉煌。

关键词：共产党；新中国；凝聚力；核心体

中图分类号：C95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49(2023)02-0026-06

本文定义的新中国初年，起自新中国宣告成立的 1949 年 10 月，止于“一五”计划圆满实现的 1957 年。这期间新中国创造的辉煌业绩，固然是各族人民、各行各业协同努力的结果，但引导各族人民告别“一盘散沙”、紧密团结奋斗、共创共和国辉煌的核心力量，则是众望所归的中国共产党。因此，在追寻民族复兴之梦的当下，有必要回望旧中国人心涣散、国败民衰的状况，追踪共产党步向凝聚民族（国家）核心体地位的艰难历程，展示新中国初年的辉煌业绩，以期准确地把握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相向演进的运动轨迹，有效地提炼强化党的建设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有益经验，进而加快推进实现“中国梦”的进程。

—

新中国初年的中华民族凝聚力，脱胎于它的“前世”即旧中国的凝聚力。旧中国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状态如何？一言以蔽之：散沙一盘，无足观瞻。

1917 年，孙中山曾这样设问：作为世界“至大

至优”的中华民族，为何不能像近邻日本那样成就“富强之国家”？在他看来原因无他，乃在于“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以至于“四万万之众等如一盘散沙”。^[1]当然，“一盘散沙”还只是形象之说，人们还难以从中认知“人心涣散”和“民力不结”的严重程度，再者，孙中山也没有全盘否认国人的内聚能力和凝聚形式。那么，旧中国国人凝聚状态究竟如何？孙中山后来又做了一次较为具体的概括。1924 年他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时说：中国“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2]在孙中山看来，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的团结力虽不失为内涵相近、大小有异的凝聚力量，但仍然改变不了“一盘散沙”的状况。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家族宗族的凝聚力，还不是确切意义上的民族凝聚力，它们的团结力其实只能凝结成颗粒较大、形体各异的“散沙”而已，这类散沙对于其他沙粒而言，并没有什么天然的胶粘性。至于孙中山所说国族团结力，显然是他梦寐以求的民族国家的凝聚力。那么，如何获得民族或曰民族

收稿日期：2023-03-25

作者简介：刘娟（1984-），女，广东德庆人，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实践。

国家的凝聚力？他的方案是改造“散沙”。他曾这样设想：倘若在“一盘散沙”中拌入“土敏土”（水泥），则可望获得坚如磐石的“国族团结力”，并且，凭借这种无可估量巨大能力，中华民族可望走出积贫积弱的困境，步上民族复兴的前途。然而，他耗尽了毕生精力，仍未找到配制这种“土敏土”的有效配方，因而也留下了令人扼腕的遗憾。

旧中国的“一盘散沙”并非仅仅是静态的存在，更多地表现为动态的存在。一旦“散沙”呈现出非理性的躁动，便必然要发生相互之间的摩擦、碰撞，乃至造成争斗仇杀、生灵涂炭、社会动荡的乱象。旧中国屡见不鲜的宗族械斗，屡有所闻的黑帮火拼，就是这类非理性动态的表现。当然，这类乱象也不是全无制约。一般来说，国家在“大一统”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即为制约乱象的最高权威。所以，旧中国在尚称“大一统”清王朝的治下，还在某种程度上保有制约冲突的机制，一旦王朝垮台，最高权威陷于真空或半真空，各种非理性的冲突和乱象，便必然要像山洪暴发那样狂泻而下。民国年间层出不穷的军阀混战，正是在清王朝业已正寝、民国新秩序将立未立的特殊时期泛滥成灾的。

1916年，随着袁世凯称帝丑剧的败亡，军阀混战就开始为害中华。袁世凯本为北洋三军的最高统领，他的死去就其部属而言，失去的只是无时不在的约束，得到的却是分头并起的机会。北洋军阀各派系正是这样抢先登台的。由于当时中国处于明显的南北对垒之中，所以，北洋军阀主要还是以南方军阀为打击对象。应该看到，这时的民国虽仍貌似最高权威，却早已被腐朽势力蛀成了一块空招牌，无从履行制约北南军阀冲突的职能，致使国家处于无止无休的动荡之中。

继北洋军阀后，登台表演的是国民党新军阀。1927年10月开打的李、唐之战，揭开了潘多拉魔盒之盖。在这场混战中，交战的一方是新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把持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另一方是拥兵十余万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冲突的结果是前者得势，后者败北。紧接着，又有1928年2月发生的蒋、桂、冯、阎四家联手北攻奉系军阀张作霖之战，1929年为争夺在华中统治地位的蒋、桂之战，同年发生的蒋（介石）冯（玉

祥）之战等……。据统计，仅在1927到1930年间，国民党新军阀大规模的混战就不下6次，战祸遍及大半个中国，死亡人数达50万上下。^[3]

无需赘述，中国共产党从问世的第一天起，面对的不仅是涣散不聚的“一盘散沙”，更有军阀混战的连天炮火；中华民族非但未获得足资观瞻的“国族”团结力，更未摆脱战祸频仍、社会动荡的灾难。可以想见，在旧中国积重难返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即便取得执政地位，但要在短暂的六七年就创造出辉煌的业绩，仍然是难以想象的愿景。

二

时下，新中国初年创造的辉煌业绩，早已成不争的事实；人们也大体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即那些业绩是“前因”演绎的逻辑结果。诚然，因果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但是，简单的因果推论却不免有失之笼统之嫌，人们也难以从中发现要领，即导致事物变化的主因。这是因为，所谓“前因”包罗万象，就社会关系而言，几乎与新中国成立前各社会群体的动向相关；就国家领域而言，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变化均概莫能外。那么，究竟何者是最为根本、牵动全局的前因？必须断言，最为根本的前因，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历经历史和人民的双重选择，渐次走向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获得了凝聚各族人民以建立新中国的领导核心体地位。

核心体地位所以是根本，是由民族（国家）凝聚力的结构决定的。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其凝聚力结构均可以做这样的分解：即民族（国家）的核心体释放的吸引力、核心外群体回应核心体的向心力，以及核心外群体之间的亲和力和。亦即是说，民族（国家）凝聚力是由吸引力、向心力、亲和力三者叠加合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核心体，系指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领导者，它具有代表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的职能，其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与全社会利益群体的整合休戚相关。所谓的核心外群体，则包括核心体以外的所有社会群体，如社会的各个民族、阶级、阶层、政党、社团等等。可见，只有当核心体在确切意义上代表民

族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才能兼得吸引力、向心力和亲和力,才能维系和强化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反之亦然。

至此,一个核心体“易位”或曰“更迭”的重大问题,便不能不突了出来。难道共产党问世以前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一片空白?难道前此的中华民族及其国家的核心体处于缺位状态?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古代中国的唐宗宋祖及其官权体系,都是曾经的核心体,并且也都维系着与那个时代相应的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凝聚力;近代中国的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也曾短暂地充当过这样的核心体,维系过相应的凝聚力。那么,历史和人民为什么要将核心体的接力棒,辗转递交给中国共产党?这就需要通过考察近代中国的国情,特别是阶级关系变动的情况来获取合理的答案。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由于这一基本国情,近代中国得以产生前所未有的阶级关系大变动,即社会在原有地主、农民这两大阶级的基础上,产生了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新阶级。由于并存的四个阶级均须彰显本阶级的意志,从而决定了四者均存在“问鼎”或“固守”民族(国家)核心体地位的取向。于是,与古代的改朝换代不同,近代的“问鼎”和“固守”的运动,便不能不更为复杂、更加频繁地展现出来。在此,不妨依旧、新阶级的先后表现来考察“问鼎”和“固守”运动的走势。

农民阶级可以洪秀全为代表。他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这一运动的目的,就是要颠覆并取代清政府的核心体地位。所以,洪秀全慨然宣称,要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地上天国。^[4]洪秀全不失为凝聚民众的高手,以至于通过“拜上帝会”,将众多的农民凝聚在自己周围,进而还获得过雄踞半壁江山和定都天京的巨大成功。然而,洪秀全所代表的毕竟是农民小生产者,农民小生产者毕竟不能抵制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皇权主义的思想束缚。所以,洪秀全及其同道,终究不能兑现那套曾经令人激动的说教,不能长久地凝聚广大的追随者,致使旨在“问鼎”的努力归于失败。

这表明,近代以降,中国的农民阶级及其代表,不可能获取民族(国家)核心体的地位。

地主阶级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如果说洪秀全是试图问鼎民族(国家)核心体地位的“夺位”者,那么她则是冥顽不化的“守位”者。在慈禧治下,晚清政府每况愈下,迅速堕落成了“洋人的朝廷”,她那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5]更表明她和她的统治集团甘愿死心塌地地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完全丧失了作为民族(国家)核心体本应具有的功能,即维系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功能,因而,必然要受到凝聚力发展规律的惩罚,最终步向坟墓。也就是说,慈禧及其统治集团既然完全代表不了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利益,那么,便无从释放吸引力,无从获得向心力,只能遭遇离心力。所以,一场辛亥革命终于使清政府在众叛亲离之中走到了尽头。虽然,清朝垮台后,还出现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闹剧,但在确切意义上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再也不能在中华大地上起死回生。这表明,近代以降,中国的地主阶级及其代表无力“守位”,也不能重温改朝换代的旧梦,只能吞下告别民族(国家)核心体地位的苦果。

既然传统中国唯二的农民、地主两大阶级及其代表,再也不能与民族(国家)核心体结缘,那么,与之结缘的只能是近代中国唯二的新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二个阶级通常都要通过“结党”的形式来彰显自身意志,所以,与核心体结缘者,通常表现为这两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及其政党。不言而喻,结缘的走势怎样,最终何者胜出,仍然取决于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略早于民族资产阶级,但从政党政治的视角看,较早登上历史前台者,却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孙中山及其革命党是为典型。虽然,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定名于1919年,但其源头可以上溯到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乃至1894年成立的兴中会。孙中山不愧为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和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忠实代表。早在兴中会宣言中,他就锁定了凝聚国人以“振兴中华”的奋斗目标。^[6]他领导的同盟会,更赢得过凝聚人民推翻清朝和创立民国的丰功伟绩。因此,他和他的党也理所当然地为历史和人民所肯定,一度被推

上民族（国家）核心体的地位。1912年元旦，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即是一个雄辩的明证。在临时大总统任上，孙中山慨然宣示：“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7]这不能不是中国政坛上前所未有的千古一奇变。

然而，南京临时政府昙花一现，仅仅存在了短短的三个月，孙中山就被迫在重压下颁布了《临时大总统解职令》。这意味着，孙中山及其革命党只是“临时”地品尝过核心体地位的滋味。随后，篡夺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竟然在北京摇身一变为民国“正式”大总统。不过，袁世凯及其同道好景不长，也未能“长期”与核心体地位结缘。由于那场由袁世凯自导自演的称帝丑剧太过拙劣，不能不遭到国人的断然否定，以至于袁世凯在做过83天“皇帝梦”后，就在举国上下的一片唾骂声中死于非命。

袁世凯之死，使得中国的政坛更加风云诡谲。一时间，代表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的核心体再度陷于似“有”还“无”、似“实”还“虚”的尴尬状态。所幸的是，孙中山及其革命党屡扑屡起，仍坚持开展“护国”“护法”等一系列斗争，他们在南方组建的革命政权，仍然给民族和国家带来了一线希望。于是，核心体的天秤，也理所当然地再次倾向了孙中山及其革命党。正因为此，诞生未久的中国共产党，同样理性地选择了孙中山及其革命党，并且坦然地伸出了合作之手，于1924年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然而，希望很快又被失望所代替。随着1925年孙中山的逝世，1927年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惨遭杀害，第一次“国共合作”归于失败。这样的事实表明，国民党右派远不可与孙中山经营的国民党相提并论，业已蜕变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而非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

虽然，蒋介石及其同党盘踞要津，执掌国民政府大政，但是，这并不意味他们的地位稳固不摇。随着国民党劣迹的不断暴露和共产党风貌的不断展示，历史和人民必将对国共两党进行新的审视，做出新的判断，作出新的选择。选择的依据是，谁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脊梁，谁在真诚地追求和平民主的

新中国，谁能成就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振兴中华”的伟业。毫无疑义，历史和人民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就必须进一步分辨国共两党各自的行为，尤其是事涉民族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表现：

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既断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同时也断送了大革命的前途。这是背信弃义、倒行逆施。

1937年，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慨然捐弃前嫌，推出《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进而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催生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得到全社会的充分肯定，获得各族各界人民强烈而积极的反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迎来了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新契机，共产党相机而动，无惧风险，通过艰难的谈判，与国民党政府达成了《双十协定》。这个协定内含共产党的两大建国主张，即“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国家建设必须“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8]这些主张再次带来了建设和平民主新中国的希望，受到各族各界的欢迎和赞扬。

1946年，蒋介石及其党徒再次背信弃义，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并于当年6月点燃战火，发动了对中原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这一坚持独裁、反对民主、发动内战的行径，引发全社会的严正声讨和全民族的强烈反对。

……

无需赘述，无论就是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而言，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均不可与共产党争长论短，更不可与共产党争辉比肩。有基于是，历史和人民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判断，即足以代表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者，只能是共产党，而非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足以胜任凝聚民族（国家）核心体者，也只能是共产党及其政权，而非国民党及其反动政府。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自以为得计，其实无异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至于被历史和人民迅速押上被告席。这也预示：蒋介石及其反动政府行将从核心体的高台重重摔下；共产党及其盟友则行将步履稳健地登上民族（国家）核心体的圣坛。事实上，在解放战争中，燃起内战战火的蒋介石及其国民党，面临的只能是人心思散、众叛亲离的“化分”现象，终于

落了个泪别南京总统府和败退南隅台湾岛的下场；毛泽东及其共产党，面临的则是得道多助、众望所归的“化合”现象，终于历尽艰辛，不负重望，赢得了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的辉煌。

三

1949年10月1日，当新生的共和国宣成立之时，标志着一个崭新的时代业已到来，新质的凝聚民族（国家）的核心体正式面世，新型的民族凝聚格局崭露风貌。正因为此，在新中国初年的六七年间，各族各界人民得以迸发出空前强劲的凝聚力，创造了惊世骇俗的辉煌业绩。

新质的核心体，正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的中央人民政府。共产党从问世的第一天起，就忠诚地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奋斗，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身的根本宗旨，因而，在由革命党转而为执政党的历史结点，兼具既秉持革命初心、又实践执政为民的双重优长，最有资格站在历史的制高点指导时代潮流，最有能力将黑暗的旧中国引向光明。正是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精心设计和积极筹备，具有新质的国家最高权威——中央人民政府得以应运而生。

首届中央人民政府一经面世，就以其鲜明的联合政府性质令人耳目一新。当选的国家主席，为众望所归的毛泽东；在6位副主席中，即有党外人士宋庆龄、李济琛、张澜3人；在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党外人士占27位，几近总数之半。值得强调的是，党外人士实职安排的占比同样耀眼。在国务院4名副总理中占比50%，有郭沫若、黄炎培2人；在15名政务委员中占比60%，有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等9人；在30名部、会、院、署、行的正职领导人中占比43%，有朱学范、李书城、梁希等13人，其中水利部长是前国民革命军将领、抗日名将、追求进步的国民党成员傅作义，司法部长是著名法学家、政治家、女权活动家史良。^[9]显然，联合政府的筹建，彰显了共产党在建政之初那种自信、豁达、坦荡、包容的襟怀。联合政府的优长，在于社会各大群体都能在政府中找到自身的代表，这有利于方方面面以国家认同为基础，合力结束旧

中国的分裂，合力消弥旧社会的矛盾，合力打造各族人民和谐共处的新家园，合力建设来之不易的新中国。

建设新中国的蓝图，是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共同纲领》，其内容包括：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改变中国人民受压迫的地位，使之“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发动农民群众”实施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民族团结的行为”；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10]无论如何估计，《共同纲领》都不失为一种放大器，将使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释放的吸引力、社会各群体回应党和政府的向心力、社会各群体相互之间的亲和力，都空前强劲地迸发出来，进而汇成建设新中国的强大动力。正因为此，新中国得以在短短的六七年间，就创造出了众口交誉的辉煌业绩：

1950年，重开新一轮土地改革运动，运动两年后结束，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的任务基本告成，获得了中国最大的利益群体——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

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大陆得以彻底解放和完全统一，新中国业已在确切意义上成为各族人民团结友爱的大家庭。

1952年底，以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头目和反动党团骨干为重点的镇反运动基本完成，为新中国的建设扫清了阻力和障碍；国民经济经3年努力，得以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工农业总产值达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11]有效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1953年7月，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打败了世界头号帝国主义，赢得了抗美援朝的重大胜利，极

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1954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刚性的制度保障。

1956年，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铺平了道路。

1957年，提前超额完成国民经济“一五”计划的建设任务，为新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展现了新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光辉前途。

综上所述，可以断言，在新中国初年，如无共产党的领导，各族各界人民便难以释放出如此强劲的凝聚力，难以创造出如此辉煌的业绩；同样可以断言，唯有共产党担纲承梁，力任凝聚民族（国家）的核心体，中华民族和各界人民才能进一步凝心聚力，与时俱进，创造出民族复兴的新辉煌。

参考文献：

- [1] 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412.
- [2] 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185.
- [3] 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M].北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720.
- [4] 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M].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321.
- [5]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42.
- [6] 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19.
- [7] 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220.
- [8] 双十协定. <https://baike.so.com/doc/2191199-2318487.html>.
- [9] 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组建[EB/OL]. <http://www.teyuan.org/Html/News/2011/0110/189.htm>.
- [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EB/OL]. <https://wenku.so.com/d/33b21268acc808b325fb001622a2765f>.
- [11] 建国初期概况[EB/OL].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71685490.html>.

【责任编辑：温开照】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农民形象建构的统战价值

何燕青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 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农民是巩固政权、维护统一战线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构了新农民形象, 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旧农民”向“新农民”的转变。新农民形象的建构, 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 以社会主义改造实践为依托, 以《人民日报》等媒介为载体, 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 增强了农民对社会主义新政权的认同, 极大地促进了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农民形象的建构对新时代中华儿女大团结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初期; 农民形象; 建构; 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2-0032-06

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国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大变动、大改组时期, 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的任务十分繁重和艰巨。建立一条包括全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建设新中国, 显得十分重要。农民群众是政权巩固、经济建设和统一战线维护的重要力量, 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推进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稳步发展, 都离不开农民的支持。因此, 建构新农民形象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主体地位的彰显、统一战线的维护和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具有重要作用, 文章着眼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报道中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形象的新变化, 比较农民“新”“旧”两种形象的变化, 揭示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统一战线中的新形象, 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以为新时代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 巩固爱国统一战线提供可借鉴意义。

一、旧中国的农民形象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 在兵灾匪祸频繁、内外忧患接踵而至的险恶环境中, 近代中国乡村满目苍痍, 亿万农民陷于生活绝境, 处于极度赤贫状态。国民党统治时期, 广大农民仍一贫如洗, 挣扎在生死线上。因而, 旧中国农民呈现出“备受剥削压迫”“极端贫苦”等消极形象。但农民不失本性“淳朴”“节俭”“厚道”的积极形象, 致使旧农民在不堪压迫情形下, 奋勇联合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从而又展现出“团结革命”的形象。

(一) 被剥削被压迫者的悲惨形象

随着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 中国农民在遭受几千年封建剥削和压迫之后, 又饱受帝国主义的蹂躏和屈辱, 成为被命运捉弄的最大受害者。

民国以后, 农民负担大大加重, 大批土地掌握

收稿日期: 2022-09-26

作者简介: 何燕青(1994-), 女, 汉族, 广西贺州人,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少数地主手中，农民沦为佃农或雇农。如“江苏昆山，自耕农由1905年的26.0%减至1924年的8.3%；而佃农则由1905年的57.4%增至1924年的77.6%。又如湖北西部，1920年前与1921年后对比，自耕农由45%减至10%，佃农由15%增至45%，农业劳动者由10%增至45%。”^[1]不仅如此，田赋附加税更是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在收入难以足额交租的情况下，旧中国农民必须借贷交租。从而导致旧中国农民深受高利贷的压迫，1946年延安《解放日报》报道“广东增城的高利贷苛重，现行高利贷，贷出本额一万元，日息一百六十五元，以十日为一期，期满不清还，连本带利算贷出一万一千六百五十元，再十日不还，即由此累增。”^[2]深受着外国、督军、警吏、土豪、大田主等四五重压迫的中国农民，生活苦不堪言。面对如此高昂的赋税负担，佃户终年辛劳，全无休息。生活毫无保障，呈现出“备受剥削压迫”“饥寒交迫”等悲惨形象。

（二）愚、穷、弱、私的落后形象

近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激变，中国传统社会分崩离析。中国人尤其是大多数的农民显得更为衰老、腐朽、钝滞、麻木。晏阳初将此时中国农民形象的呈现概括为“愚”“穷”“弱”“私”。

“愚”即目不识丁。1933年定县“全县7岁及以上的人口约330300人，其中识字者占17%，推算数目约5.6万人；文盲占83%，推算数目约27.4万人。”^[3]所谓穷，在封建制度下，旧中国农民的生活谈不上温饱，更谈不上生活水平。“农家能吃上小米山药的为上等人家，有干菜杂粮做‘菜粥’吃的为中等人家，连盐也吃不起的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4]因此，农民不仅不能满足温饱且债务丛集，如牛负重。所谓弱，由于农民经济力量的薄弱和卫生常识的缺乏，因而农民的健康毫无保障。所谓私，旧中国农民从来一盘散沙，无团结合作意识。而旧中国农民呈现“自私”“麻木”“不易团结革命”等形象与当时历史背景有关。陈独秀曾指出：“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移避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5]尽管如此，毛泽东依旧认为“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6]这说明旧

中国的农民也有积极的形象，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言：“他们都是穷人，心地善良，殷勤好客。”^[7]诚然，旧中国农民也具有心地善良、淳朴、积极的一面。

（三）造反精神与革命精神兼具的双重形象

尽管旧中国农民呈现“被剥削被压迫”“愚昧”“劳苦”等形象。但恩格斯认为，农民被压迫到极致也会有其叛逆精神和勇敢的一面，会同无产阶级联合，使无产阶级发展到更高阶段，向资产阶级宣战。恩格斯意识到农民联合其他阶级的必要性，认为农民的强大力量不可忽视，农民“只有同其他阶级结合成联盟才有胜利的机会”^[8]。马克思认为这种联合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可缺少的“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9]这说明，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依靠统一战线战略才能取得成功。深受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农民蕴含着强烈的革命动力，兼具“造反性”与“革命性”的双重形象。

辛亥革命前，1851年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力图推翻清王朝统治；1895年海丰农民洪亚重号召数千人众，在海丰暴动，到处抢掠。其蕴含和表现出的抗争力量是巨大的，农民由于其阶级局限性，强大的内在力量缺乏理性引导，农民的抗争甚至是起义无法提升为理性的革命运动。因此，旧中国农民抗争成功者甚微。这也说明，单靠农民阶级自身的力量，没有一个包括全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革命就不能胜利。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部分地区逐渐成立农会，农民开始有组织有理论地开展斗争，北伐战争前后开始显现出变化，农民的抗争融入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被人指为睡觉的中国农民，现在已经开始醒悟，开始组织自己的团体，并且准备自己的武装，向六种蹂躏者反抗了。”^[10]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组织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联合战线，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农民运动的有双重性：“好得很”和“糟得很”，毛泽东称赞农民运动“好的很”，“完全没什么糟”，

其认为农民是“革命先锋”的形象,但不可否认,由于发展过于“迅猛异常”,必然会对社会财富、物质资源、文明成果乃至社会生产力造成破坏,因而,旧中国农民起义和斗争具有盲目“反动性”。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农民形象建构的主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农民形象的建构,以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为指导,以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为佐证、以《人民日报》等媒介为载体,着力凸显政治觉悟高、经济上翻了身、积极生产、文化进步的新农民形象,以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一) 政治觉悟高的新农民形象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是农业合作化的主体,是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为了改造农民中的小农意识,解决农民阶级的个体性、保守性、涣散性等问题,毛泽东亲自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经过土地改革,部分贫农、雇农经过斗争的锻炼,政治觉悟大大提高,纷纷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从而巩固了爱国统一战线。

1950年9月,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燃及我国东北。为维护国家安全,中国决定抗美援朝。1951年11月,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中国农民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在爱国统一战线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农民踊跃缴纳公粮、积极参军,是农民爱国的实际行动表现,也体现出农民高度的政治觉悟。遭受美机扫射、轰炸的辽宁农民,提出“准备最好的粮食,献给国家,保卫祖国”的口号。^[11]农民为支援抗美援朝,竭力捐款捐物,河南新乡县杨兴村一个村捐赠人民币78.4万元,小米221斤,小麦291斤,玉子288斤,棉花55斤。^[12]不仅如此,广大农村妇女热烈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从而普遍提高了政治觉悟。农村妇女以踊跃缴纳公粮、多种爱国棉、多种爱国粮等实际行动来支持抗美援朝。如河南许昌的农村妇女提出增产一成,郑州的农村妇女提出

每亩多打十斤麦子来支援前线。^[13]同时,在劳动模范的带头作用下,各地各族农民群众争做交粮模范。1951年全国深入普及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高潮,“务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这种爱国教育,都能积极参加这个爱国行动。”^[14]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建构了农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热爱祖国的新农民形象,也展现出政治觉悟高新农民形象,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政权的巩固奠定了群众基础。

(二) 积极生产的新农民形象

旧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并借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90%的贫农、雇农、中农以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约20%至30%的土地,他们终年劳动,不得温饱。^[15]为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解放农村生产力,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生产运动中涌现出很多劳动模范,《人民日报》在报道中凸显农民“积极生产”“互助合作”“爱国增产”的新形象,农村呈现一片新气象。

农民分得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后,生产情绪特别高涨。1951年华东地区土地改革后,农村呈现一片积极生产的劳动场景。从土地改革运动中站起来的农民,正积极地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各地农民都认为,土地改革后,他们是“分了地、出了气、翻了身、见了天”。不仅如此,农村对二流子进行思想教育,二流子、懒汉改造成了好劳动,如新疆莎车区1950年有二流子、流氓等6193人参加劳动^[16]。

“劳动光荣、懒汉可耻”已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道德标准。翻身获得土地的农民通过辛勤劳动,一改受压迫的旧形象,释放出巨大生产积极性,涌现出如李顺达、史春奎、弓维周、池万库、李河旺、申纪兰等一大批生产模范。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中对农民“积极生产”等形象报道近93篇,如《瀛海庄农民积极生产加紧锄麦准备种棉》^[17]《旅大市郊区农民渔民积极生产》^[18]等报道建构了农民积极生产、热爱劳动的模范典型,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生产模范的建构,鼓舞了农民投入生产热潮、积极生产,同时互助合作的高潮也提高了农民对文

化生活的需求。

（三）文化进步的新农民形象

在旧社会里，农民深受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长期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全国5.5亿总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农民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19]1950年9月，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确立工农教育的基本任务是：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1952年9月和12月，中共中央相继发出《关于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和《关于扫除文盲运动的补充指示》，从此全国范围，特别是农村地区掀起“人人下地带本书，户户传来读书声”的识字、扫盲高潮。

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区一些城市扫盲运动初见成效，如旅顺全市半数文盲，学会运用简单文字；山东莘县有二十个村已基本上扫除了青年中的文盲；北京市郊区有一万五千多农民领到了扫盲学习毕业证书；1950年，全国农村冬学人数为2500万人，1951年为3500万人，1952年为4855万人^[20]。在文化进步中，典型能起到引领作用，由此《人民日报》十分注重对进步典型集体的报道。如《农民业余学校的典型，左权丈八村民校是怎样办好的》讲述山西左权丈八村的农民学校“经义务教员杜振武同志的努力，成为全省的模范民校之一。”^[21]此外，各地开办业余学校，北方一些大型工厂开办业余学校，中南地区也创办工农速成中学^[22]，这种农民学校不仅不耽误农民劳动生产，还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在识字运动中，农民采取多样方式进行学习，如山西农民的“地头读报”，合作社通过订阅《人民日报》《山西日报》《山西农民报》《华北人民》《时事手册》《青年妇女杂志》等报刊加强农民文化教育，农民每十一人有一份报纸^[22]，工厂的“车间学校”、妇女的“坑头学习小组”，将更多迫切要求学习文化的人组织起来，体现了农民积极向学的精神。在文化进步的新中国农村里，农民创造了一种新的智慧的语言，像“反映”“群众路线”“劳动观点”“劳动动力”“好劳动”“搞生产”“生产运动”“检讨检讨”“带头作用”“有组织有领导”“大封建小封建”“反恶霸”“斗争”“诉苦”“阶级成份”“贫

雇立场”“基本群众”“积极分子”“领导干部”“革命就是打仗！”“土地改革就是和地主们开火！”^[23]这些革命话语反映了农村实际情况，同时也反映了农民群众在文化进步过程中，其思想与意志得以深化融合于中国现实发展与话语体系建构。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农民形象建构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要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24]。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农民形象的建构，提升了农民在社会上的地位，增强了爱国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同时，对新时代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和巩固爱国统一战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启示。

（一）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花大心思、下大力气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25]农民阶级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都被中国共产党人视为“大团结大联合”的重要力量。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统一战线在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抗美援朝过程中，农民展现出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26]，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即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党和国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总目标而奋斗。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的联合主体对象拓展为“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27]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并将继续发展。

（二）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华民族近代以来 180 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100 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70 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28]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是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统一战线的根本保证，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得出的基本结论。坚持和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着力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着力夯实基层统战基础，切实加强统战部门自身建设，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以更主动的担当、更有力的举措、更扎实的作风，奋力开创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论述，对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深刻内涵做了新时代的阐释。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农民形象的建构为群众路线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和平的环境。1956 年党的八大在党章中重申了党的群众路线（正式将群众路线写入了党章）。党的十二大之后，党的领导人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群众路线。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等论述都在不同时代丰富和发展了群众路线。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新的视角升华了党的群众路线。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特定战略任务，需要在具有共同利益和目标的基础上，与其他阶级、阶层、政党、集团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巩固的政治联盟。这就要求统一战线要更好坚持群众路线，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争取人心、汇聚力量，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

（四）对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民新形象的建构具有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农民形象的建构，团结了农民群体，巩固了国家新政权，推动了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稳步前进。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 年中央“1 号文件”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中明确了乡村振兴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农民主体地位”，2022 年中央“1 号文件”强调“落实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的要求”。农民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同时也是乡村振兴的评判者。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及主体地位的落实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意义重大，故而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民新形象的建构应注重：一是突出农民主体地位，二是建构积极健康的农民新形象以传递正能量，三是坚持民族性、真实性以建构贴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民新形象。

参考文献：

- [1]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12—1927：第2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67.
- [2] 广东增城高利贷惊人[N].解放日报（延安），1946—5—16.
- [3]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49.
- [4] 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编.定县农村教育建设[M].定县：河北省定县政建设研究院，1935：2.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63.
- [6] 毛泽东选集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
- [7] [美]埃德加·斯诺；董乐山译.西行漫记[M].北京：解放军文

- 艺出版社, 2002: 192.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398.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769.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44.
- [11] 决心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各地农民踊跃缴纳公粮[N].人民日报,1950-11-12.
- [12] 新乡县农村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N].人民日报,1951-3-23.
- [13] 全国妇女一年来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贡献[N].人民日报,1951-10-27.
- [14] 必须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N].人民日报,1951-3-17.
- [15] 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 635.
- [16] 第一个充满欢笑的新年 记新疆农村一年来的新变化[N].人民日报,1951-1-9.
- [17] 瀛海庄农民积极生产 加紧锄麦准备种棉等[N].人民日报,1950-4-22.
- [18] 旅大市郊区农民渔民积极生产[N].人民日报,1954-5-16.
- [1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1: 1083.
- [20]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603.
- [21] 农民业余学校的典型 左权丈八村民校是怎样办好的[N].人民日报,1951-5-24.
- [22] 中南区创办工农速成中学[N].人民日报,1950-4-9.
- [23] 谈农民的语言[N].人民日报,1950-2-9.
- [2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70-71.
- [2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556.
- [2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2: 2.
- [27]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21-7-1.
- [2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2:8.

【责任编辑：陈童敏】

熊雄对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历史贡献及当代启示

钟恢万，万佳佳，范晨铭

（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8）

摘要：出生于江西省宜丰县的熊雄烈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在黄埔军校的重要负责人，也是中共早期从事革命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开创者之一。大革命期间，他凭借在黄埔军校的政治身份，创新联合战线工作方式方法，巩固了国共合作基础，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以及支援北伐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回首熊雄黄埔军校期间在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的主要历史贡献，既是对一代英豪的深切缅怀，同时，从中汲取统一战线的启示。

关键词：熊雄；联合战线；历史贡献；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49(2023)02-0038-06

为了打倒势力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同中国国民党实行了第一次合作，建立了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支强大可靠的革命武装力量，1924年6月，在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协助下，国共两党共同筹建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该校位于广州黄埔长洲岛，民众习惯称之为“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的创办，正是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重要象征和成果。周恩来、聂荣臻、恽代英、萧楚女、张秋人、熊雄等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在军校任职，而熊雄又是继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之后中共在黄埔军校的重要负责人之一。从1925年9月苏联归来入职黄埔军校开始，到1927年5月壮烈牺牲，熊雄先后担任军校政治部教官、东征军第一军政治部秘书、军校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以及黄埔军校重组后的政治部实际负责人。在黄埔军校任职短短的不到两年时间，也是他

人生最后一段革命时光，他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战线政策，坚持团结左派，争取中间力量，反对极端的反动势力，在国共合作框架内不断创新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有力地维护了国共合作基础，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以及支援北伐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熊雄对民主苏联合战线的历史贡献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这是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专门文件。熊雄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职期间，始终站在维护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立场，深刻认识到“团结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1]，为此，他立足实际创新和丰富军校政治教育，教育、引导革命军队与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共同站在一条战线上面向敌进攻”^[2]，锚定革命主要任务，即“与反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联合起

收稿日期：2023-01-15

作者简介：钟恢万（1986-），男，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综合教研室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统一战线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万佳佳（1988-），女，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综合教研室经济师；范晨铭（1990-），男，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综合教研室助教。

来, 不妥协地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与他的走狗(军阀与买办阶级)”, 坚定了革命军队与工农群众的信心与斗志, 并通过创办各种媒介平台广泛传播大革命思想, 革命军队与民众深受教育, 为第二次东征、北伐的胜利以及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持续巩固凝聚了人心、积蓄了力量。特别是1926年“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一连串破坏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事件发生后, 熊雄沉着冷静, 坚决执行上级党组织指示, 服从革命大局, 坚持和维护国民革命联合战线, 不断采取灵活举措, 坚守住黄埔军校政治部这块以中共党员为主体的阵地, 团结了黄埔军校的广大师生。

(一) 突出政治教育, 凝聚起大革命思想共识

1. 充实政治部组织力量, 加强党的领导。1926年1月6日, 熊雄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 首要工作就是充实政治部组织力量。熊雄参加第二次东征归来就任该职, 他发现政治部工作较涣散, 在力量配备上明显不足, 没有聘任专职的政治教官, 政治部全部工作人员加起来不过20多人, 难以适应军校政治教育及革命任务需要。为此, 熊雄聘请了5名左右以中共党员为主体的政治教官, 如于树德、廖划平、高语罕等中共党员都是在这个时期被聘任为政治部教官^[3]。熊雄聘请中共党员担任军校政治教官为一大创举, 开创了黄埔军校有了专职政治教官队伍先河, 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政治教官出现在黄埔的讲台”^[4]。1926年3月1日, 改组后的黄埔军校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正式开学, 熊雄担任改组后的政治部副主任, 由于主任邵力子主要负责军校秘书长工作, 政治部的日常工作仍由熊雄负责。改组后的黄埔军校, 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 学生政治教育的任务更加繁重, 为此, 熊雄继续充实政治部组织力量, 在原有3个内设科室之下新增设财务股等7个股和俱乐部、图书馆、书报流通所, 政治部工作人员猛增至70多人^[5], 较之前翻了3倍。在熊雄的努力下, 一大批中共党员充实到了政治部, 而且这些中共党员担任了政治讲师、政治教官、各科室负责人等主要岗位的职务, 熊雄还向军校建议设立政治主任教官一职, 中共党员恽代英为第一任政治主任教官, 履行“督同各教官负有实施政治教育全部大权”^[6]职责。同时, 熊雄在已毕业的前三期军校毕业学生中, 精心挑选了一批

中共党员留在政治部任职, 至此, 中共党员的数量占到政治部总人数一半^[7], 这在黄埔军校各内设机构中为绝无仅有的现象。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 为适应革命发展形势, 中共将原来的黄埔支部改为黄埔特别支部, 中共广东区委根据熊雄的建议, 决定成立党在黄埔军校的领导核心——中共黄埔军校党团, 由恽代英、熊雄、聂荣臻、陈赓等人组成, 熊雄被推举为党团书记。此外, 熊雄还聘请了一批以中共党员为主体的临时政治教官, 如毛泽东、刘少奇、鲁迅等先后被邀请到军校为师生作政治报告。熊雄通过充实政治部组织力量, 建立专兼职师资队伍相结合的方式, 大大提升了军校政治教育水平, 更为重要的是, 中共党员在政治部占主体地位特别是主要由中共党员担任政治教官这些创举, 加强了中共在黄埔军校政治部的领导, 确保了在军校学生教育上, 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引领, 沿着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确定的目标推进。

2. 创新政治教育内容, 统一革命思想。熊雄就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前, 先后有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包惠僧、汪精卫、邵力子6位担任政治部主任, 此前, 军校学生的课程以军事课为主, 政治课几乎没有, 仅仅有过几次政治讨论会。为此, 熊雄在军校政治教育上, 大刀阔斧进行了改革创新, 大大增加政治教育的比重, 在授课内容上体现了鲜明的联合战线特点, 即教育引导學生团结各阶层力量, 全面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任务。一是大大增加政治教育的比重。正如1927年3月1日熊雄发表在《黄埔日刊》的《我对于本校“三一”纪念的希望》一文所言“尤其是改组后, 本校由单纯的军事学校而变成军事政治并重的革命党员制造所”, 熊雄创造性提出了“两个打成一片”的理论, 即: 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 理论与实际打成一片。特别是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的提出, 成为了军校教育方针的总原则, 大大增加了政治教育的比重, 目的是既要让步、炮、工等科的学生懂政治, 也要让政治科目的学生懂军事, 让各科学学生锻造成为全面发展的革命军人, 打破了旧军队军人不过问政治的传统观念。二是丰富了政治共识教育的授课内容。熊雄主持制定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 这是军校实行政治教育的纲领性文件, 根据该文件

精神,军校开设的政治课程多达 26 门,其中绝大部分课程属于政治共识教育范畴。例如,开设了《三民主义浅说》《帝国主义浅说》《国民革命概论》《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等政治共识教育性质的课程。而且,对如何讲授具体课程,熊雄也拟定了具体的授课纲要,例如,讲授《三民主义浅说》时,要求教官授课时必须讲清楚三民主义之解释及其相互间关系、民权主义中治权与政权之解释及各阶层联合战线等内容。这些共识教育课程,紧紧围绕反帝反封建这个核心内容,培养军校学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识,充分体现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特点,为推动大革命走向高潮,凝聚了政治共识,统一了革命思想。

(二) 搭建平台媒介,传播好大革命进步理念

1. 创办各类媒介,广泛传播革命理念。熊雄非常重视政治刊物、政治丛书在传播革命理念、凝聚统一战线人心方面的重要作用。熊雄主持军校政治部期间,先后创办了《黄埔日刊》《军事政治月刊》《革命画报》《血花周刊》等各类政治刊物,并编辑出版了《国民革命》《中国国民与劳动运动》等一系列的政治丛书,其中,影响最深远、传播最广泛的当属 1926 年 3 月 3 日创办的《黄埔日刊》。该日刊内容十分丰富,涵盖国内外新闻大事以及革命理论探讨。针对国民党右派分子时有发生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行,《黄埔日刊》刊发大量文章进行回击,以斗争求团结。目前已知的熊雄以个人署名或会议讲话稿形式发表在《黄埔日刊》上的文章就有 18 篇左右。如 1926 年 8 月 13 日,针对蒋介石发出《留给全体官长学生书》含沙射影攻击中共“搞小团体”,熊雄在《黄埔日刊》发表《对于校长“临别赠言”之说明》一文,机智地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针锋相对的斗争,文中指出不能把共产党与小团体相混淆,让师生看清了事情的本质,避免了师生思想混乱,维护了团结。同时,为唤醒全国农民、士兵、学生和小商人团结起来组成统一战线,鼓舞革命斗志,《黄埔日刊》紧紧围绕反帝反封建这个核心内容,不间断刊载了大量闪耀进步思想的文章,例如萧楚女撰写的《在联合战线上纪念“血腥之日”》、冯恒武撰写的《巴黎公社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等等,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国民革命联合战

线的特点。此外,由于《黄埔日刊》刊载越来越多影响力大、传播革命思想的文章,日刊的发行数量从最初的五六千份猛增至高峰期的四五万份,发行范围从黄埔军校外溢至长江流域的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黄埔日刊》一跃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革命刊物,不仅成为黄埔军校的机关报,更成为传播大革命思想、团结社会各阶层力量、凝聚革命人心的重要阵地。

2. 搭建交流平台,激荡进步思想火花。熊雄在主持政治部期间,搭建了各种思想交流平台,就学生普遍涉及的理论认识误区、革命问题、思想疑惑,间接或直接与学生交流对话,深入学生联谊交友,廓清学生思想迷雾,澄清模糊认识,进一步坚定革命意志。一是设立了政治问答箱。政治部在校园各处设了政治问答箱,专门收集全校学生对所学知识、大革命相关理论的疑惑或问题,学生可将问题以信件方式投进问答箱内,政治部每周派员开箱取走信件,然后由熊雄领衔政治部教官,就学生的问题分别以书面或者口头的方式答复提问的学生,书面回复大多刊登在《黄埔日刊》的“政治问答”专栏。正是在这种一问一答、一来一往,形式新颖的交流中,学生参与问答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得到了提升,客观上起到了统一革命思想的作用。二是深入学生联谊交友。熊雄个人的人格魅力很强,他为人随和、开朗阳光,“和蔼的容颜,吃苦耐劳的精神”^[8],与教职同事相处融洽,更重要的是他常常深入学生中,与学生联谊交友。军校四期生陈远湘回忆:“熊主任很宽厚和蔼,我们在背后称呼他熊婆婆。”^[9]这个称呼体现了熊雄对学生浓浓的关爱之情,他经常深入学生宿舍“随便挤在床上,躺躺靠靠,凳上坐坐,毫无长官架子”^[10],和他们拉家常、谈理想,与学生打成一片,对学生现场提出的各种问题,他都耐心细致作深入解答,正是在这种拉家常直接对话交流中,熊雄以看似不经意的方式传播了革命理论,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革命进步思想的熏陶。

(三) 拓展统战领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1. 立足校内实际,全力团结革命军人。1925 年 2 月,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

联合会”, 其以团结军人救国为目标、以参与大众生活为活动形式。在中共的领导下, 逐渐成为中共团结革命军人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不满, 他们针锋相对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 该学会打着研究孙文主义的幌子, “千方百计地找共产党员同学惹是生非, 寻衅肇祸”^[11]。两派的冲突和斗争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严重扰乱了军校学生大团结的局面。熊雄进入黄埔军校之初, 正是两派围绕是否坚持统一战线、三大政策等问题斗争最激烈的时期, 两派纷纷发表文章和演说各不相让, 为此, 熊雄本着两派冲突并非敌我矛盾的理念, 始终站在团结维护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立场, 依靠军校中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 团结国民党左派, 对一些原则性错误和国民党右派开展了坚决的斗争, 特别是对一些受蒙蔽的右派学生, 熊雄竭尽全力开展教育引导, 使他们认识到错误。正是因为熊雄坚持不懈, 把两派之间的矛盾尽力化解在萌芽阶段, 两派之间“虽时有风波, 终于得到熊雄主任在政治思想上的正确领导与诚恳帮助, 未曾发生过重大的事故, 其有功于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 有功于黄埔军校的稳步发达”^[12], 有力维护了黄埔军校的团结。

2. 紧跟校外形势, 努力团结工农群众。熊雄在主持制定军校《政治教育大纲》之时就指出: “使学生彻底了解革命运动是起于农工群众物质要求, 革命之胜利, 亦必须恃靠农工群众之努力”, 他深刻意识到大革命的胜利, 既要依靠革命军队, 更要团结联合工农群众, 正如1926年9月21日熊雄发表在《黄埔日刊》中的《军官政治研究班同学录序》一文指出“我们既不可与敌人妥协, 更不可疏忽我们的统一战线”。为此, 熊雄大团结、大联合的目光从校内延伸至校外。一是团结工人阶级。熊雄特别强调“中国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之先锋队”、“没有工农之联合, 就没有国际革命势力之联合”, 省港大罢工爆发后, 熊雄组织参与“援助省港罢工周”活动, 熊雄发出“罢工胜利, 就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胜利……我们工农商学军各界联合起来”号召, 为此, 熊雄组织政治部宣传队声援罢工, 组织师生慰问罢工工人, 发动学生上街散发传单, 号召为工人捐款捐物, 邀请罢工委员会负责

人来校作罢工形势报告, 熊雄本人也多次发表演讲、撰写《省港罢工的面面观》等文章支持工人。通过这些举措, 黄埔军校与罢工工人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二是团结广大农民。当时, 广东东莞、宝安县等多个地区的农会建立了农民自卫军, 熊雄领导的政治部本着“为辅助人民武力计”^[13], 派遣了6名以中共党员为主体的政治教官帮助自卫军开展政治军事训练。此外, 1926年10月31日, 熊雄又派遣了30多名学生到广州农民运动干部特别训练班学习农运工作, 学习期满后奔赴广东各地担负训练农民自卫军的任务。通过种种举措, 向农民传播了革命思想, 加强了军民团结。三是团结普通群众。1926年7月, 熊雄为让普通民众接受革命思想熏陶, 他联合军校教育长方鼎英在军校驻地黄埔长洲岛上创办了第一所近代小学——黄埔中山小学。北伐后, 熊雄为巩固后方根据地, 与驻地民众“更进一步的打成一片”^[14], 1926年8月30日, 熊雄组织军校师生与驻地民众举行了1万余人参加的黄埔全岛军民联欢并欢迎国民军代表大会, 会后发表的《黄埔军民联欢代表大会宣布》指出“一切民众、一切同志的团结——整个的革命势力之团结”, 呈现出军民大团结、大联合的态势。此外, 熊雄非常注重对校外民众的政治宣传, 抽调学生组建了一支近400人的宣传队伍, 制定了《宣传队组织大纲》, 在“五一”“五卅”等重要纪念日, 向民众宣传纪念日的意义以及反帝反封建的重要性。这些举措, 对唤醒民众革命意识, “做到团结精神与统一意志”^[15], 夯实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群众基础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熊雄对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历史贡献的当代启示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事业胜利的独特政治优势和重大法宝。熊雄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的21个月, 也是他革命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 他大刀阔斧创造性开展军校政治工作, 为凝聚大革命思想共识, 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熊雄在统一战线方面的一些创新与做法, 对做好新时代爱国统一战

线工作仍然具有很强的启示。

（一）在政治引领上，持之以恒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政治引领，广泛凝聚中华儿女思想共识，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是确保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沿着正确政治轨道发展前行的强大支撑。熊雄在主持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期间，立足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框架，紧紧围绕反帝反封建这个核心任务，不断创新政治教育理论，丰富政治共识教育的授课内容，通过教育培训方式增进了革命军人投身大革命的政治认同，凝聚了思想共识。当下，就是要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代表的党的创新理论成果，进一步夯实中华儿女共同思想政治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认同伟大祖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共产党、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个认同”，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共识。同时，在统战各类对象的教育培训工作中，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摆在最突出的位置，优化以政治共识教育为核心、以文化认同教育为基础的教学布局，不断提高共识教育课程占教学总课时的比重，通过教育引导方式画出最大“共识”同心圆。

（二）在统战方式上，绵绵发力创新统战工作艺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16]统战是做凝聚人心的工作，什么方式最能打动和凝聚人心，就是要带着真情实感联谊交友，“润物细无声”般讲好统战故事、传播好统战声音。熊雄在主持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时期，带着真情实感经常深入军校学生宿舍，毫无长官的架子，与学生坐在同一条板凳拉家常、谈心谈话，真正做到了和学生群体打成一片，以看似不经意的方式传播了革命理论，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革命思想熏陶，正是以这种“看不见的宣传”艺术，凝聚了人心、团结了学生。毛泽东曾要求做统战工作的同志，要像古铜钱那样，“外圆内方，做工作时

要圆，方法要圆，策略要圆，但是，内心要方正，原则不能丢”^[17]。为此，做好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要带着浓厚情怀和责任，既要表现有教育引导的深度，也要展现有情感交流的温度，又要呈现灵活多样的工作艺术，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时常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绵绵发力，用心用情为统战对象答疑解惑、纾困解难，在创新统战工作方式方法中开展好联谊交友。

（三）在统战覆盖面上，多方联动构建大统战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事业是全党的事业，统一战线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新时代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更加广泛、工作领域更加宽广、工作内容更加丰富，既给做好统战工作带来重大机遇，也带来严峻挑战。熊雄在主持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时期，虽然他主要在黄埔军校任职，但他贯彻执行党的联合战线的视野并不局限在校园内的师生，而是本着破除“部落思想和地方主义”理念，把联合战线的覆盖面延伸至校外的工人、农民、商人以及普通民众等各个社会阶层，支持参与省港工人大罢工，派教官帮助农会开展政治军事训练，与驻地民众开展军民大联欢，通过种种举措传播了革命思想，团结各阶层力量，真正做到大团结、大联合。为此，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要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大统战工作格局之“大”，在于统战工作覆盖面的“广大”，在于统战工作意义的“重大”。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要始终树立“一盘棋”思想，着力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把党政、群团、社会组织等方方面面的资源力量充分挖掘出来、调动起来、整合起来，进一步提升统战工作协同、联动和整体质效。

参考文献：

- [1][2] 熊秉生.中国大革命中的熊雄[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156-157.
- [3] 辛增明.熊雄传[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119.
- [4] 邢昭华.黄埔军校生活史（1924-1927）[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2.

- [5] 黎显衡等.黄埔军校[M].广州:广东地图出版社,1994:22—23.
- [6] 陈宇.黄埔军校年谱长篇[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238.
- [7] 辛增明.熊雄传[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130.
- [8] 侯海生.黄埔军校的32条军规[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81.
- [9][10] 熊渠生.中国大革命中的熊雄[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204—205.
- [11] 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册)[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61.
- [12] 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1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61.
- [13] 黄埔军校史料[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296.
- [14][15]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编.黄埔军校史料汇编(第11册)[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378—380.
- [16]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2:30.
- [17] 徐晓林.毛泽东的统战艺术[J].党史天地,1994:12.

【责任编辑:陈童敏】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差异研究

韩世龙

(外交学院, 北京 100091)

摘要: 政党制度是国家通过政党开展政治活动的方式、状态, 属于民主政治的体现形式, 并且受到国家历史、国情现实的深刻影响。从世界范围内来看, 不同国家所采取的政党制度各不相同, 具有多样性、差异性的特点, 且任何一种政党制度也均不具备普遍适用性。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形成与我国的历史传统、当下国情密切相关, 具有自身的特点, 与西方的竞争型政党制度之间存有较大的差异性, 和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相比较,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着十分明确的优势性, 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 实现了对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超越。通过对中国与西方政党制度的差异性分析, 能够彰显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与价值。

关键词: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 差异

中图分类号: D6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2-0044-05

2021 年国务院发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 其中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 并阐明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与优势^[1]。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 实现了理论、政策、实践层面上的创新, 具有真实及广泛性, 所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将各个政党紧密结合到一起, 既可以引入监督机制, 又对多党制恶性竞争的弊端进行规避, 在世界政党制度的诸多方案中, 提出了属于中国的观点。中国政党制度与西方国家的竞争型政党制度之间存在有差异性, 而通过对这一差异的研究, 能够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更加客观、清晰、全面的认识, 并持续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化与完善。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差异分析

(一)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概述

政党制度在政治生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是依托于国家法律、国情而确定, 对于一个现代化国家而言, 政党制度属于不可缺少的内容。首先,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建立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之上, 具有十分鲜明的优势, 一方面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行真实、广泛以及持续性的代表, 吸纳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建议, 为决策的科学、民主化提供支持, 从而避免党派之间的利益争端; 另一方面,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将多个党派、无党派人士全

收稿日期: 2023-02-20

作者简介: 韩世龙 (2000-), 男, 内蒙古包头人, 回族, 外交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政党政治和政党外交。

部都集合在一起，在共同目标的号召之下艰苦奋斗，而这不仅可以实现更加有效的监督，同时对于多党制之中的恶性竞争问题也有所规避^[2]。其次，西方的政党制度不同政党之间，经由竞争选举的形式来争取执政党的位置，并由此掌握政权，属于比较传统的政党制度，具有竞争性的特点。从一定程度上来看，中西方在政党制度上存在相类似的地方，即任何一种政党制度的形成，都是建立在本土国情的基础之上，与国家历史传统、实际国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而并不是直接盲目的套用哪一种模式^[3]。但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党制度中的差异性客观存在的，基于这一差异之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也愈发凸显，在理论、政策与实践等维度下的创新性成果也验证了这一点。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差异

1. 两者具备不同的价值目标

政党制度具有何种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党产生的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产生政党的方式不外乎两种，即内生型、外生型两种，而这也是中西方政党制度的差异所在。首先，西方政党产生方式普遍向内生型政党倾斜，先有国家，再有议会，后有政党，故而西方政党深受议会的影响。西方国家围绕议会这一核心要素，创建宪政体制，而后在利益纠纷与政治冲突的驱使之下，不同的党派便应运而生^[4]。在西方社会进步与民主发展的推动下，形成了较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继而作用于议会，由此议会所掌握的权力凸显，而要想将这一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便必须参与议会选举，而这也正是西方各大政党所共同关注的焦点。对于原本掌握议会权力的政党，要想继续巩固自己的优势，就必须争取更大范围的支持，因而开始广泛与地方加强联系，扩大组织覆盖范围，继而形成现代化的政党组织，以选举竞争来确定执政党的惯例也就此形成，而这一切都是政党制度的目标追求以及价值导向，更是西方政党制度的产生基础^[5]。简而言之，西方的政党制度围绕着对权力的争夺与维护而展开，在价值目标上带有政党竞争工具、制度保障的特点与色彩。

有别于西方国家，中国从政党，到政党制度的

形成都具有自身的显著特点。政党形成方面，中国是外生型的政党，在政党出现之后，才有了国家。新中国诞生之时，各个政党均已出现。自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大地便沦为列强的殖民地，而为了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带领民族重新独立，无数仁人志士开启了探索之路，但是都没有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目标，国家也未能强盛。直至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才使得国家的命运得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之下，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赢得了抗日及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就此成立^[6]。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新中国逐步开始对政治制度的探索，政党制度也是在此时才得以确立。由此可以看出，共产党是革命性政党，是为新中国而诞生，以国家、民族以及人民的利益为己任。同时，中国的民主党派自诞生以来，便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与中国共产党一同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因此，中国政党制度的价值目标便是各个党派彼此之间，为了国家发展的共同目标而努力、团结、协作，这与西方有着显著的区别。

2. 两者具备不同的制度结构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差异体现在政党制度的结构差异性之中。首先，西方国家所采取的竞争型政党制度下，经竞争选举为途径，政党、联盟进行或轮流或联合执政，在竞争中取得胜利的便是执政党，反之便为反对党^[7]。由于这样的特点，使得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在结构上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不同党派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立的，互相之间的攻击与对抗也是十分常见的现象，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能够在选举竞争当中赢得胜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由中国共产党及民主党派所构成，同样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然而却与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大不相同，属于多元合作的多元化结构特点。基于多元合作的架构内，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民主党派为参政党，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8]。同时在多元化的结构当中，始终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位置，具体是指政治领导，包括政治原则、方向以及方针政策方面。因此，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当中，政党之间的合作密切，关系友好，开拓了全新的政党关系模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共同奋斗。

3. 两者具备不同的利益代表

利益代表性是政党的显著特征之一,这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区别所在。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具有竞争性的特点,主流政党通常是少数利益集团的代表,属于部分代表而存在。具体表现如下。其一西方国家中,当主流政党产生之时,便是同一个阶级的代表,不同党派的区别是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有所区别,但本质上均属于资产阶级的代表,受到利益集团的驱使,是资本家的利益发言人。尽管在法国、意大利的历史舞台上,都曾有过工人共产党、工人党的出现,然而却很快遭受排挤并退出,缺少能真正代表劳动阶级利益的党派^[9]。其二执政党之所以能够在竞争选举中获取胜利,离不开其支持者的支持,因此为了能够继续巩固选票,执政党必然会倾向于支持者,并且成为支持者的利益代表,维护支持者的利益,以此作为一种回报。因此,归根结底,西方竞争型的政党制度所代表的始终是少数人和利益集团的利益。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根植于群众,是群众利益的代表。具体表现如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坚定人民的立场,为人民的幸福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所代表的是工人、农民阶级为主的人民根本利益。追溯至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便坚定了要以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代表,带领全国人民独立,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不移以人民利益为标准,积极开展社会主义事业建设^[10]。而各个党派、政治联盟与中国共产党从本质上追求共同的利益,即人民的利益。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这与西方政党制度有着显著差异。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相较于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一)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强化整合能力

与西方国家相比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体现在具有更强的整合能力方面。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稳定中,利益整合属于最为基本的前提条件,

有效的整合功能能够在不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情况下,推动社会不同群体、不同阶级之间的同化与融合。相较西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在于有更强的整合能力。中国共产党和各个参政民主党派,尽管党派各不相同,但是在根本利益的追求上却保持一致,并且都属于多元合作中的参与主体,故而共产党与各个民主党派之间的命运息息相关,两者有着共同的目标,因此能够实现整合^[11]。同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身属于制度、规范的政治参与平台,群众可以参与到政治活动之中,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通过政党制度能够将这些意见建议收集起来,进行系统的反馈,最终达成利益整合,这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整合优越性的展现^[12]。

(二)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提升民主质量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相较于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其优越性体现在对民主质量具有提升作用方面。从本质上来看,民主是群众在政治活动中广泛、有序的参与,不能只关注群众在选举投票时是否民主,更要关注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群众的参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社会各个阶层群众制度、规范化参与政治的平台,为群众政治诉求的表达提供了路径,是更加真实、更加具有实效性的民主,充分展现出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因此,相较于西方的竞争型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民主时效性上有着更加突出的优势,对于民主质量的提升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西方政党制度的超越性

(一) 理论超越性

1.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之上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科学的思想理论作为基石,在理论层面上实现了对西方政党制度的超越和突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并没有盲目的套用西方的理论,而是结合中国国情的国家观、政党观作为理论基础。一方面,国家观所强调的是在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去获取有关于国家本质的结论,在历史、客观的基础之上,形成一套科学、完整的国家理论。在科学的国家观当中,明确指出国家是

社会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之后的产物，而国家的本质属性仍然是统治工具，所体现和代表的都是统治阶级所代表的利益。另一方面，科学的政党观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本的思想基础，要求充分体现出政党的本质，认为要在物质生产方式维度之下，对观察政党的阶级性质与利益取向，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去探讨与政党相关的一切问题。因此，目前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立在科学的思想理论成果之上，超越了西方的政党制度。

2.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持续自我完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于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超越体现在，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持续不断的自我完善。目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当中有关于政党监督问题有如下主张，其一政府监督的根本主体应当回归到人民之中，发动人民的力量，让政府接受来自群众的监督，只有这样的监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监督，而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时刻接受来自于群众的监督。其二，从形式上来看，政治监督既有同体、又有异体监督的形式，这主要是与政党的本质有关，中国共产党接受来自党内的监督、以及群众的监督，两者统一协调，同时党的利益与群众的利益保持一致，不需要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反对党来进行监督，这主要是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认同和自觉型有关。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持续不断的去进行自我完善和自我优化，这也是相较于西方政党制度的一大突破。

（二）实践超越性

1. 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现实困境

了解一种政党制度，就必须要了解其组织基础、价值取向以及效能，而目前西方的竞争型政党制度在这三个维度当中，均遭遇到了不同程度上的现实困境。首先，从组织基础上来看，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呈现出一种十分明显的衰败迹象，政党活力减退，党派的认同降低，政党组织的凝聚力减弱，在公众中的影响力也在削减，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价值与功能也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其次，从价值取向上来看，西方政党制度已经演变成为各个利益集团彼此之间的斗争工具，所代表的是少数人的利益，缺少对长远利益的考虑。

最后，在制度运作层面上，西方政党制度在运行过程中陷入僵局，无法发挥作用。

2.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彰显出强大生命力

近年来，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面临着来自组织、价值以及运作等不同维度的困境，与之相比较而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却焕发出巨大的活力，与西方不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组织体系始终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组织力强大，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更新，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同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定不移的一点是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层级，政治决策始终围绕着群众利益的核心，这是西方政党制度所不能企及的。此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还具有较强的制度效能性，能够整合执政党、参政党之间的关系，进行密切合作，彼此之间为了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共同目标而达成一致，共同付诸努力，也因此彼此之间会相互支持和帮扶，并不会产生恶性竞争的情况。

结语：综上所述，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中的一项关键内容，也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通常与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当下国情等实际情况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也因此任何一种政党制度都无法适用于全部国家。目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其显著特征及优势，符合我国的历史及国情，与西方的竞争型政党制度相比较，存在有较大的区别，包括在价值目标、制度结构、利益代表、整合功能、政治格局与效能、民主实效等维度上均有所差异。通过这些差异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与优越性，这是历史的必然、现实的选择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 [1] 齐惠.人民民主：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属性[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13）：91-100.
- [2] 孙文飞，王立峰.中国共产党探索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经验与新的实践要求[J].理论导刊，2022，（07）：15-21.
- [3] 臧秀玲，康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造性、优越性及其时代意蕴[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2，（02）：68-77.
- [4] 吕楠.新型政党制度对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思想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06）：81-89.

- [5] 唐皇凤, 李要杰. 中国共产党执政韧性的科学内涵、基本表现与生成机理[J]. 探索与争鸣, 2021, (10): 34-45.
- [6] 刘家强. 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对新型政党制度的认识和理解[J]. 红旗文稿, 2021, (16): 4-8.
- [7] 钟德涛.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立发展[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60(03): 7-17.
- [8] 方雷, 崔哲. 政治过程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03): 83-91.
- [9] 林伯海, 熊茜.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与发展的三大特征[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0, (12): 38-42.
- [10] 刘志礼, 魏梓桐.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优势及效能转化[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0, 24(06): 96-103.
- [11] 胡荣荣. “新型政党制度”表述的历史演进与理论意蕴[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20, 13(06): 50-58.
- [12] 林怀艺. 习近平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研究[J]. 科学社会主义, 2020, (04): 55-60.

【责任编辑：余伟】

大统战工作格局下推进海归小镇建设研究

张彩云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16)

摘要: 人才强国战略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 以归国留学人员为主体的海外人才既是人才强国战略的培养对象, 也是统一战线工作范围。近年来, 欧美同学会在全国规划海归小镇作为发挥以归国留学人员为主要群体重要作用的优质平台, 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 应在大家共同来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大统战工作格局下, 着眼引才、识才、用才, 在海归小镇建设的先进理念与总体规划上加强党委领导, 在目标群体与精准安排上锚定工作范围, 在发挥人才动能与集聚效应上推动多方联动, 以海归小镇的建设产生示范带动作用, 形成海内外中华儿女一起来想、一起来干的生动局面。

关键词: 大统战工作格局; 海归小镇; 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 D63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2-0049-07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强人才国际交流, 用好用活各类人才”^{[1]36}。人才是自主创新的关键, 归国留学人员是创新创造的重要力量。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留学人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 要求广大留学人员积极投身创新创造实践,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归国留学人员健全工作机制, 搭建创新平台, 又于 2022 年 5 月寄语留学归国青年学者在“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如何贯彻落实党中央要求, 以归国留学人员为主要群体, 打造一个发挥他们致力于创新创造的优质平台, 为此, 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在全国规划了“10+1”个定位清晰的海归小镇作为集聚海归人才和海归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项目, 提出通过海归小镇建设发挥集聚效应, 吸引海归人才助力国家科技产业创新、加速地方经

济转型升级的新做法、新模式。统一战线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 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 “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 必须全党重视, 大家共同来做, 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2]通过海归小镇(长沙·智能制造)建设的调研发现, 建设好一个海归人才创新创业的优质平台就要着眼于“引才、识才、用才”, 构建起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大统战工作格局, 发挥统战优势让海归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干得好。

一、加强党委领导: 海归小镇建设的先进理念与总体规划

引才意味着要靠海归小镇建设的先进理念和总体规划吸引人才目光, 达到引进人才目的。党的

收稿日期: 2023-02-01

作者简介: 张彩云(1986-), 女, 湖南长沙人,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1]36},因此,海归小镇建设应加强党委统一领导,实现建设理念对照国际化海归小镇建设标准,对应全国海归小镇建设安排、对接地方发展战略,总体规划锚定产业主攻目标和方向,彰显地方特色,突出海归主题形成独特优势。

(一) 海归小镇建设的先进理念。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先进的建设理念是海归小镇建设的基础,也是形成大统战工作格局的保障。海归小镇的建设理念必须具有国际眼光,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上接天线、下接地气。**第一,对照国际标准。**既要按照国际人才引进的标准和待遇,提出具有国际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建设理念,也要按照国际现代化、标准化、产业化要求,全力构建宜居宜业、产城融合、生态友好、合作开放的国际化小镇范本,打造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并服务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创造的可持续性事业基地。要在党委统一部署下开展国际性人才平台建设的考察调研,要有国际性专业团队的咨询、设计和过程参与,要打造具有国际氛围的人文环境,要配套国际学校、国际医院和国际社区,还要在建设环境当中体现海绵城市、智慧城市、浅层地热能利用等先进设计理念。**第二,对应全局安排。**自2018年来,欧美同学会创造性地提出在全国建设10个海归小镇设想,把国家高质量发展所需、地方转型升级所求和留学人员创新创业优势所长三者相结合,以创新的思维理念进行了总体安排,其中广州、西安、银川“海归小镇”建设分别以生物医药、信息技术、医疗健康为核心理念已经相继开启建设步伐,积累建设经验。欧美同学会要加大对海归小镇建设的统筹安排、监督考察、巡回调研的力度,各地区海归小镇要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经验交流研讨,以党委为主体及时做好对上汇报、对外交流,同时要保持对接的连续性。**第三,对接地方发展。**在党委的领导下对接地方战略部署,形成具有前瞻性的建设理念,以海归小镇(长沙·智能制造)为例,其核心区坐落于湖南长沙望城,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湖南考察调研时对湖南提出打造“三个高地”、担当“四新”

使命的新定位新目标,其中包括把湖南打造成为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湖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上首次提出实施“强省会战略”,海归小镇要充分对接湖南“三高四新”、“强省会战略”,以“集聚全球海归英才、打造长沙智慧西岸”为导向,助力国家科技产业创新,加速地区经济转型升级。

(二) 海归小镇建设的总体规划。

通过党委领导形成规划一盘棋,从欧美同学会的总体产业定位出发锚定主导产业,了解全国、全省宏观与微观情况,结合本地实际数据,避免同质化。**第一,锚定产业目标。**全国的海归小镇已有规划和定位,要锚定主攻方向,按照产业发展的目标要求做好总体规划。如长沙以智能制造为核心发展方向,打造以智能终端和生命健康两大产业为主导的研发、生产、服务一体化产业新城,就要高起点谋划好海归小镇的主导产业,在核心区域抓好功能定位,构建良好的空间布局,形成稳定方案。**第二,彰显地方特色。**要将具有国际性特征的海归人才吸引到各地的海归小镇,靠的不仅仅是小镇的实力,还要结合并彰显出各地独特的历史文化、区位交通、资源禀赋、生态环境、产业基础和综合实力。近年来,湖南着力培育壮大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16家企业获批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因此,海归小镇(长沙·智能制造)要运用好湖南整体优势要素、智能制造的亮点和对外开放的经验,在党委领导下各个部门献计出力,使海归小镇在区位交通的布局上融入长沙主城区以及湖南特色地区,在产业布局上对接湖南的产业基础与品牌优势,在细节设计上融入湖湘历史文化因素等等。**第三,突出海归主题。**要充分借鉴做海归人才工作的部门、组织在建设海归人才创新创业平台方面的资源、经验优势,在总体规划设计中突出海归主题,如组织部、统战部、欧美同学会等等,人社部在《留学人员创业园建设和服务规范》提出了标准化建设的要求,留学人员创业园建设也可以为海归小镇建设提供各方面经验。党委政府各个部门要找到海归人才在工作、教育、生活、社交、医疗、

休闲、运动等各方面的特点与需求，在全面规划设计中突出海归主题。

通过中央、省、市、区的外交部门、统战部门、侨务部门、人社部门共同确定人才范围、进行人才搜索、明确人才标准，最终打造好持续性引进人才的平台。

表一：海归小镇建设党委统一领导架构表（以长沙海归小镇为例）

级别	主体责任	横向延伸	纵向延伸
中央	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	中央统战部	欧美同学会各级组织
省级	中共湖南省委	湖南省委统战部、湖南省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省级——市级——区级有关部门
市级	中共长沙市委	长沙市委统战部、长沙市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区级	中共望城区委	望城区委统战部、望城区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二、锚定工作范围：海归小镇建设的目标群体与精准安排

“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是统一战线工作范围之一^[3]，海归人才属于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当中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对海归人才的吸引力也持续提升，加之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当中彰显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使海归回国意愿进一步增强，《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和监测数据显示，2020 年在国内求职的海归总人数同比增长 33.9%，2021 年基本持平^[4]。目前海归小镇建设面临着如何确定好具体引进对象并精准引进对象的问题，单靠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掌握的人才资源十分有限。因此，海归小镇建设面对着海外人才回国创业窗口期，需要精准识别和安排好人才资源，明确开展工作的具体范围对象，确定相关工作部门。

（一）精准识别海归小镇的目标群体。

要对海归人才做一些深度的调研，找到他们愿意回国的原因和不愿意回来的痛点，放眼国际国内，

第一，确定人才范围。海归小镇的目标群体当然主要是海归，人民网曾将海归释义为：海归是相对在国内学习、工作的本土人才而言的，指有国外学习和工作经验的留学归国人员。而为了使海归小镇得到更多的关注支持和更好的发展机遇，可将海归人才的范围适当增进和调整，包括外籍人士和具有对应海归人才相同学历职称、技术资质、专业水平的华人华侨、归侨侨眷等。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类：在国（境）外取得学士以上学位的留学人员；在国（境）外工作的海外人士；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具有同等条件的归侨、侨眷。此外，人才范围应根据形势变化和具体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应有侨务部门重点提供人才来源范围。第二，进行人才搜索。根据确定的人才范围尽可能地进行人才搜索。首先，人才搜索的眼光要广阔。既要放眼国际、国内、省市和地方，也要根据产业方向囊括各个专业领域，从管理海归人才数据的相关政府部门入手，通过中央、省、市、区的外交部门、统战部门、侨务部门、人社部门掌握的资源库，通过群团组织、人民团体、社会组织拥有的信息源，通过人才市场和民营企业的创新创业、招聘求职情况等进行搜索。既要通过官方宣传、信息渠道，也要使用互联网数据，如国外 Facebook Messenger(脸书/脸谱)、Twitter(推特)、YouTube(油管)、Instagram(照片墙)以及国内微信、微博、B 站等社交媒介，要尽可能多地了解、掌握和运用好海归人才的数据。其次，人才搜索的目标要精准，海归小镇建设有自己的目标和定位，就要根据人才搜索的范围精准筛选，既要筛选出符合海

归小镇建设方向的目标性海归人才,也要根据人才的创业和求职意向大致确定人才引进的可能性。最后,人才搜索的结果要归纳整理。根据海归小镇建设的需要和海归人才的意愿,最终形成人才资源数据库,进行信息化数字化管理,定期发布紧缺急需人才需求目录,应由统战部门进行人才数据搜索并建立数据库。第三,明确人才标准。不管是在人才资源数据库中的人才,还是已经引进海归小镇的人才,都要对他们进行分类,为今后的服务、保障、激励措施政策做准备。目前,国内各级各部门对海外人才进行分类的标准有很多,海归小镇建设既可以参照国家级、省市级统一的人才分类标准,也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制定新的人才标准,从而给予不同的支持和奖励,应由组织部门重点明确人才统一标准。从智能制造的产业发展方向和专业领域出发,可设置以下几类人才标准,第一类顶尖人才,在研究领域有极高的学术造诣,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取得国际公认重大成就的大师级学者;第二类领军人才,学术造诣高深并已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重要成就,具有国际视野和战略性构想,能引领国际先进水平的专家学者;第三类紧缺人才,紧缺且急需的、在本领域取得突出学术成果具有一定造诣和社会影响力,能够对学科建设起到引领、支撑和推动作用的专家学者;第四类拔尖人才,具有博士学位及高级职称,已在相关专业领域崭露头角,近年取得标志性成果的人才;第五类后备人才,具有学士以上学位,具有一定发展潜力和专业能力的优秀青年人才。要为人才标准的认证提供良好的服务,明确进行标准化认证的机构,颁发国际化标准的认证证书等。在识才的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人才引进工作时,要注意引进的节点实现最优的引才效率。

(二) 精准安排海归小镇的人才资源。

基于海归人才特征、人才需要对人才进行精准安排,这就需要在“大统战格局”下,征询涉及专业领域的科技部门,企业管理的工商部门、工信部门,以及财税、金融、贸易等有关部门的意见,大力实施人才奖补政策。第一,概括人才特征。在建立人才资源数据库的基础上,概括海归人才特征。首先

是根据人才能力所长进行概括,有的是智能终端领域,有的是生命健康领域;有的是长期从事理论研究领域的专家,有的更注重实际运用或具有多年实践经验的积累。其次是根据人才来源进行概括,需要区分好海外人才的祖籍地、出国留学或工作的所在国家或地区、回国后长期生活或工作的地区。再次是根据人才使用方向进行概括,有的是个人求职,有的携带专业团队,还有的已经通过艰苦奋斗拥有企业与品牌等等,要注意的是,概括人才特征的目的就是为了对应海归小镇建设给予最恰当的岗位安排和企业发展规划。第二,满足人才需求。海归小镇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平台,加入海归小镇的人才主要是三个方面的需要。首先是创新创业的需求,海归小镇建设就是为海归人才创新创业提供机遇和平台,因此,海归人才的创新创业需求应放在首位,给予最大力度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与海归小镇建设的产业发展紧密相关的专业领域,应不遗余力地给予政策、资金、资源支持。其次是发展壮大的需求,有的海归人才已有专业的团队、专业实验室、技术中心或发展良好的企业,需要一个平台实现更广更优更强的发展,在符合海归小镇建设方向要求的基础上,同样应加大引进力度,给予他们最大限度的支持。再次是个人价值实现的需求,海归人才或者带资金、带技术,或者带管理能力和发展潜力,满怀实现个人价值的希望,就要鼓励支持他们在海归小镇成就一番事业。此外,要充分考虑多种需求是结合在一起的。第三,实施奖补政策。首先,对引进的人才分标准实施奖励政策。对全职引进的海归人才给予安家补贴、租房补贴或人才公寓,实施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开展紧缺急需人才特聘试点,按需设置特聘专员、高级顾问等特聘岗位,采取年薪制聘请熟悉商务、法律、金融、财税等规则的国际专业人才参与海归小镇建设事务。其次,对引进人才的企业分标准实施支持政策,对成功全职引进海归国际顶尖人才的企业,采取“一事一议”和最高奖励;对以技术研发、课题攻关、项目合作等形式柔性引进海归人才的企业给予支持奖励;对注册在海归小镇的机构或企业聘请的海归人才给予对应

企业补贴，对引进的紧缺急需型海归人才分别按年薪分阶段给予企业资助。

动高质量发展，构建起多方联动积极发挥人才动能大统战工作格局。

表二：大统战工作格局下海归小镇人才引进流程表

程 序	主要内容	工作目标	责任单位
人 才 调 研	对近年来回国人才情况以及意愿进行深入调研	了解国际国内海归人才市场宏观和微观情况，获取翔实的一手数据资料，形成可行性报告	侨务部门牵头，联合人社部门
人 才 搜 索	放眼国际国内、省市和地方，根据产业方向人才需求进行人才搜索	形成海归人才数据库并进行信息化数字化管理	统战部门牵头。联合组织部门、人社部门
人 才 标 准	对人才数据资源进行分类，为人才使用和今后的服务、保障、激励措施政策做准备	参照国家级、省市级统一人才分类标准，形成顶尖、领军、紧缺、拔尖、后备人才分类标准，提供人才标准认证服务	组织部门牵头，联合人社部门、发改部门、商务部门等
人 才 定 位	概括人才特征进行人才定位，根据项目、企业对人才的需要进行精准安排	对应海归小镇建设给予人才最恰当的岗位安排和企业发展规划	科技部门牵头，联合工商部门、工信部门
人 才 激 励	对引进人才以及企业按照标准类别实施奖励政策，包括各类补助、税务优惠、资金支持等	实现引进人才的同时更好地留住人才，并形成人才集聚效应，扩大影响力	财税部门牵头，联合金融部门、商贸部门

三、推动多方联动：海归小镇建设的人才动能与集聚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强调，“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139]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时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特别是激发海归在内的各类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和动能，产生集聚效应推

（一）积极发挥人才动能。

推动实现中央、省、市、区在科技创新研发上的资源信息联动，创新创业团队在研发、生产、服务上的政策联动，人才“引进来”与“走出去”、“用才”与“育才”联动。**第一，鼓励创新研发。**首先，建设创新研发基地，打造影响力大的研发平台，利用海归人才资源对接市内、省内、全国乃至国际高校、科研院所，建设规模以上有效承接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成果转化的创新研发基地，支持奖励研发基地运营，推动科技成果孵化、科研成果产业化，争创国际级双创示范基地、科技企业孵化器。其次，建设创新研发平台，鼓励支持入驻企业和人才打造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等科研创新平台。支持与高校合作成立博士后流动站。要注意的是，相对于生产基地而言，海归小镇的重点和优势应放在研发

基地的建设上，同时加强研发基地与生产基地的联动。再次，建设创新研发企业，鼓励支持入驻企业自主研发在智能制造方面的科技新产品，形成品牌 and 影响力，支持和推动他们争创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国际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等，鼓励和支持入驻企业引进新列入省、市重大技术攻关或岳麓山大学科技城核心技术攻关“揭榜挂帅”目录的项目。**第二，鼓励创新创业。**真正吸引人才的主要不是政府而是企业的发展前景，海归小镇要重点鼓励以主导产业为发展方向的创新创业，鼓励创新创业团队打造研发、生产、服务一体化产业综合体。比如，长沙海归小镇的智能

终端产业包括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产业基地、智能终端技术研发等方面；生命健康产业包括生物医药研发中心、基因工程实验室、智慧医疗健康服务等方面。海归人才在海归小镇创办或领办企业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和股权（份额）转让所得与个人所得税给予相应优惠政策。海归人才在海归小镇创办或领办的企业，符合产业基金投资方向的，纳入地区产业发展投资基金重点支持对象。**第三，鼓励双向联动。**首先是“引进来”与“走出去”联动。按照产业发展方向和具体项目要求，由政府带队向国际国内派出考察调研团队，学习国际国内先进科技技术和优秀管理经验，加强产业发展和科技企业“走出去”不断引进国际国内先进技术、投资资金、优秀人才等，同时也展示海归小镇的建设成效、入驻企业在创新研发、创新创业方面的品牌成果，充分拓宽市场、提升影响力和吸引力；依托政府、企业各类品牌活动，积极将人才“引进来”，定期邀请海归人才特别是博士、硕士等高校毕业生到海归小镇及所在地区看发展环境、人才政策、就业机遇、企业潜能等等，让更多海归人才与引才部门、与用才企业面对面交流。其次，“用才”与“育才”联动。既要引进的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发挥好应有的作用，让他们在各自企业和岗位上产生强大的动能，也要针对海归小镇的未来规划和企业的长期发展，研究制定青年科技人才的储备培养计划，让尖端的顶尖人才、领军人才在科技研发、创新创业中带领带动青年后备人才的成长，使“用才”和“育才”实现联动和不断推进。

（二）推动形成集聚效应。

推动宣发活动平台、党建统战平台和人文交流平台的多方联动。**第一，打造宣发活动平台。**宣发平台上，要在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在全省全国乃至海外形成重要影响力和吸引力，要运用好各级各类的宣传平台、基地等，借助各级各部门以及新媒体、自媒体的力量共同开展宣传工作，要有专业、系统、独立的团队和持续性、常态化的宣传计划，保障宣传活动的连续性和影响力。活动

平台上，打造创新创业品牌活动，通过举办大型国际性学术会议、国际性创新创业大赛等，推动海归小镇企业科技企业和产业更高质量地发展，通过高规格学术和赛事活动打开海归小镇大门，吸引汇聚海外创新创业人才、促进海内外创新资源要素流动。打造精准招商引资平台，根据海归小镇的需求和海归人才的标准和特征，围绕引进科研机构、企业总部、国际学校、国际酒店等类别扎实开展精准招商。打造产业宣传平台。争取举办国际智库论坛、经贸论坛、中外科技论坛、海归论坛、文化论坛，通过大型专场招聘会对海归小镇进行专题推介，制作专题片、专栏在电视、新闻报刊等媒体播出发表，利用新媒体、自媒体等进行广泛宣传。打造独具特色的“海归之家”，既作为海归小镇所在企业和人才的品牌特色展示中心，也是面向海归人才的工作学习生活交流平台，争取在“海归之家”开通政务服务直通车以及招才引智绿色通道等，为人才发展提供最便捷的服务。**第二，打造党建统战平台。**抓好海归小镇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示范引领作用，特别是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机制衔接、功能优化，为海归小镇所属社区、街道的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通过党建引领，加强传承和弘扬留学报国精神的宣传，讲好以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留学人员和以黄大年、南仁东、钟扬等为代表的新时代留学人员的故事，以及本地的海归楷模和榜样，让海归人才接受教育和洗礼，心怀爱国之情，笃行报国之志。建设党外人士议政建言的平台，海归中的党外知识分子和归国留学人员属于统战工作对象，要团结引导他们为海归小镇建设、为科技创新、为地方经济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培养优秀代表人士通过参与统战部门活动、参加人大政协等，积极参与参政议政、政治协商等，提升参政议政能力和素养。**第三，打造人文交流平台。**海归人才在国外生活期间受海外文化的影响，已习惯了相对自由轻松的人文环境，要为他们营造一个良好居住、工作、就业、生活的人文环境。海归人才回国的动力来源之一是对故乡和亲人的眷恋，选

择海归小镇的大多数是本地籍或者被地方经济、地域、文化特色所吸引，可积极争取将展示地方文化、促进文化交流的各级各类文化活动、演出、展览等落户海归小镇。建设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平台。在打造融合东西方居住文化的国际化社区的基础上，加强海归小镇中留学归国人员、华侨归侨侨眷和外国人员的文化交流，使海归小镇既具有国际性又蕴含人情味。拓展多种交流渠道，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很多都是党外知识分子，且与海归有一定的联系，其中致公党的界别特色就是归侨、侨眷和归国留学人员，多年来致力于为推动实施国家科技人才战略、为海外归国留学人员搭建创业就业平台，加强留学人才交流和科研成果共享，海归小镇建设应充分联系和运用好致公党及民主党派的平台，加强科技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习近平出席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 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2-07/30/content_5703635.htm，2022-07-30.
- [3]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Z].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
- [4] 王一新，李小丽.2021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J].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22，（06）：36-38.

【责任编辑：杜联藩】

港澳回归后推行国家历史教育现状的比较研究

曹艺凡, 刘 敏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30)

摘 要: 国家历史教育对于塑造国民的国家和民族认同、巩固统一战线、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乃至国家统一具有重大意义。“欲知大道, 必先为史” “灭人之国, 必先去其史”。本文旨在梳理港澳回归后推行国家历史教育的发展演变历程、行动方式、基本经验教训, 挖掘港澳青年本土观念的形成及深层原因, 希冀为在港澳地区进一步推行国家历史教育, 巩固“一国两制”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依据、基本经验与些许借鉴。

关键词: 港澳回归; 国家历史教育; 启示; 对策

中图分类号: D6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2-0056-06

一、研究的背景及缘起

历史认同是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与前提。十九大报告指出: “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 找到最大公约数, 画出最大同心圆。”^[1]

2014 年 12 月 20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澳门回归祖国 15 周年大会时, 高度评价了澳门教育界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爱国爱澳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2]他指出: “澳门同胞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不断加强, 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不断升华, 爱国爱澳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3]2019 年 5 月 31 日, 习近平总书记还亲自给澳门的小学生回信, 指出“爱国爱澳”教育的重大意义。“回归祖国 20 年来, 澳门发展日新月异, 澳门同胞工作生活越来越好。祖国是澳门的坚强依靠, 你们从小就懂得这个道理, 我十分欣慰”。^[4]2019 年 12 月 20 日, 习近平总书

记在考察澳门时提出: “要打牢爱国主义的基础, 就要了解历史。”^[5]

同样, 要培育好今天港澳青少年的国家历史教育, 就需要了解历史上港澳青少年的国家历史教育的状况。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曹天忠教授认为: “国家历史教育对于塑造国民的国家和民族认同、维护视域文化安全乃至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6]

清晰地规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国家历史教育对于塑造国民的国家和民族认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乃至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7]然而,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我国的港澳地区推行国家历史教育涉政策、教材的演变、价值取向以及其他主体价值的系统性研究还有很大空间。在香港推进国家历史教育是促进“人心回归”的重要举措, 然而, 最近十年, 一套香港“本土分离史观”在香港泛滥, 一些人“打正旗号”要“夺取香港史的话语权”, 对抗“大中华史观”。其核

收稿日期: 2022-11-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一国两制’理论与澳门成功实践研究”(19BKS039)、2021年度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统一战线视域下港澳回归后国家历史教育的比较研究”(2021GXSZ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曹艺凡(1982.7-), 女, 汉, 湖北襄阳人,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 主要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刘敏(1998.12-), 女, 汉, 江西吉安人,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研究。

心是虚构香港“具有独立的历史”,本质是挑战“一国两制”实施的历史合法性,从而为“港独”的理论与实践提供所谓的历史正当性。^[8]这些错误思想受到一批香港青年的认同与追捧,成为2014年非法“占中”事件直到2019年“修例风波”的重要社会心理诱因。

上述现象促使我们反思:同样实行“一国两制”方针的香港和澳门,其青年在对待中央与国家的态度上为什么会有巨大的反差?回归以后同样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香港和澳门,其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的基本理念与核心差异到底是什么?这种差异为什么会在“一国”全局下塑造出两地青少年不同的价值取向等等。

本课题旨在从历史的角度梳理港澳青少年在长期的殖民统治进程中国家历史教育的发展脉络、基本规律、经验启示,纵向分析不同历史时期港澳地区国家历史教育的发展演变轨迹,横向比较港澳之间因多重因素的不同而造成港澳地区国家历史教育的差异,在纵向梳理与横向对比中寻找港澳地区国家历史教育的历史规律与经验教训,为新时代港澳地区国家历史教育的培育提供历史依据。

二、香港回归后推行国家历史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在持续半年多的“修例风波”中,暴露出香港教育存在很多问题。部分老师将错误理念传输给学生,部分教材把关不严,以错误内容引导学生,甚至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成为传播偏颇信息和进行渗透的工具,令部分学生受到“毒害”。其具体情况如下:

(一)“校本教材”居主导地位,削弱了教材的规范和监管力度

香港的教材分为两种,一种是教育局审定的由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另一种是“校本教材”,这种教材主要是由学校老师整理的一些学习资料组成。而屡次出现问题的教材,就是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排第一位的实际上是校本教材,而非出版社教材。

那为何校本教材会屡次出现问题呢?问题根源在于教育局对校本教材的规范和监管几乎完全缺位,导致对校本教材的规范上存在巨大漏洞。香港

煽动暴力分子鼓吹“分离主义”的问题教材的出现,事实上也使此问题暴露出来并引起社会重视,令教育局可以在校本教材的规范上为学校给予更清晰的规范指引,甚至高度介入。

(二)历史研究推崇“本土分离史观”,削弱了国家认同感

香港回归后的第一个十年,一些香港史论著开始流露“本土意识”。1997年,由各领域知名的香港学者编著的《香港史新编》(两卷本),虽然呈现了香港与祖国的历史联系,但部分篇章过于强调香港人的身份独特性,对英国殖民统治亦缺乏批判。2000年,《历史的沉重:从香港看中国大陆的香港史论述》出版,作者一方面对“殖民史观”有所批评;一方面又对“爱国史观”大加质疑,且将重点放在后者。2001年,旅美台湾学者蔡荣芳的《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秉持“香港为本位”之史观,以香港人之权益为首要考虑,来解释香港的历史。

香港回归后的第二个十年,一些以“本土史观”书写的香港史论著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分离主义倾向。2011年香港学者陈云根出版的《香港城邦论》,提出建立香港“城邦自治”,贯彻“香港本位”“香港优先”“香港第一”。2014年2月,在非法“占中”处于酝酿之际,香港大学学生会主编的《学苑》杂志推出《香港民族命运自决》专号,收录了梁继平《综援撤限争议与本土政治共同体》、王俊杰《本土意识是港人抗争的唯一出路》、曹晓诺《“香港人”的背后是整个文化体系》、张士齐(本名李启迪)《香港应否有民族自决的权利?》等鼓吹香港“民族自决”的文章。^[9]事实上,上述“著作”是在以一种迂回的方式表达着分离诉求。

(三)基础教育历史教科书贯彻“港史内嵌史观”,导致“港独”思想的浮头

1994年文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国历史》就单独开设了“寻根溯源看香港”课文类型,将《史前的香港》《汉代的香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香港》等等课文成体系纳入其中。^[10]其特征是将香港地区的历史内容以“香港追昔”的名义单独列出,称之为“港史内嵌”。

“本土分离史观”和“港史内嵌史观”的危害是与现实直接关联的,“港独”势力已将回归后香

港当代史的书写视作挑战“一国两制”的重要“战场”，以推动“港独”为终极目标，导致了香港社会一些人对国家历史的冷感、漠视和曲解，这些因素是“本土分离史观”和“港史内嵌史观”形成的深层心理土壤。

三、澳门回归后推行国家历史教育的做法及经验

澳门回归祖国之后，特区政府稳健施政，积极实施“教育兴澳、人才建澳”施政纲领，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澳门教育的核心价值，逐步建立健全教育制度，教育投入持续增长。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在 2000 年发表第一份施政报告，特别明确提出“澳门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爱国主义和公民意识应在整个教育领域内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切实的推行”。^[11]澳门教育行政部门将“品德与公民素养”居于首要地位，这为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扎实了基础。

（一）设定教育目标。教育目标，是课程价值的集中体现，是教育过程的终极追求，既反映课程本质，也代表学校发展方向，还预见教育效果。因此，澳门特别行政区《非高等教育纲要法》明确指出：“培养其对国家和澳门的责任感，使其能恰当地行使公民权利，积极履行公民义务”“使其能以中华文化为主流，认识、尊重澳门文化的特色，包括历史、地理、经济等多元的共存，并培养其世界观”。^[12]

（二）确立课程宗旨。确立课程宗旨在于帮助、促进每一位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在德、智、体、群、美等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对国家对特区有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合作意识及终身学习能力的公民。2009 年澳门特区政府指出课程宗旨：中、小、幼各教育阶段，都需要重视培养学生“核心品格”（品德与公民、健康、审美三大素养）、“关键能力”（阅读与语言、数学思维与方法、信息科技、沟通与合作、反思与创新和解决问题等六大能力），以不断增强年轻一代在参与国家发展战略及特区建设乃至国际竞争中的竞争力。^[13]

（三）建立课程决策新机制。为了更好地组织实施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价值的课程，特区政府建

立课程决策新机制，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努力推动非高等教育课程改革。2006 年 12 月正式颁布实施《非高等教育纲要法》。此后陆续制定颁布《私立学校教学人员制度框架》《正规教育课程制度框架》及其《基本学力要求》与《学生综合评鉴制度》等一系列法规，明确规定澳门回归后教育方针、基本原则和培养目标等重大政策制度，为“一国两制”下的澳门非高等教育开创建立富有国家意识和地域特色的现代课程体系，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与法律依据。

针对私立学校占绝对比例和私立学校向来有着课程自主权的实际情况，特区政府通过法律手段，牢牢掌握回归后对课程的领导权。《非高等教育纲要法》在规定由政府以专由法规方式制定各教育阶段《课程框架》及《基本学力要求》同时，明确指出：“学校在遵守上述法规的基础上，方可自主发展校本课程”。^[14]这是对课程决策机制的一次重大调整与本质转变，体现国家与特区政府的教育意志，为澳门教育及其课程建设指明正确的方向。

（四）转变课程设计指向及范式。特区政府从根本上确立教育目标，成为学校发展的基础，也给课程建设提出任务，促使澳门非高等教育课程设计指向及范式转变。对回归祖国后的澳门而言，就是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制定并实施“一国两制”下的课程指向及范式。

（五）调整课程结构。课程结构中，既体现政府教育意志的刚性要求，又考虑澳门本地多元化特质的弹性诉求，学校层面运用课程结构的弹性空间，开设校本化课程，如教业中学将“国学经典”“书法”“武术”等列为从小学到高中阶段的必修科目，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与课程结构相匹配，建立具体学科《基本学力要求》，从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度展开，具有实际可操作性，有利于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也使教育的效果检测或者质量评估，有了明确的参照。

（六）加强教材建设。回归前，澳门的教材处于自由泛滥状态，依赖外部引进。回归以来，特区政府在建立形成课程体系的同时，加强教材建设。近年来，逐步组织编写一些学科，或建议选用高质量

教材,使澳门的教材建设有了新的发展。目前已在学校中使用的,主要有:《品德与公民》《中国历史》,《中国语文》小学教材2019年开始试用,中学教材正在编写。小学《常识》由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编写。

(七)拓展课程活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等课程要素,还往往与课程拓展活动联结成一个整体,正确处理各种类型的课程及其相互关系。特区政府在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之间,确立相互依存关系,有计划地开展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的课程活动,如“每周一‘国旗下讲话’系列”“我是谁,处于怎样的时空?”“‘一带一路’战略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论坛”等,促进课内与课外的联动发展。

从澳门青少年对国家认知水平和倾向的问卷统计来看,“爱国爱澳”核心价值观已经深入澳门青少年心中,其国家认同感清晰、真诚、普遍。澳门“爱国爱澳”教育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国家指向的教育政策,包括历届特区政府所确立的“爱国爱澳”教育主线、建立以《公民与道德》课程体系为基干的“爱国爱澳”教育内容、构筑多元立体全方位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以及社会多部门共同营造良好浓厚的爱国主义教育氛围。

澳门“爱国爱澳”教育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四个坚定不移”:一是坚定不移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为澳门的“爱国爱澳”教育工作创造安定、和谐、繁荣的政治经济环境;二是坚定不移坚持“去殖化”教育方针,将“爱国爱澳”教育作为澳门教育工作的主线;三是坚定不移依靠国家做好“爱国爱澳”教育工作;四是坚定不移走全社会齐抓共管、做好青少年“爱国爱澳”教育工作之路。这四点澳门教育界需要继续坚持和发扬的经验,也是香港教育界亟需学习和汲取的经验。

四、澳门基本经验给予香港的启示及对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明确将“加强对香港、香港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增强香港、香港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等内容写入《决定》。^[15]探究港澳地区国家历史教育的不同特色、着力点,以及港澳之间的借鉴机制尤为重要。因此,比较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中教育方面的七大举措、四个经验和香港教育方面的三大问题,本研究总结了三大启示,提出六项对策:

(一)启示

1. 正确认识国家历史文化教育中普遍与特殊、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一国两制”的根本前提是“一国”。香港历史文化是岭南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岭南历史文化又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在香港地区的国家历史教育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脱离祖国母体文化的地方化、在地化思潮,将香港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国家历史教育必须坚持的根本前提。

2. 要注重培养、加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爱国主义精神。澳门特区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国家历史,通过地方立法、制定规章制度贯彻落实中央政府的重要部署,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在师资队伍建议、教材设定、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创新等方面,实施全方位、全过程、全时段策略,管控国家历史教育的推进实效。因此,我们对香港的国家历史教育的推进,要不断加强顶层设计,通过长期持续的学校教育、社会教化、家庭教育、网络教育等多种方式,培养、加强香港地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爱国主义精神。

3. 建构和完善国家历史教育体系。首先,必须恢复中国历史在香港地区初高中教育中的独立必修课地位,由专业教师施教,这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教育的通例,也是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其次,在课程内容方面,以中国为本位,书写并处理好中国历史、香港地方史、世界史的关系,并与中国语文、中国地理、中国国情等相关课程形成呼应配合。在此基础上,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教材编写和审定的权威化、讲授规范化、教师专业化、考核标准化等一系列配套机制。

（二）对策建议

比较港澳回归后推行国家历史教育现状，香港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应在教育方面做到：

1. 建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课程体系。爱国主义成为学校教育及其课程建设的核心价值，反映了教书育人的本质意义。围绕课程宗旨，在中、小、幼各教育阶段，都需要重视培养学生“核心品格”（品德与公民、健康、审美三大素养）、“关键能力”（阅读与语言、数学思维与方法、信息科技、沟通与合作、反思与创新和解决问题等六大能力），以不断增强年轻一代在参与国家发展战略及特别行政区建设乃至国际竞争中的竞争力。

2. 转变课程决策与设计范式。为了更好地组织实施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价值的课程，建立课程决策新机制，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努力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出台一系列法规，明确规定香港回归后教育方针、基本原则和培养目标等重大政策制度，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基础教育开创建立富有国家意识和地域特色的现代课程体系，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与法律依据。针对私立学校占绝对比例和私立学校向来有着课程自主权的实际情况，通过法律手段，牢牢掌握回归后对课程的领导权。

3. 选择付诸实践的路径。将“核心品格”“关键能力”融入课程编制中。将爱国爱港融入不同科目。突出不同科目不同特点的关联性或共通性研究和实践，从而使香港基础教育坚守爱国爱港精神，全面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教学的全过程，在课程教学行为中落实爱国主义教育。

4. 调整课程结构。在课程结构中，既体现中央政府教育意志的刚性要求，又考虑香港本地多元化特质的弹性诉求，学校层面运用课程结构的弹性空间，开设校本化课程，调整课程结构，进一步实现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价值的课程观。“社会”学科须分设“历史”“地理”等科目进行教学，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与课程结构相匹配，从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度展开。

5. 加强教材建设。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选编补充爱国主义教育的相关内容，如“《宪法》与《基本法》”“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索引”等，

以深化学生对国家战略和发展历程的认知，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

6. 开展课程拓展活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等课程要素，还往往与课程拓展活动联结成一个整体，正确处理各种类型的课程及其相互关系。在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之间，确立相互依存关系，有计划地开展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的课程活动，促进课内与课外的联动发展。明确提出各个学段的课程活动重点：在幼儿教育阶段注重启蒙性和游戏性，避免概念化倾向；在小学教育阶段体现基础性，增强认知体验，增进对国家和特区的情感；在中学教育阶段，突出发展性，确立报国志向及做好生涯规划。唯有如此，方可把爱国主义教育牢牢植入课程建设之中，实现国家历史教育的核心价值。

总之，历史认同是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与前提。香港回归，既包含着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领土回归、政治回归；也包含香港居民重新确立国家历史认同的“人心回归”。香港民众的认同情感“要真正安顿下来，必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大框架下寻找自己的叙事言说”^[6]。在香港推进国家历史教育是促进民众认同和实现“人心回归”的重要举措。梳理港澳青少年在长期的殖民统治进程中国家意识与爱国精神的发展脉络、基本规律、经验启示，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的破题之钥、奠基之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郭志云.统战新时代社院新使命——学习十九大精神心得体会[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6): 18-22.
- [2] 杨林香.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角度解析爱国主义的结合点——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J].思想教育研究, 2015(4): 43-46.
- [3] 杨林香.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角度解析爱国主义的结合点——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J].思想教育研究, 2015(4): 43-46.
- [4] 习近平回信勉励澳门少年儿童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N].人民日报(版号: 001), 2019-06-02.

- [5] 张静. 此行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 习近平行程表达了哪些深意? [N]. 中国网-中国习观, 2019-12-20.
- [6] 曹天忠. 国家历史教育缺位与“修例风波”[J]. 历史评论, 202(1): 103.
- [7] 郭静. 政治发展的实践演进与理论逻辑——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政治发展[J]. 政治学研究, 2018(6): 88-97.
- [8] 李刚. 香港回归与区际法律冲突[J]. 理论导刊, 1998(1): 33-34.
- [9] 刘嘉祺. 试析香港的激进本土主义[J]. 国际政治研究, 2016(6): 81-107.
- [10] 张利娟. 新世纪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结构——以国标本、上海本、港台本为中心的分析[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5): 124-130.
- [11] 富兵. 澳门公民教育的缺失及《品德与公民》教科书的回应[J]. 全球教育展望, 2011(8): 81-86.
- [12] 篇江华. 加强宪法和基本法宣传教育保障爱国爱澳传统薪火相传[J]. 港澳研究, 2018(2): 7-18.
- [13] 曾琦, 单文经. 澳门中小学品德与公民教育成效的评价研究[J]. 比较教育研究, 2009(11): 21-25.
- [14] 郭丽丽. 澳门新一轮课程改革的背景、特点及反思[J]. 广东教育学院学报, 2010(1): 31-35.
- [15] 周光辉, 赵学兵. 政党会期制度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路径[J]. 政治学研究, 2019(2): 8-18.
- [16] 刘强. 香港本土意识的历史由来[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2).

【责任编辑: 张山】

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视野下 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

冯颖红, 张山, 陈童敏, 杜联藩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00)

摘 要: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国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 其实质就是实现港澳与内地的融合发展, 促进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文章研究了开展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视野下统一战线研究的战略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统一战线战略任务、工作范围和对象以及工作方针等基本理论问题, 提出推动大湾区统一战线的实践发展的具体思路。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 统一战线; 人文湾区; 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2-0062-07

粤港澳大湾区(下称“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建设大湾区是新时代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 其实质就是实现港澳与内地的融合发展, 促进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全力推进粤港澳融合发展”。由于大湾区涵括了“一国两制”所涉及的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9+2”城市群、多语种文化共同体, 形成了多元共生的异质空间, 决定了大湾区的融合发展不仅是经济层面的融合, 也是文化层面的融合, 更是探索“一国两制”新实践国家战略

层面的范畴, 这就为新时代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提出了新课题。本研究以大湾区融合发展为背景, 以统一战线推动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目标导向, 分析统战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为问题导向, 提出“大湾区统一战线”的概念, 并对其基本理论和实践进行必要的探索, 从而提出发挥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优势, 促进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开展大湾区融合发展视野下统一战线研究的战略意义

“大湾区融合发展”是随着大湾区城市群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而提出来的规划和远景目标。开展大

收稿日期: 2023-03-28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2 年度一般项目《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视野下统一战线战略研究》(批准号: GD22CDS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冯颖红(1965-), 女, 广东恩平人,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学科带头人,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广东研究基地副秘书长, 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统一战线理论; 张山, (1969-), 男, 广东阳江人,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理论研究部主任、《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副主编、编辑部主任,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广东研究基地专家, 副研究馆员, 主要研究方向: 统一战线理论; 陈童敏(1985-), 女, 广东湛江人, 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理论研究部党史党建副教授、广东省政协提案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 统一战线史、文化统战研究、地方特色历史文化研究等; 杜联藩(1980-), 男, 广东汕头人,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理论研究部副主任、讲师, 广东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省社会主义学院研究基地副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 统一战线理论、协商民主理论。

湾区融合发展视野下统一战线研究,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 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需要

当前,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中美博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美国视我国为战略竞争对手, 不择手段对我国进行围堵打压, 民族、宗教、涉疆、涉藏、涉港、涉台等统一战线相关领域已成为西方反华势力对我进行干扰破坏的重点和焦点, 统战工作越来越成为国际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2]。大湾区地处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对外交流交往频繁, 国际化程度走在全国前列, 一方面, 生活在包括港澳在内的大湾区统一战线成员受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潮等因素的影响比其他地区成员较早, 因而在意识形态、文化等方面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也比其他地方更为复杂多变; 另一方面, 随着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软联通的加快建设, 三地人员往来越发频繁, 特别是互联网日益成为舆论生成的策源地、信息传播的集散地、思想交锋的主阵地, 抵御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挑战更大。应对这一大变局, 需要从理论上阐述加强大湾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导、大湾区民众思想共识、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的凝聚、大湾区意识形态安全“护城河”和“防火墙”的构筑、西方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的防范和抵御、维护“一国两制”大政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等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问题。

(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需要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大湾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定位赋予了新内涵, 对大湾区统一战线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为大湾区统一战线发挥凝心聚力重要作用提供了广阔舞台。大湾区统一战线成员来源广、数量多、影响大, 海外侨胞众多, 是大湾区在新征程上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的强大力量。统一战线具有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 引领和支持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心怀“国之大者”、责之重者, 把统一战线所长与湾区融合发展所需结合起来, 最大限度地要把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 形成团结奋斗的生动局面, 对于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的实现意义十分重大。

(三) 促进大湾区民众“心相通”的需要

实现大湾区融合发展目标, 不仅需要加速形成粤港澳三地物理空间上的互联互通, 而且要做到人才链、技术链、资本链、创新链的系统融合, 才能形成真正的发展合力。因此, 在“一国两制”政治制度下, 通过畅顺交通联络、推进协同对接、广泛凝聚人心等手段突破地域、体制和民心的沟通壁垒, 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方面实现基础设施的“硬连接”、政策机制的“软联通”以及民众身份认同的“心相通”。随着大湾区内的基础设施和体制机制的进一步联通, 特别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广州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三大平台建设的推进, 未来, 港澳青年和专业人士进入珠江三角洲各大城市工作和生活将是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统一战线发挥思想政治引领的优势, 对于推动粤港澳三地青年人交往交流、交心交融, 支持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参与国家建设, 实现三地民众“心相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深化大湾区统一战线基本理论的研究

大湾区作为国家战略, 它不仅是地理层面的概念, 而且是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概念, 更是政治层面的概念。随着大湾区“软”“硬”联通的进一步打通, 从地域到经济的紧密相连、从文化到人员交流交往日趋融合发展, 如何实现大团结大联合这一最大的政治就成为战略层面不可回避的问题。面对大湾区统一战线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变化, 迫切需要对大湾区统一战线自身的特殊性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深化对大湾区统一战线战略任务、范围对象、工作方式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为推进大湾区统一战线工作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一) 大湾区统战工作的战略任务

1. 为推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服务。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广东寄予厚望, 多次强调, 大湾区在全国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要求广东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举全省之力, 推进大湾区的建设。党的二十大指出, 高质

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也是打造高质量发展典范的首要任务。要完成这一首要任务,就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的智力优势,激发出统一战线成员的潜力。充分发挥区内智力引领和战略地域优势,吸引和凝聚世界尖端人才进一步引进海内外英才,同心戮力,解决和突破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种种阻碍,凝心聚力、团结奋进,把最大变量转化为最大增量,把粤港澳三地的力量凝结成推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

2. 为推动人文湾区建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共建人文湾区”目标任务,并从“塑造湾区人文精神”“共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加强粤港澳青少年交流”“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等四个方面提出了4项规划要点要求。“人文湾区”是对大湾区发展的更深刻、更具体的定位,也是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根本要求。作为国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人文湾区”的建设有利于国家融入全球经贸体系,对接全球规则标准。统一战线具有联通海内外的优势,成员广,代表人士遍布港澳台和海外,工作机制和载体广泛多层。统战工作在整合、开发、利用湾区文化资源,深化港澳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培育港澳同胞对岭南文化的认同,增强中华文化自信,推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提高中华文化对世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统战工作在服务人文湾区建设,为大湾区建设注入人文动力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任务。

3. 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服务。建设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大湾区建设的初衷。2017年以来,中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即“双区”建设两大国家战略发展规划,把两者同时定位为“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后来,中共中央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

国务院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横琴、前海、南沙成为了探索和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的“三大平台”。因此,“一国两制”是大湾区的最大特点,也是独有优势。统一战线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中肩负着重要使命。发挥统一战线的制度优势,服务“双区”和“三大平台”建设,推进大湾区不同制度的磨合、融合发展,形成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 大湾区统战工作的范围和对象

1. 工作范围的拓展和延伸。2020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规定,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统一战线的这一性质定位决定了统战工作的范围有12个方面,其中,“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属于统一战线的第一个范围的联盟,即“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范围,这是大陆范围内各党派、各民族、各宗教、各阶层的联盟。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华侨”是属于统一战线第二个范围的联盟,即“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范围,这是大陆同胞与大陆范围以外包括港澳、台、和海外同胞的联盟。然而,随着大湾区建设的推进,使原来粤港澳三地泾渭分明的统一战线两个范围的界限模糊化了。一方面,随着大量的港澳同胞进入珠江三角洲为主阵地的大湾区里工作生活后,原来意义上的“港澳同胞”身份认同就有可能发生变化,他们既是香港人、澳门人,也是湾区人。另一方面,“同胞”二字侧重于血缘关系,“香港”“澳门”侧重于地域概念,这与大陆范围内的以各党派、各界来划分不相适应,特别是在大湾区融合发展的趋势下,以“港澳同胞”来称呼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居民就过于笼统。因为,在大湾区里,

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本质上也是致力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爱国者。而致力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爱国者, 他们籍贯虽在港澳, 但工作生活在珠江三角洲, 他们也必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劳动者、建设者、爱国者。

2. 工作对象的壮大与发展。随着大湾区的高质量建设, 统一战线工作对象也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总体数量的增多。随着大湾区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协同发展的推进, 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各地政府推导的“融湾”计划中发展壮大, 大湾区里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也必将不断扩大, 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组织不断产生, 内部构成也出现新的变化, 以企业高管、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新媒体从业人员等为主体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将大量涌现。同时, 广东的周边省份也提出了“融湾”计划, 来往于当地与大湾区之间的民营企业及其从业人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必将大大增长, 成为大湾区统战工作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是人才层次的提升。随着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的推进, 建立大湾区人才执业资格互认制度以及国际标准化人才的培养等措施的实施, 大湾区将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转型发展、创新合作发展体制机制, 也必将大大地吸引来自全国其他城市甚至是海外的高端人才, 走进珠江三角洲主阵地执业的港澳专业人士也将越来越多, 必将整体提升大湾区人才的层次。如: 2020年8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 2021年7月, 首次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在深圳、珠海、香港三个考区开考; 2022年7月, 广东省司法厅发出首批大湾区律师执业证, 4名港澳律师正式获准在大湾区内地9市执业。港澳律政界专业人士进入内地执业, 意义十分重大, 它不仅标志着大湾区内高层次人才的流动壁垒被打破, 而且具有国际视野、贯通中西方文化的高知性的党外知识分子、归国留学人员、港澳专业人士队伍的增长, 必将为大湾区统一战线成员队伍带来重大的变化。

3. “大湾区人”的身份认同不断强化。在大湾

区融合发展背景下, 统一战线成员和对象对身份认同发生了深层次的改变。从“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 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实施, 港澳两地民众对大湾区的属地认同和情感认同在不断强化。2019年3月10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委员、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刚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我很不想以后用“北上”的词去形容大湾区, 这给人的感觉就好像很远^[3]。无独有偶, 四年后的2023年3月7日上午, 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第二场“委员通道”上, 全国政协委员何超琼说: “有人说我是澳门人, 有人说我是香港人, 但我会说我是大湾区人。”^[4]从霍启刚的“不想用‘北上’”, 到何超琼的“大湾区人”, 反映的是深层次的身份认同问题, 道出了无数香港人、澳门人的心声和感悟。何超琼更是说出了大湾区内软硬联通的获得感、民心相通的归属感。“大湾区人”的身份认同是必然的趋势, 如何发挥港澳人士“双重身份”的作用, 是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三) 统战工作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方针

1. 统一战线一致性在增强。在“一个两制”制度下, 粤港澳三地民众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就是“爱国主义”, 认同“一国”是最大的一致性, “两制”是最大的差异性。长期以来, 因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阻隔了三地民众的融合发展, 三地民众在身份认同上虽然同是中国人, 但是依然存在“你还是你”“我还是我”的认同差异。在大湾区融合发展背景下, 原来一些阻隔三地互通的制度藩篱逐步被新的机制破解消除, 三地民众“大湾区人”意识逐步得到提升, 建立在同是“大湾区人”观念上的共同点和认同感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激发和提升。如: 同一个湾区、同一个经济体、同一种文化背景(岭南文化)、同一种生活习惯等等, 这些共同点势必推动统一战线的一致性的增强。同时, 无论是香港人还是澳门人, 也无论是创业者还是执业者, 一旦进入内地后就必须遵守内地法律法规, 这就使得他们与内地民众有了更多的共同点, 作为统一战线成员的组成部分, 他们与内地成员一样, 不仅是“拥护祖国统一”

的爱国者，而且也是大湾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2. 统一战线多样性在发展。在提出建立大湾区前，粤港澳三地居民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样性或者差异性仅限于各自生活的地域，三地在价值观上的冲突不会特别明显。但是，随着大湾区建设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澳门人进入珠江三角洲城市生活和工作，不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也就随之带进内地，三地的生产、生活和价值取向等不断交汇，这既是多样性融合发展的过程，也将是多样性冲突的过程。如何预判并且协调和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在坚守“湾区底线”的同时，及时引导存在的多样性形成“湾区共识”，画好“湾区同心圆”，就成为统一战线在处理多样性问题上的重要课题。

3. 关键在于求同存异。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关键在于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求同就是坚持一致性，固守圆心，具体而言，就是坚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爱国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危害国家制度和法治、损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必须旗帜鲜明反对，不能让其以多样性的名义大行其道。只有坚守这条政治底线，巩固已有共识、形成新的共识，才能不断夯实大湾区统一战线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存异就是要在坚持一致性的基础上包容多样性，要正确对待多样性，有的多样性不涉及原则，可以存而不论；有的多样性有利于改进工作、减少错误，要鼓励和支持；有的多样性涉及大是大非问题，特别是危害国家安全的问题，必须旗帜鲜明亮明观点，积极主动加强引导。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基础上，加强团结、增进理解，充分释放促进大湾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正能量，不断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推动大湾区统一战线的实践发展

大湾区统一战线的任务、范围和对象等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要求统一战线的实践应作出新探索，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扩大工作视野，延伸工作手臂，在创新思路理念、政策举措、方法手段上下功夫，

不断拓展团结联合的覆盖面和包容性，切实发挥大湾区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作用。

（一）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大湾区大统战工作格局

1. 各级党委应高度重视，把统战工作纳入推动整体工作的范畴。使大湾区成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不仅要求在经济上实现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而且要求在政治上实现统一战线的大团结大联合，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在文化上实现文化融合发展，建设“人文湾区”，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多元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在社会上实现人民生活更加富裕，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要实现这些目标，要求包括各级党委在内的全社会形成“湾区共识”，广泛凝聚力量共同致力于湾区建设。各级党委应从战略高度重视和做好湾区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提高统战意识，把统战工作的重要性从思想上确立起来，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把统战工作视为份内事、责任田。大湾区里的各部门各单位要增强统战意识，齐抓共管，形成强大合力，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谱写大湾区大团结大联合的新篇章。

2. 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画好大湾区建设最大的同心圆。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统战工作的本质是党的群众工作，加强对统一战线成员的思想政治引领，增强共识，形成奋进力量，对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尤为重要。应在统一战线成员中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引导他们了解世情、国情，胸怀“国之大者”，正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深刻认识党中央推动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战略意义，增强在党的领导下攻坚克难、共谋复兴的自觉性。对错误的思想观念和行要态度鲜明，敢于批评，积极帮助，促进团结。把加强党的领导与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结合起来，深入到大湾区各项工作中，特别是要加强横琴、前海、南沙三大平台党工委的领导力量，并强化其统战工作职能，把统战工作和党建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融党建工作于统战工作中。

（二）运用好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助推港澳

青年和专业人士在内地良好发展

1. 针对影响港澳青年和专业人士进入内地发展的瓶颈问题开展深入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统战部门首要的职能任务。近年来, 广东各级政府为港澳青年进入内地发展打造了一些列平台载体, 如: 通过建设产业孵化园、联合创业园等方式为港澳青年创造良好的就业创业营商环境, 并在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银行贷款等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领域港澳青年也逐步获得了与内地居民平等的权利, 这些都离不开一直以来各级统战部门坚持不懈的调研建言和助力推动。为推动港澳青年更深入地融入大湾区, 应针对影响港澳青年和专业人士进入内地发展的瓶颈问题开展调查研究, 一是深入分析制约港澳青年在广东开展实习、创业、执业、兼职等方面的情况, 在此基础上对简化三地人才流动的管理程序进行深入的研究, 为推动大湾区人才在更大的范围内自由流动提供可能性建议; 二是对发挥在粤创业和执业的港澳青年和专业人士“双重身份”作用开展深入的调研, 探索建立港澳专业人士与内地专业人士在行业互联和专业互通的统战工作平台和机制, 为推动大湾区专业人士深度交流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2. 以推动三大合作平台建设为重点, 探索“一国两制”新实践的统战工作新模式。随着横琴、前海、南沙三大合作平台的建设发展, 统一战线成员及其的内部结构必然会发生某些变化, 统战工作应把三大合作平台建设作为研究重点, 及时跟进、关注这些变化并提出帮助统一战线成员解决工作生活中出现新问题、化解新矛盾的办法。同时, 结合不同统战领域特点, 以活动为载体, 以联谊交友为手段, 了解港澳青年的诉求, 拉近与港澳青年的距离; 照顾港澳青年主动参与的需求, 增强港澳青年对大湾区发展的参与意识, 畅通、创新参政渠道, 引导港澳青年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积极探索“一个两制”新实践、新平台的统战工作新模式。

(三) 以文化统战推动人文湾区建设

1. 坚持以先进的文化理念引领湾区文化融合发展方向。首先, 应坚持“一元引导”的原则。坚持什么样的指导思想, 确立什么样的文化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 直接决定着大湾区文化融合的方向和成

败。湾区文化本质和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是集湾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于一体的文化共同体。这就决定了文化融合应坚持意识形态一元化引导,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动摇。同时, 我们需要在“一国两制”条件下探讨湾区文化融合问题, 在促进文化融合过程中,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 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其次, 应坚持“多元共生”的原则。针对湾区文化的差别性大的特征, 在文化发展过程中, 坚持文化产业、文化产品乃至生活方式等的多元共生的原则。没有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就没有大湾区文化融合, 文化融合是为了保护不同文化的存在和发展, 形成文化新态势。正因为如此, 在开展文化统战过程中, 不能仅仅着眼于同一性, 而应尊重和守护差异性。只有处理好文化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关系, 才能使大湾区升格为新时代的文化高地。

2. 挖掘湾区统战文化资源, 构建两地民众共有的社会记忆, 提升湾区民众的文化自觉和自信, 增强“大湾区人”的身份认同感。首先, 唤醒粤港两地传统的文化记忆, 增强两地民众的民族文化自觉, 以最大公约数实现湾区文化的整合。大湾区的人文核心和灵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其是构建人文湾区的桥梁和纽带。要充分发挥粤港澳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优势, 积极筹划开展相关文化活动, 挖掘认同度的文化内容, 通过博物馆、出版印刷、图片图像、寻根谒祖等具象化的形式, 让三地共有的中华文化(岭南文化)记忆拥有更多的固着点, 唤醒三地民众共有的中华文化的社会记忆, 增强两地民众的文化自觉。其次, 加大湾区新兴文化的宣传力度, 讲好湾区文化创新故事。港澳两地作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历史交汇地, 曾经是中国内地人民了解世界文化潮流的重要窗口。尤其是香港, 在过去几十年间, 曾经向中国内地输入包含港片、港剧、流行歌曲、武侠小说等在内的诸多文化产品, 对一代人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 如今内地的流行文化正焕发着勃勃生机, 除了传统的影视娱乐之外, 新文

化产业如网络文学、电子游戏、二次元动漫等,均已发展出相当规模^[5]。在大湾区的文化产业发展中,特别是通过影视、音乐、书画、媒体、宣传、娱乐、互联网等途径,把“我是湾区人”“大湾区与人生价值实现”“创业在湾区”等文化理念融汇进来,讲好湾区故事,构建两地民众共有的新的社会记忆,通过共同文化的构建为两地民众寻找到一种新的归属感,从而提升对湾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对“湾区人”的身份认同感。

3. 深化文化统战内涵,深度开发大湾区“文化+”的发展模式,塑造和丰富湾区人文精神内涵,增强文化软实力。一是推动“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构建湾区文化产业带,把湾区内的农耕文化、海洋文化、侨乡文化,岭南文化、客家文化、粤商文化、港澳文化等资源充分利用起来,通过艺术展演、人才培养、非遗文化合作、博物馆与文创产业等方式,整合文化资源,构建湾区文化产业带。二是推动“文化+教育”的融合发展。根据不同阶段的学校教育培养目标和当地社会发展需求,将多元文化融合的内涵与要求融入到课程设置与课程建设之中,使其成为课程考核的内容之一。同时,开设第二课堂满足学生多元文化融合需求。设定不同主题教学需要,在粤港澳三地各选取一批教学实践基地,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大湾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更多机会参与到社会实践和社会文化发展创新之中。

三是推动“文化+媒体”的融合发展。应建立健全有效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的体制机制,完善湾区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切实提升大湾区各城市文化品位,打造大湾区城市文化名片,扩大岭南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同时,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综合运用 AI 等互联网新兴技术,创新人文交流方式,丰富文化交流内容,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促进粤港澳三地文化交流融合。

参考文献:

- [1] 谢福湛.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形势报告(2022)[R],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年2月版.
- [2]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奋力开创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J]. 求是, 2021(1).
- [3] 王怡. 霍启刚一句话又圈粉: 不想用“北上”形容去大湾区[EB/OL]. <https://lianghui.huanqiu.com/article/9CaKmKiT5x>, 2019.03.10.
- [4] 周楚卿,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何超琼: 我是大湾区人[EB/OL]. http://www.news.cn/politics/2023lh/2023-03/07/c_1129417350.htm. 2023.03.07.
- [5] 文化产业实现规模效益双提升——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系列报告之五[EB/OL]. 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11/t20191129_1712684.html.

【责任编辑: 余伟】

十九世纪晚期香港海港检疫制度述论

周晓杰

(中山大学, 广东 广州 525000)

摘要: 粤港澳“九市二区”商贸往来频繁, 卫生安全重要性越发突显。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卫生检疫制度可上溯至十九世纪末英国殖民政府统治时期, 港英政府的海港检疫制度既有殖民宗主国本土海港检疫理念的影响, 又根据香港地方社会的独特因素做出了在地化调整, 并不断对其进行修订与完善。这一卫生治理的历史经验, 或可为当前“一国两制”框架下粤港澳互相深化理解, 强化卫生检疫事务的合作互信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 香港; 海港检疫; 卫生治理;

中图分类号: D6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2-0069-08

粤港澳大湾区一衣带水, 人员商贸往来频繁, 共同协作防治传染病、寄生虫、动植物疫情、保障国境卫生安全是湾区“九市二区”共同课题。香港作为一历史悠久的成熟自由贸易港, 其港口卫生治理的历史经验尤为丰富。工业革命后, 欧洲扩张导致霍乱大流行, 海港检疫成为当时外交讨论的主题。^[1]十九世纪下半叶, 随着欧洲各国殖民扩张, 海港检疫制度也随着殖民力量的触角逐渐被移植到到远东地区, 各港口先后在疫情侵扰中执行一些海港检疫章程。香港作为英帝国殖民地, 也在英国本土海港检疫理念和制度的影响下, 开始了最早的海港检疫实践。本文试图通过梳理香港开埠初期港英殖民政府主导下海港检疫的历史脉络, 理解香港当前卫生检疫的制度由来, 希冀为当前“一国两制”框架内粤港澳大湾区出入境卫生检疫事务的合作、互信、互助机制提供一些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参考。

一、英国殖民扩张与英式海港检疫制度

大航海运动后, 世界各个角落被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 欧洲各国逐渐走上殖民扩张之路, 英国殖民力量在遥远的东方逐渐扩张, 17 世纪后印度逐渐

成为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此后的两个世纪中, 英国逐渐以印度为中心, 不断在远东扩张其殖民力量, 锡兰、海峡殖民地、香港、马来西亚等地逐渐被纳入其殖民网络, 并在鸦片战争后将其势力触角向中国东南沿海一线延伸。原本流行于印度恒河流域的霍乱, 也扩散至整个欧亚大陆, 甚至美洲、非洲各地。^[2]霍乱不再是印度恒河流域的地方病, 而逐渐成为了一项全球性的议题。欧洲医学界、各国政府如何在如何预防霍乱、如何治疗霍乱这一全新社会议题下开启了充满曲折和争论的探索历程。^[3]

1802 年巴黎成立了公共卫生委员会,^[4]1817 年, 德国卫生学家弗兰克出版了《全国医学监督体系》,^[5]健康权利的思想和政府责任概念逐渐开始萌发, 欧洲各国政府逐渐开始成立卫生检查机构, 通过完善城市供排水系统、改善道路住宅等方式防治霍乱等传染病的蔓延。

在此之前, 隔离 (quarantine) 是欧洲对付传染病最常用的办法, 即将染疫或疑似染疫的船只、人员和货物进行强制停船和清洁, 其中盛行“各种轻率、荒谬的陈述和松散、无关紧要的推理”, 检疫的效果大打折扣, 已经不足以成为公众健康的保障。^[6]同时, 霍乱的病因并不明确, 欧洲医学界采

收稿日期: 2023-03-20

作者简介: 周晓杰 (1991-), 女,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用的各种应对方法也被证明在霍乱流行面前几乎都是无效的。很多人已经认识到霍乱是一种传染性疾病,但霍乱具体如何传播、其传染源是什么、具体通过何种方式传播,却存在各种分歧。

英国采用环境主义态度,主张以公共卫生治理的方法取代原有的简单粗暴的封锁与隔离,改善城市卫生状况、修建城市供排水系统、改善房屋环境等成为这一时期英国治理霍乱流行的主要手段。^[7]在环境主义者看来,单独的海港检疫措施已经宣告失败,施行最严格最系统的海港检疫的国家并不会比其他国家更免于瘟疫侵袭,比如葡萄牙和那不勒斯发生瘟疫的频率就远高于荷兰。^[8]

1858年,利物浦英国社会科学促进会年会决议成立一个检疫调查委员会,并希望医学界同仁关注检疫这一国家医学非常重要的主题,因为它深刻影响着所有的海洋商业国家。^[9]在此后的几十年间,英国先后颁布1864年《传染病法》、1872年《公共卫生法》、1875年修正《公共卫生法》、1892年《霍乱令》等法律法规,采取卫生治理和医学检查等手段,在口岸城市建立港口卫生局,将港口卫生问题纳入地方卫生治理当局统筹管理。^[10]在海港检疫的过程中,也不再通过传统的隔离与封锁进行疫情控制,强调医学检查的重要性,以尽量减少对健康乘客的隔离限制,与地方卫生当局合作对登岸乘客进行健康监测。抵港船只中传染病病例强制送医,疑似病例进行48小时隔离。^[11]

通过这一系列立法和规定,英国在其本土建立起一个港口卫生与地方卫生统筹管理、沟通合作以防控传染病扩散的海港检疫制度,避免了对抵达港口的船只实施长时间的扣留和隔离,这样一种带有明显公共卫生色彩的医学检查防疫体系,在英国各口岸城市运行良好,也逐渐获得更多国家认可。

二、霍乱大流行与远东各地海港检疫的施行

殖民扩张给19世纪下半叶东亚霍乱大流行提供了条件,霍乱就开始从中国南方传播到北方的山东、北京等地,此后逐渐开始全国蔓延之态势。与中国东南沿海处于同一贸易圈中的台湾、朝鲜、日

本也逐渐被波及。^[12]远东各地殖民地港口当局往往采用发布临时性检疫章程的方法进行疫情防控工作。

不同殖民宗主国主导下建立的海港检疫章程,往往带有其宗主国本土海港检疫理念的深刻影响。1872年东南亚发生霍乱疫情,印度圣乔治堡当局制定一份海港检疫章程,提交印度总督及理事会批准通过,规定船只抵港十日前出现传染病需进行10天的停船隔离。^[13]1873年3月20日,英属缅甸通过一份海港检疫章程,内容与英属印度几乎一模一样。^[14]

而1881西属菲律宾的海港检疫章程,与英属印度、英属缅甸相比十分严苛。从最关键的检疫期来看,该章程规定,来自有疫港口的船只均需停船检疫,未出现病例者隔离15天,出现病例者隔离20天。停船出现病例需再追加20天。^[15]

除各殖民地外,中国沿海港口、日本港口也在19世纪70年代前后开始尝试颁行海港检疫章程,施行海港检疫。1872年11月,香港殖民当局在一艘到港落客的德国轮船中发现一名天花病例,遂电告英国驻上海领事,英领随即通知江海关税务司,经过中外协商斡旋对该船登船检查。^[16]1873年,东南亚霍乱流行。鉴于上海与暹罗舟楫往来频繁,各条约国领事与江海关监督协商后,海关颁布《上海临时海港检疫章程》4则。^[17]8月,厦门关税务司颁布了由各国领事共同批准通过的临时检疫条例3则,宣布对新加坡、暹罗实施检疫。^[18]此后中国沿海各口岸也相继开始通过颁布临时性海港检疫章程、施行海港检疫。^[19]

由于近代中国海关医官许多为英籍,制定的海港检疫章程也带有较为明显的英国色彩,甚至更为宽松。就来自染疫地区船舶的检疫期来看,1874年江海关颁行的检疫章程规定:来自染疫地区的船只在入港时须接受登船检查,若航行期间没有发生传染病,船舶可以立即放行;若航行途中发生传染病,但该传染病人在航行途中离开船舶,船舶可立即放行;若在航行期间有因传染病死亡病例,则船舶可被隔离一到两天;若航行期间出现多例传染病病例,船舶需在指定地点停泊,患者需隔离,并对船只和货物进行消毒;卫生官员和领事可酌情决定延长或

继续隔离时间。^[20]

邻国日本也是自1873年东南亚霍乱是尝试制定海港检疫章程，试图对抵港商船执行严格的海港检疫章程，但这一尝试遭到了英国等西方国家阻挠，主要是对海港检疫主权的归属日本有所不满。欧美各国的这种态度在中国各港口的海港检疫实践中也有所体现，中国各港口颁布的检疫章程往往规定宣布疫区、颁布检疫章程的权力由海关税务司、各国领事与地方政府共同掌握。

由此可见，各英属殖民地及受英国影响较大的海港检疫章程往往比其他殖民地的海港检疫章程宽松许多。单就最直观的隔离检疫时间而论，英属殖民地的隔离检疫时间一般被定为10天，即使是英属澳大利亚针对中国有疫口岸的船只实施超长检疫隔离，也不过16天。而西属殖民地的海港检疫章程则规定了最基础的20日或15日检疫。各英属殖民地的海港检疫章程也更为注重维护商业利益，强调各口岸对需进行登船检查的船只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不得拖延。

三、香港之海港检疫制度简述

与远东其他港口城市类似，在疫情的冲击下，香港也在这一时期颁行了海港检疫章程，施行海港检疫。1872年10月4日，署理辅政司金文泰发布公告称接到医务部门报告称发现登革热，特通知所有抵达香港的船舶若有任何发烧病例需进行检疫隔离。^[21]初期的章程十分简单，大致是要求来自染疫港口的船只停船检疫十日，若曾出现霍乱病例，则需自出现病例之日起十日内未再次出现病例，方可获得入港许可。^[22]这与印度、缅甸等英属殖民地的检疫章程类似，对船舶和人员的隔离检疫较为宽松。

此后，香港殖民政府在不断施行的海港检疫实际操作中对这一简单的海港检疫章程不断进行修订和完善，检疫程序、检查内容、检疫对象等检疫工作的细节逐渐完备，海港检疫权力归属逐渐明确，各部门协同合作进行海港检疫的工作模式也逐步确立。

首先，明确了需要接受海港检疫的对象为“船只由有传染症之地来港者”，船只为“火船、帆船、

渡船、头猛等船只”之总称。划定专门的停船隔离检疫区域：西界：由昂船洲西边至青洲西边一带、在海道图号为港口界之处；南界：有九龙水师煤炭厂建在其东斜向南之处、接连东西二界；东界：由昂船洲南边一白色号标起向南一直至南界止；北界：海道图列三丈水深之处。^[23]

第二，详细规定了规定海港检疫之具体程序与检查内容。来自有疫地区的船只需在早6点至晚上7点之间驶入港口，悬挂国际通行黄色Q字旗于船之最前最高桅顶处；进入检疫界内的船只除遭风外不得擅离该处；来自有疫口岸的船只在离开疫区后满10天后方可解除检疫，并对船只、衣物等进行熏蒸消毒。若船上有霍乱病例或死亡病例，则需自患者痊愈或死亡计满10天后，方可解除隔离。检疫期间若发生死亡病例，则应按照港口医官指令处理尸体。船只检疫时，除港口医官外任何人不得接近该船只30码以内。^[24]

第三，海港检疫权力之归属逐渐明确。1879年，香港辅政司之禁船入港之规条规定：“当获知任何国家或地区出现任何传染病时，总督可在其认为有必要保护殖民地公共健康时、对来自该国家或地区的船只施行海港检疫章程。^[25]1883年7月，督宪会同定例局将1879年商船条例修订并颁布1883年厘正条例，修订其中关于检疫之条款，对1879年第8号法令进行修订，删除原有第25条，并增加“督宪会同定例局准可随时设立章程、或将已立之章程删改增添，以便在本港海面将扣留船只之事办理有成，及分设合宜地方为扣留船只所，并在此等地方羁留，由遵守此例之船到埠诸人”。这样，明确了港督会同定例局共同制定检疫章程的权力。

第四，警方参与海港检疫，明确了违反检疫章程的处罚措施以及警方逮捕违反检疫章程者的权力。在海港检疫过程中，警方可与港口医官互相配合，总缉捕官及其委任各员有权管理被检疫船只乘客及被送往检疫站隔离的患者，并可视情况所需而强制勒令疏忽或违反防疫规则的人员遵守检疫章程。明确违反检疫规定者，经巡理府两堂同审，最高可处以2000美元罚款和十二个月苦役监禁，有无苦工不等。警方负责拿解追捕违反条例或私自逃脱之人。^[26]

第五,对于检疫豁免权的规定。海港检疫并不是单纯的卫生行政,往往受政治力量影响。1878年香港署理辅政司裴乐士发布公告,申明英国政府船只只需要与商船一样遵循港口所在地的海港检疫章程,接受港口卫生当局的检疫隔离;但同时也做出了让步,规定当地官员不得干涉船只内部管理与出海自由。^[27]这一豁免权最初只适用于英国政府船只,此后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停驻香港的各国兵船也获得同样的豁免。^[28]

第六,英帝国驻外公使领事、各英属殖民地政府是香港执行海港检疫时疫情情报的重要来源。及时可靠的疫情信息是海港检疫有效施行的基础,香港的疫情信息系统十分倚赖英国各殖民当局和驻外使领。本文统计《香港辕门报》自1872到1894年香港辅政司宣告执行海港检疫的公告,其中绝大部分疫情信息来自英国驻各地公使领事的电报,少量来自海关系统,^[29]此外,日本驻香港领事也会主动提供日本疫情信息。

各英属殖民地当局、英国驻外公使等往往在各口岸出现霍乱等传染病流行时向香港辅政司发送电文,构成了一个较为高效的疫情通报网络。以日本1885年霍乱疫情为例,1885年8月,日本长崎出现霍乱,英国驻日公使通过电报告知香港辅政司称日本已经强制对经行长崎或始发长崎的英国及他国船只施行医学检查。^[30]此后,长崎霍乱疫情逐渐蔓延,9月8日,日本驻香港领事收到日本通告之长崎疫情情况,随即将这一信息转达香港辅政司,告知日本所有港口均开始强制执行检疫,^[31]香港辅政司将这一信息公布在《香港辕门报》。此后,日本霍乱疫情信息也不断通过英日港之外交系统进行通告,日本内务省多次宣布新增疫区及施行检疫,信息由日本外务省照会英国驻日公使、再由英国驻日公使电告香港殖民当局。^[32]疫情一直持续到11月底,11月28日,英国驻日公使电告香港称长崎已经取消海港检疫限制,^[33]其他各港口对于经行疫区船只的隔离检疫随后也逐步取消。

而在各英属殖民地当局往往直接通告疫情信息,通告内容不仅包括当地传染病信息,也通告涉及香港、中国等地的海港检疫信息。1877年3月英属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告知香港辅政司称将对香港和

中国所有船只施行16日隔离检疫。^[34]1881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殖民大臣向香港告知南威尔士洲决定对所有由香港和中国沿岸港口抵达悉尼港的船只进行隔离检疫。^[35]

总而言之,十九世纪末,香港殖民当局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海港检疫制度,海港检疫权由督宪会同定例局掌握,疫情信息主要依靠英国外交使领系统及各英属殖民地当局进行通告,港口医官施行宽严程度较为折中的10天停船检疫,各部门协同合作进行海港检疫的工作模式也逐步确立。

四、宽与严:香港海港检疫章程的修订

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其海港检疫和卫生治理的观念不可避免会受到英国本土的影响。但英国本土海港检疫制度必须配合以良好的地方卫生治理才能运行良好,而香港显然并不具备这种条件,所以施行的海港检疫措施也比英国本土更为严格。这就导致了商人群体的不满。

另一方面,合理的海港检疫措施应该基于对传染病发生规律和传播方式的了解,但19世纪中后期的传染病知识储备并不足以对海港检疫措施做出什么有效的指导。虽然霍乱弧菌已经于1883年被发现,但这一新发现并未能迅速获得医学界完全认同,仍有不少人对霍乱的传染性有不同观念。这就导致时人对海港检疫存在不少讨论。

1885年,罗马国际卫生会议提出了一项关于霍乱检疫的提案:来自霍乱有疫港口的船只,船员及乘客均需进行5天隔离。这一提案遭到英国代表的反对,但最终仍以多数票获得通过。但会议也增添附加条件:若十日内船舶内未出现霍乱病例,则只需进行24小时隔离观察。差不多同时,英国医学协会年会也对海港检疫问题进行讨论,专门研究印度霍乱问题的普林格博士在会议上作了关于“霍乱化港口”海港检疫问题的报告,认为当前的海港检疫措施应该进行修正,霍乱病例与染疫船只的隔离时间过长,不符合医学界关于霍乱潜伏期的认知,隔离48小时就已足够,但也有与会者认为应隔离3天以防万一。可见,当时的医学界对于海港检疫的基本态度是进行适当的放松,其中英国医学界的态

度可以说是比较积极激进的。^[36]

1886年1月25日，香港总商会主席致函香港署理辅政司，援引英属印度当局此前审议的《亚洲霍乱病因调查》，声称当前医学界最权威人士均认为认为卫生警戒和检疫限制对防治霍乱蔓延无效，而且有其危害性。他认为，唯一有效的预防措施是进行卫生治理，因此他建议取消当前的海港检疫。^[37]香港殖民政府召集殖民地医官与驻港英军代表共同召开会议进行讨论。

这一提议遭到一些反对，主要理由是香港的卫生状况堪忧，如果疾病一旦传入，会造成巨大损失。^[38]虽然香港开埠伊始就开始进行公共卫生建设，但主要集中于在港欧洲人社区和军队，华人聚居的太平山卫生条件十分恶劣。直到1894年鼠疫爆发之前，香港华人社区卫生问题一直没有获得更多的关注，也未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最终，会议在综合考察了多方意见，并参考了当时欧洲的各种卫生会议之后，决定维持对霍乱有疫港口始发或经行船只的检疫措施，但就检疫期时长做出调整。^[39]1886年3月，香港殖民政府公布修订后的海港检疫章程，规定来自有疫港口的船只航程不足3日或3日内病例者，须接受隔离检疫；若来自有疫港口或出现传染病病例或死亡，则需自出港或病人痊愈、死亡之日起计足3日方可免除隔离。为了配合这一更加宽松的检疫章程，香港殖民政府更加注重卫生治理，并针对华人聚居区进行了持续性的卫生改良工作。^[40]

关于修订海港检疫程序的讨论并未结束。1891年，香港署理辅政司古德曼成立一个调研香港海港检疫制度的委员会，成员包括署理总督白加、首席大法官罗素、代理理船厅夏士廷、怡和洋行大班香港总商会会长江思顿·凯瑟克、华人代表何启、殖民地医官菲利普·艾尔思、港口卫生官佐敦。^[41]其成员带表洋人、华人、军队、海关、商人等不同社会角色。此外，委员会还委托秘书设法获取中国、日本、马尼拉、西贡、新加坡等港口的海港检疫章程之副本，以资参考。^[42]

委员会一共召开了五次会议，邀请了英国海军医官佩特森、西医学院副总监特恩布、以及多名香港执业医生与会，以参考不同社会身份的医疗工作

者的专业意见。佩特森曾有在毛里求斯和新加坡等热带地区进行医疗卫生及检疫的工作经验；格拉克医生有丰富的港口卫生医疗经验；坎特利医生曾长期担任埃及霍乱医学委员会成员，有丰富的海港检疫经验。他们大多从现代医学与卫生观念的角度出发讨论适用于天花、霍乱的海港检疫方法。对于霍乱与天花的海港检疫措施，医生们大多认为当前香港的检疫措施应当进行放宽，但对于应放宽到何种程度有一些分歧。

对于霍乱而言，医生们对霍乱的传染性表示怀疑。大多数人谨慎地表示并没有明确追踪到霍乱直接通过人传人方式传播的病例，西医学院副总监特恩布则明确表明他认为霍乱并不是一种传染病。曾长期担任埃及霍乱医学委员会成员的坎特利医生基于这一工作经验，论述海上检疫对于防控霍乱是徒劳无功。^[43]因此他们大多主张对有疫船只的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后，被判定为健康无疫的乘客应被允许立即登陆，即使进行短期隔离，当前执行的3天隔离检疫期也过长。

对于天花而言，医生们的态度也比较统一。天花是非常明确的传染病，潜伏期18天，但港口当局很难对乘客实施18天隔离，且天花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地方病，因此他们主张通过接种牛痘来实现对天花的检疫。华人代表何启的态度尤其强硬，主张对天花染疫船只的乘客进行强制接种，否则需要接受18天拘禁隔离观察。^[44]

事实上，他们也承认放松海港检疫会产生一定的风险性，但他们认为这种风险无法通过隔离来避免，只能依靠良好的卫生条件。供水和排水部门的工程师、署理监事库珀报告了1886年来对香港、尤其是太平山华人社区卫生改造工程的进展，表示供排水工程已经展开并取得相当进展，但华人房屋卫生方面则需要进一步改造。^[45]

除了参考医学卫生方面的专业意见，委员会还有其他政治、经济方面的考量。港口医官佐敦认为从卫生角度出发，天花有疫船只并不需要拘留隔离；但从政治角度考虑，结合附近其他国家港口具体情况，他认为对她们进行短期拘留隔离（不超过36小时），以显示对其他港口当局的尊重。^[46]船东和航运代理人的态度一以贯之，江思顿·凯瑟克表示

完全反对隔离检疫章程。^[47]

最终,委员会形成了一份报告,对于海港检疫章程提出了4条修改意见。1892年6月1日,修订后的海港检疫章程正式生效。新章程中对于传染病的隔离检疫标准进一步放宽:港口医官对染疫船只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后,如有发现传染病患者,则需转移到医院船进行隔离治疗;疑似病例需进行隔离,其他检查健康无疫者可获准立即登陆;隔离观察与船舶消毒时间不应超过48小时;期间产生的费用由船东承担。^[48]

五、结语

回顾19世纪下半叶香港海港检疫制度逐渐修订、完善的过程,这一制度的建立与运行,涉及各殖民帝国本土检疫观念、殖民当局与地方社会之关系、殖民宗主国对海外殖民地的管理理念等多层关系。英国作为香港的殖民宗主国,并不强求香港的海港检疫制度必须与英国一致。1885年英国外交部曾指示香港总督宝云:“英国政府无意要求所有殖民地必须按照英国本土方法执行海港检疫,如果殖民地公众舆论强烈赞成施行严格的海港检疫章程,殖民地也可以按照各地不同的情况进行检疫章程的调整。”^[49]同时,香港殖民政府长期施行华洋分治政策,早期的公共卫生建设主要集中于欧洲人社区,其公共卫生建设主要为争取在港英籍殖民者的利益,而对华人聚居的公共卫生问题没有太多重视与投入,这就导致在英国海港检疫制度并不适用于香港的具体情况。但直到1894年香港鼠疫爆发、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甚至造成殖民统治危机,香港殖民政府才开始强力介入华人社区卫生事业。

以史为鉴,香港特别行政区卫生检疫制度的历史也可以为后疫情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公共卫生安全及治理提供一些历史的经验教训,以避免再次重蹈19世纪末卫生治理区域失衡、传染病信息沟通不畅之覆辙。“一国两制”框架下,各方或可通过对彼此卫生检疫制度历史中共性与个性的了解,坚持“一国两制”框架的同时,继续深化改革,以使卫生检疫制度更好地适应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方社会的独特风貌,从而加强区域协同合作,深化卫生检疫信息

交流与互助,更好地迎接新时代大湾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参考文献:

- [1] David P. Fidler. The globalization of public health; the first 100 years of international health diplomacy[J].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1, pp.842-849.
- [2] J. N. Hays. The Burdens of Epidemics: Epidemics and Human Response in Western History. 2th edition[M].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9:136.
- [3] 毛利霞.从隔离病人到治理环境:19世纪英国霍乱防治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46.
- [4] 王明旭、赵明杰主编.医学伦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14.
- [5] 孟君、张大庆.大众科学技术史丛书大众医学史[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204-205.
- [6] Milroy G. Quarantine and the Spread of Epidemic Diseases[J]. Medical Critic and Psychological Journal, 1861 Apr;1(2), pp.205-210.
- [7] Peter Baldwin. Contagion and the State in Europe(1830-1930)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1-27.
- [8] Milroy G. Quarantine and the Spread of Epidemic Diseases[J]. Medical Critic and Psychological Journal, 1861 Apr;1(2), pp.205-210.
- [9] Milroy G. Quarantine and the Spread of Epidemic Diseases[J]. Medical Critic and Psychological Journal, 1861 Apr;1(2), pp.205-210.
- [10] J. C. McDonald. The History of Quarantine in Britain During the 19th Century[J].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25th Jan, 1951, pp.22-44.
- [11] A. Hardy. Cholera. Quarantine and the English Preventative System(1850-1895)[M]. Medical History, 1993.3.37: 250-269.
- [12] (日)饭岛涉著,朴彦、余新忠、姜滨译.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251.
- [13] Cecil C. Smith. No. 213. Government Notificatio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3th November,

- 1872:487-488.
- [14] Cecil C. Smith.No. 91. Government Notificatio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30th May, 1873:251.
- [15] W. M. Deane.No. 342. Government Notificatio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38th September, 1881:251.
- [16] Inspector General' s Circulars, No.245 of 188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近代海关总税务司通令全编(第一编)[G].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 2012:229-231.
- [17] 邓铁涛.中国防疫史[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223.
- [18]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Cambridge: W. HefferSons. 1959:404; Drs. Manson.Drs. Manson'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Amoy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3[G]. Medical Reports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4: no.6, 1873:20.
- [19] Drs. Manson. Drs. Manson'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Amoy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3[G]. Medical Reports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4: no.6, 1873:20.
- [20] Dr. Alexander Jamieson. Dr. Alexander Jamieson' 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Shanghai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74[G]. Medical Reports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1st March 1873: no.7, 1874:38.
- [21] Cecil C. Smith. No. 188. Government Notificatio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72-10-05:443.
- [22] Frederick Stewart. No. 24. Government Notificatio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81-01-27:343; J. II, Stewart-Lockhart. No. 275: Government Notificatio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82-07-01:01.
- [23] Frederick Stewart. No. 361. Government Notificatio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82-09-09:771-775.
- [24] Frederick Stewart. No. 361. Government Notificatio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82-09-09:771-775.
- [25] Frederick Stewart. No. 24. Government Notificatio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81-01-27:343; J. II. Stewart-Lockhart: No. 275. Government Notificatio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82-07-01:1.
- [26] J. H. Stewart-Lockhart. No. 304. Government Notificatio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83-09-15:747-749.
- [27] J. M. Price. No. 140. Government Notificatio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78-07-11:353.
- [28] Frederick Stewart. No. 77. Government Notificatio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86-03-03:158-160.190-191.
- [29] J. Gardiner Austin. No. 112. Government Notificatio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74-07-08.
- [30] Frederick Stewart. No. 346. Government Notificatio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85-08-29:628-629.
- [31] Frederick Stewart. No. 352. Government Notificatio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85-09-05.
- [32] Frederick Stewart. No.386. Government Notificatio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85-10-10; Frederick Stewart. No. 411. Government Notificatio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85-10-31.
- [33] Frederick Stewart. No. 454. Government Notificatio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1885-11-28.
- [34] H. E. Wodehouse. No. 83. Government Notificatio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77-04-07:195.
- [35] W. M. Deane. No. 342. Government Notificatio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81-09-18:874-875.
- [36]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Quarantine[J]. Sessional Papers,1886:138-139.
- [37]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Quarantine[J]. Sessional Papers, 1886:137-138.
- [38]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Appointed by His Excellency the Officer Administering the Government to Consider the System of Quarantine and Quarantine Regulations as Applicable to the Port of Hong Kong[J]. Sessional Papers, 1892:481.
- [39]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Quarantine[J]. Sessional Papers, 1886:138-139.
- [40]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Appointed by His Excellency the Officer Administering the Government to Consider the System of Quarantine and Quarantine Regulations as

- Applicable to the Port of Hong Kong[J]. Sessional Papers, 1892:481.
- [41] William Meigh Goodman. No. 486. Government Notificatio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91-11-28:1076.
- [42]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Appointed by His Excellency the Officer Administering the Government to Consider the System of Quarantine and Quarantine Regulations as Applicable to the Port of Hong Kong[J]. Sessional Papers, 1892:476.
- [43]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Appointed by His Excellency the Officer Administering the Government to Consider the System of Quarantine and Quarantine Regulations as Applicable to the Port of Hong Kong[J]. Sessional Papers, 1892:482-492.
- [44]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Appointed by His Excellency the Officer Administering the Government to Consider the System of Quarantine and Quarantine Regulations as Applicable to the Port of Hong Kong[J]. Sessional Papers, 1892:483-489.
- [45]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Appointed by His Excellency the Officer Administering the Government to Consider the System of Quarantine and Quarantine Regulations as Applicable to the Port of Hong Kong[J]. Sessional Papers, 1892:481.
- [46]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Appointed by His Excellency the Officer Administering the Government to Consider the System of Quarantine and Quarantine Regulations as Applicable to the Port of Hong Kong[J]. Sessional Papers, 1892:486-487.
- [47]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Appointed by His Excellency the Officer Administering the Government to Consider the System of Quarantine and Quarantine Regulations as Applicable to the Port of Hong Kong[J]. Sessional Papers, 1892:490-491.
- [48] G. T. M. O' Brien. No. 202. Government Notificatio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92-05-07.
- [49] Despatches Respecting the Question of Quarantine[J]. Sessional Papers, 1885:155-156.

【责任编辑：陈童敏】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逻辑理路探析

路浩轩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新的经济业态产生, 也孕育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他们在利益诉求和价值需要方面产生新的要求, 其中不良的价值观扰乱社会秩序, 影响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凝练的价值精华, 能够反应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呼声, 因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妥善之策。坚持凝聚共识、注重方式方法、发挥制度效力, 是新时代发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必要之举。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思想引领; 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 D6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2-0077-07

新时代, 站在国家建设发展的新起点, 经济社会发展愈加迅速, 产生了许多新的经济业态, 也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包括“民营企业 and 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1]。他们大量分布在新的行业产业中, 极具创新活力, 同时他们所处的产业行业不断深刻变革, 打破了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 使其成员的组成更加复杂, 也造成他们在利益诉求和价值追求方面多元化。当其利益诉求未能及时回应, 易发出不当声音, 做出不当行动, 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 产生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离散力。因此, 需要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 增强他们对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和价值认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 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价值凝结。作为主流价值观, 它“影响统率着其他层次的价值观念, 它最稳固、最持久、最有

统摄性, 也最具渗透性”^[2], 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以凝聚共识为根本, 以爱国奋斗为目的, 鼓励支持他们立足本职建功立业, 积极投身改革创新一线, 施展才华和抱负”、“不断增进共识, 真正把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全体中华儿女都团结起来”^[3]。团结凝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改革创新, 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增强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为以中国式现代建设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更加广泛的力量。

一、问题提出: 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社会思想价值多元化

(一) 经济社会发展导致社会思想观念多元化

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 经济社会发生了的巨大

收稿日期: 2023-03-20

基金项目: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校统战工作研究”专项课题“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创新发展问题研究”(21TZD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路浩轩(1997-), 男,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1 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变革,曾经单一的社会阶层和固有的社会结构模式被打破,新的经济业态在包容性极强的经济环境中不断涌现。与此同时,在市场决定社会资源配置的情况下,产生了许多新兴产业,形成新业态,市场价值观念也随之产生,新兴产业的不断涌现,带动着新的从业人员不断增多,新的社会阶层群体也不断壮大。在市场作用下,市场化的思维也充盈他们的思想价值世界,当良莠不齐的价值观念主导他们的选择判断,他们就会和主流价值观所要求的内容相悖,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经济的发展模式较为单一,经济结构和利益分化不明显,社会能够紧密有机地凝结在一起,社会一体化程度较高,社会价值观也较为单一,社会矛盾相对缓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作用的发挥越来越大,打破了单一资源配置方式,广大人民群众凭借自我的途径就可以积累财富。而“经济结构是引起文化结构变化和调整的原动力”^[4],因此,与之相对应的是他们的价值追求和思想意识变化。市场经济呼唤多元化思维,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依附性减弱,对自我权利的追逐更加明显,个体自主意识明晰。他们的自我价值观开始凸显,“要求有充分的政治参与途径,对政府回应性的诉求也更强”^[5],这些都使社会群体之间不同价值观的出现,挑战着主流价值观。

(二) 多元思潮冲击导致价值取向复杂化

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并且随着时代发展,与世界接轨的步伐越来越快,中国更加强调与世界经济大局的深入融合。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入融合的今天,中国与世界已然成为一个同频共振的有机体,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思潮也在影响着中国社会,其中一些消极思想侵蚀着部分人民群众,弱化主流价值观的地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伴随市场经济飞速发展而逐渐成长起来的新的社会群体,其思想价值形态也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一方面,市场经济推崇利益至上的思想被一些人视为人生信条,经济的深入发展也将市场被视为工具理性而大肆宣扬,以利为先的价值取向导致公共性、社会人文精神的弱化,社会当中的一些丑恶现象不断浮现,严重影响着良性的社会秩序。如

一些新兴起的不法商人为了追逐利益,勾结党员干部,向他们输送利益,腐败受贿触目惊心等。这些不良的社会风气影响党的良好形象,甚至对党的执政根基产生极大的影响。如若不能以良性的价值观念引领,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必将危害党的领导和社会的公序良俗。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极大的增强了广大公民政治参与意愿。在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要求政治的现代化,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参与动力机制,但是仍旧缺乏有序且高效的参与渠道。网络信息媒介打通了普罗大众之间的联系,人人都拥有“话语自由”,网络经济也应运而生,且业已成为一个重要产业,新媒体从业人员也随之产生。在互联网世界,倡导平等、自由、共享,这样的互联网特质契合了新时代要求的公众参与的现代化治理要求,他们可以在网络世界表达自己的诉求,阐明自己的思想和看法,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行化渠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新出现的阶层,当他们的利益和诉求未被满足,他们习惯以自身所擅长的方式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形成舆论阵地。但是,通过互联网相关载体,西方社会的价值秩序和民众追求加速酝酿传播,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也在潜移默化中吸纳西方的民主政治价值观,也对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作出相同的要求,“一旦感到政府的输出与自己的期望存在差距,公民就会表现出对政府的不满意”。^[6]这些不满和对西方价值观的认同直接挑战着我国的主流价值观,容易引发社会问题,产生社会矛盾。

二、内在契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逻辑

经济社会的发展分化出了新的社会阶层,他们呼吁着自己的利益诉求,而“利益是社会运动的本质”^[7],当他们的利益呼吁未被有效满足,就会冲击当下政治秩序。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就需要一定的制度保障和文化支撑,以引领他们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实际探索的基础上凝结出的共同信仰标准,代表着各阶层的利益,在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上的倡导,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利益包容性,是团结广大人民群众

核心价值导向。因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新的社会阶层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

（一）民族复兴：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价值追求

计划经济体制在新中国确立之后，人民大众的生活和发展受到国家和政府的计划和主导，社会的经济形态简单，社会阶层流动性小。同时，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模式呼吁以集体利益为重的价值观，也就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一些个体的私人利益。不过就时代需求和实现效果而言，这样的社会主导价值观虽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实现了国家的稳定和生产力的有序发展。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社会大众作为市场活动的微观主体，作用越来越凸显，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的新阶层人数不断增多（见表 1），社会经济发展领域不断拓宽，社会大众的个体诉求也不断彰显，伴随着信息网络和多元思想影响的加速加深，人民的思想价值观念多元化趋向明显，思想领域之间的交流交锋日趋激烈，如何有效团结新时代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凝聚共识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

表 1 2012-2019 社会新阶层人数变动情况^①

年份	私营企业就业人数	外商投资单位城镇就业人员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其他单位就业人员
2012	11296 万人	1246 万人	156 万人
2013	12521 万人	1566 万人	277 万人
2014	14390 万人	1562 万人	298 万人
2015	16395 万人	1446 万人	314 万人
2016	17997 万人	1361 万人	330 万人
2017	19882 万人	1291 万人	368 万人
2018	21375 万人	1212 万人	399 万人
2019	22833 万人	1203 万人	435 万人

因此，在信息多元的时代，面对人民群众对于权威性价值观的呼吁，就需要以更强大、更包容的价值共识引导他们。核心价值观是芜杂的价值思想当中最深层、最权威的精神文化力量，是广大社会成员的共同信仰和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描绘国家发展的蓝图，这份“规划书”包含着广大华夏儿女对祖国未来发展的想象与期待，是最能唤起中国人民共鸣的思想。近代以降，无数的中华儿女都始终期盼着祖国强大、民族自豪。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对国家未来发展前景的擘画唤起人民群众的共识。哈贝马斯认为，人之所以认同一种思想，是因为这种思想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与人的利益密切关联。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虽然在利益诉求等方面有自身的主张，但是希望祖国繁荣，民族富强也是他们共同的心愿。民族复兴伟业倡导的中国梦发展目标与全体国民的希冀一致，也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理想目标高度契合，因此，在国家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有效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认同的价值目标。

（二）公平正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紧密结合，面对社会不断发展变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理论政策不断适应变化而创新发展。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也是如此，针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强调要“坚持思想引领，凝聚社会共识。”^[8]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发轫于新的经济环境，他们其中不乏有海外教育背景的学生及与西方接触的年轻人，当他们不理解中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的价值主张时，就会倡导西方民主和自由，散播负面情绪，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取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党基于国情所呼吁的价值观念，能够有效容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于社会层面的主旨诉求，使他们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其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新阶层是伴随改革开放发展成长起来的，每年有大量的知识分子进入新的社会组织 and 经济组织，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党外人士”^[9]。他们虽然对事物有着自身的价值判断和自我的看法，但也容易受到欧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崇尚个人利益至上和民主平等。另外，互联网新型媒体技术发展的也催生新一代新媒体阶层，互联网世界包含着鱼龙混杂的信息，当社会主流价值观未能引领网络世界的亚文化，一些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价值观就会和

主流价值观所倡导的思想相悖。

以社会成员认同的价值共识为载体,能够使广大的社会成员达到和谐的状态。中国共产党基于文化基础和我国国情,对社会层面做出的价值目标,能够最大限度实现社会成员对社会发展的期望和切身利益。呼唤自由的社会环境,提倡平等的共同愿景。使得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得到保护,让公平正义的氛围萦绕整个社会,这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也能有效的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利益诉求涵盖于内。力塑和谐的社会关系,以法律为准绳,为社会公平正义追寻和矛盾化解寻找最优解。依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价值规则,能够在理性层面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所认同,进而有效发挥引领功效。“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中国当代的价值呼吁和时代表达,契合当下时代特点和时代要求,它全面深刻的揭示社会公民的精神内核,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价值需要和追求,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价值基础。

(三) 厚德尚善: 现代化的人与中华伦理范式

思想价值的正确与否需要立足实践,让实践做判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以中国式的智慧实现每个人之间的道德平衡,其内在也彰显着中华民族的实践理论,其对全体社会公民的价值规范、价值追求、理想信念、品德追求等方面都做了具体的阐释,指出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公民应有的品德操守,也在生活实践中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

近年来,唯利主义有所抬头,对于利益的追求导致部分社会群体出现道德滑坡现象,利益至上的歪曲价值伦理正在成为一些人生的人生信条。这些价值取向使社会变得更加淡漠,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也时有爆发。那些当前在社会当中出现的社会道德失范问题,不断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值得我们反思的,偶然事件背后也有必然性因素,需要我们探究一些群体的价值错位和价值真空问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工作领域相对较为新颖,他们面对着新的经济业态也呼唤能够保护自身利益的价值观念。如那些私营企业管理技术人员更希望得到公平、高效的营商环境,社会中介组织希望得到更畅通的

利益表达渠道,等等。当这些诉求未能有效得到满足,他们就会以情绪化的方式散播不良言论,煽动群体对立,社会稳定就会受到威胁。另外,当没有主流价值观的有效引导,一些成员甚至会对价值观呈现漠然状态,面对社会问题就出现价值判断来回动摇。这些问题也引起大众的深切思考。呼吁“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给予广大人民群众以合理价值判断标准,给广大人民群众以道德判断和评价的准绳,当人人认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提倡的个人道德范式,就会营造一种和谐宽容、公正友善的社会气候。因此,人们之间的自我道德约束能够塑造一种现代化的和谐环境,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利益诉求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得到保护,形成共同价值的认同,进而有效地将他们凝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上来。

(四)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现实可能

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通过文化权的诱导和意识形态传播来统摄其社会成员。在中国,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来团结广大社会成员。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较为抽象,其得以有效渗透至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则主要凭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微观介体。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华各族人民经历改革建设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群众,整合社会的过程。同时,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观念具有生命力,能够符合广大群众的心理期许,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才会后继有人。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这也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重要前提。

照顾同盟者利益是统一战线一项重要原则。新时代,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不仅要有科学准确、包容性强的价值观念凝聚共识,更要在引领凝聚的过程中照顾他们的合理利益和诉求。新时代,我国的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业并取得非凡的成就,我国的综合国力飞速提升,广大人民群众从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感受了国家发展所带来的实

际利好，全面脱贫的实现展示了新时代以来中国发展的殷实状况，这些都为人民群众认同中国共产党，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物质前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包容性的经济社会环境当中，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能够有效实现自身发展，这将更有利于调动他们投身国家建设和回馈社会的积极性，为国家和社会注入新的力量。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虽然带有自身的独特性，但是他们也处于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之下，就基本的价值诉求而言，虽然有一些差异，但是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他们与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与中国社会的大多数公民对于党所倡导的价值观持积极的认同状态，他们普遍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也有自身的新特征和个人的新特点，也会存在与社会普遍价值观不相适应的思想行为，因此需要“调整自身的政治心理使之与所属群体保持一致”^[10]，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在整个社会成员相同或者相似的生活需要、价值追求背景之下，他们都有共同的心理愿景，都能自觉提倡并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呼吁，这是得以整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基础。

三、路径探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对策思考

当社会历史境遇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根据客观实际，积极创新思想理论，更好的指导实践。党的二十大中指出：“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强化共同奋斗的政治引领。”^[11]团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需要建设起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价值体系，夯实社会大众的思想认识之基，最大限度上用社会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念凝聚人心，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团结力量。

（一）坚持思想引领，推动凝聚共识

一种思想意识得以发挥效力的前提是它能被人们认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凝聚整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就要首先得到他们的认同。一是要充分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人心的作用。生产力

的不断发展，使我国的产业行业愈加多彩，在这种背景下新的社会群体和组织应运而生，他们都是时代发展的结果。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多具备良好的知识储备和较高的技能水平，他们有着自己的自身独立的思想认识和价值判断，曾经较为统一的“一元化”价值观已然不符合社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多样化需求，基于此，需要更加具有包容性的价值观来统合。期盼国家富饶、国际影响力增强是中国每个民族、各个阶层的共同心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勾勒出了国家发展的未来走向和蓝图总纲，是华夏儿女的共同期待，能够最大限度整合包括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内的广大人民。因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仍旧要激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家国情怀。虽然他们在经济利益发展问题上有自身的独特需求，但是仍旧会以祖国发展的利益为先，也较为认同共同理想的呼吁。二是要发挥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神聚力的作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因所生长的经济业态和就业领域较为新，这就使得一些既定的政策和价值呼吁对他们造成一定的困惑和约束，产生了一些思想文化领域的亚文化现象，一定程度上带有消极色彩，亟需以优秀思想引领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庞大，内容深刻，其对国家发展的期许、对社会治理的原则以及对个人成长的希冀都有着详尽的思想引领。广大人民群众生于兹、长于兹，长期受到中华优秀文化的浸润，其思想行为也会或多或少受到传统文化的指引。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的价值观照与党倡导的价值观在深处不谋而合，都是为了一个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要发挥好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对他们的宣传号召作用，唤起他们的中华民族精神，在面对西方思想侵袭和唯利主义道德失范的情况下，应当自觉以中华民族精神和道德规范约束自己，增强伦理感，也使他们有中华民族的归属感。三是要汇聚意见，凝聚新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自身独特的利益诉求，他们也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形成了自身独有的价值取向，以宏观的价值表达难以有效整合他们，因此，就需要深入调研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将他们的诉求和表达充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他们搭建话语表达的

平台,促使他们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话,能够在其中寻找到适合自身利益的价值归属,以期认同践行。

(二) 注重方式方法,增强整合效率

思想无法直接作用于实际,它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和渠道,作为思想的价值观更为抽象,我们宣传价值观必须通过具体的方式,否则就会落入空谈。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往所采取的多是文字宣传和动员的方式,就实际而言,其产生的效果不是很深刻。因此,面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就需要以其特点,采取针对性的方式。一是要以活动为载体,在实践活动当中深刻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活动作为沟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能够实现彼此思想观念的交流,相比于硬性的宣教,活动在传播思想方面更为隐喻,但效果十分显著。因此,若要真正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扬的内容,就需要进入价值实践活动场域。通过举办新阶层社会服务活动,让他们在实践中做到睦邻友好。在经济上助力,拓宽他们的发声渠道,及时解决他们合理的经济需求,给予他们照顾,这样他们才能更好的地增进他们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二是要坚持榜样示范的仿效认同作用。榜样作为一个社会当中的“领头羊”,具有价值引领的作用,他们是“值得公众效仿和学习的先进典型。”^[12]通过评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当中的榜样模范,并给予奖励和宣传,使其产生“羊群首领”的带动作用。榜样模范总是一定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舆论环境下的产物,其代表着社会价值的主流导向,通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当中模范的自觉践行,带动大部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要转变方式,采取叙事的方法。叙事以其生动等的特性,“有助于推动核心价值观话语从‘正式话语’‘抽象话语’向直观生动的生活话语的转化”。^[13]通过情感带入、故事启发等方式,将宏观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他们所理解,并感动深化,才能认同践行。

(三) 发挥制度优势,构筑整合保障

“权威观念的核心是实现合法的统治,而合法统治的实现离不开合理的制度和程序。”^[14]发挥好主流价值观在思想意识领域的统领作用,就要构筑必要的制度保障保证其实现效果。一方面,要健

全利益诉求和表达机制。长久以来,通过层层上诉的利益表达渠道仍旧是当前政治利益表达的主要方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自身的利益诉求,这种繁琐且单一的利益表达渠道难以适应当前社会发展得需要,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政策需求如若不能得到充分表达,就会弱化对党设计的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因此,就要创新表达机制,通过创建多元化表达载体,完善制度设计,减少中间行政阻隔,使新社会阶层的声音能够充分表达。另一方面,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海量信息得以传递,每个人都能发声。但是缺乏监督的网络也会产生负面效应,当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利益诉求未能有效得以满足,就会在互联网平台同气相求,其中消极情绪和不满言论挑战着权威,也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造成不利影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仍旧要织密网络监督的制度和相关机制,推动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形成,带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民族复兴凝聚力量。另外,由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长期游离于体制外,其“思想难以统领,组织化凝聚共识任务艰巨”^[15],为此就要建立健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组织化统战工作机制。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强调党委在统战中的主要作用,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要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组织化建设,完善体制机制,这样才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用的发挥提供组织保障。

注释:

- ①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404&sj=2021>.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1.
- [2] 韩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7-8.
- [3]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N].人民日报,2022-07-31(001).

- [4] 池上新.市场化、政治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府信任[J].社会, 2015,35(02):166-191.
- [5] 季程远, 王衡, 顾昕.中国网民的政治价值观与网络抗争行为的限度[J].社会, 2016, 36(05):64-87.
- [6] 池上新.市场化、政治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府信任[J].社会, 2015, 35(02):166-191.
- [7] 黄建军.中国共产党思想领导能力建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358.
- [8]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1; 22.
- [9] 李仁质.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凝聚新力量[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05):30-35.
- [10] 范迎春.社会心理学视角下政治认同生成机制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 2011(12):89-91+28.
- [1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 40.
- [12] 姜朝晖.社会转型期榜样力量的理性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 2002(03):69-71.
- [13] 王蓓, 梁玲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话语机制与实践逻辑[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0(03):57-62.
- [14] 宋增伟, 邓陈缘.论制度权威的实现条件[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21(04):60-66.
- [15] 潘清.以“两个确立”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研究[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 No.87(01):36-42.

【责任编辑：张山】

“全过程人民民主”下基层政协工作的迭代升级 ——基于浙江县域“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实践的分析

弓 晋

(临海市委党校, 浙江 台州 317000)

摘 要: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民主政治的新概括, 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总称。 “民生议事堂”作为浙江政协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生动实践, 该制度和平台的发展完善, 对于丰富中国式民主内涵, 加快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 切实提升基层政协工作实效和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以浙江县域内“民生议事堂”的实践为样本, 通过对该制度平台具体实践情况的调查分析, 认为重点围绕政协职能双向发力, 从精神、制度、技术三个方面着眼, 培育公共理性精神, 在“问、参、议、督、评”各环节进行制度重塑和数字赋能, 是实现基层政协工作提质增效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 全过程人民民主; 基层政协; 民生议事堂; 浙江县域

中图分类号: D6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2-0084-06

“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这一论断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基层立法联系点时, 同参加立法意见征询的社区居民交流时第一次提出的。他强调: “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 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①2021 年 3 月, “全过程民主”这一概念被明确写入“一法一则”^②。7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再次站在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创造历史的高度, 将“人民”二字加入其中。至此, “全过程人民民主”开始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总称, 即中国式民主政治的新概括。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式民主政治新概括

“全过程人民民主”, 是扎根于中国社会土壤, 符合中国国情的一整套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社会主义民主, 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体系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它追求以人民为中心, 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的崇高价值和政治取向。它特别强调要遵循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 最大限度的保证全体人民, 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参与国家公共事务, 共享人民当家做主地位的过程性原则。

(一) 价值层次: 人民至上的政治取向

民主的价值是政治发展的方向,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一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的民主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取向。该政治取向, 使人民在民主制度构建和民主道路选择上居于主体地位。而“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在特定时空下, 中国人民为实现当家做主, 在实践中发明创造的一整套全链条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它体现的民主价值,

收稿日期: 2023-02-18

作者简介: 弓晋(1994-), 男, 临海市委党校讲师。

既表现在人民是主权的拥有者、民主模式的设计者，还表现在人民是民主过程的参与者和民主权益的获得者。

（二）操作层次：运作科学性和内容全面性

价值层次的政治理念，需要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程序步骤，方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中国式人民至上价值论具体的实践模式。该模式在整个设计和运行过程上表现为科学性。具体而言，即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各个环节层层递进、相互融合，共处于人民民主这一载体。民主选举作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起点，承担着为民主活动开展选拔德才兼备代表的重任。代表作为党群和干群之间联系的桥梁，在民主决策环节发挥着吸纳民智、展现民意的作用。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作为决策后的执行阶段，既是保证决策结果落地的有效手段，也为整个民主活动顺利开展进行保驾护航。民主协商贯穿于上述四个环节之中，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谛所在，承担着消除意见分歧，理顺各方关系，整合多主体意志，形成广泛共识和发展合力的任务。此外，该模式在运作形态上的任何一个环节，均会涉及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内容上还表现为全面性的特征。这种横向维度的全面性与纵向维度科学性的有机融合，共同建构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整个操作层面。

二、“民生议事堂”：全过程民主的浙江实践成效及困境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它贯穿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各个环节，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所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可或缺的制度载体和实践平台。作为发轫于嘉兴海宁，从海宁走向浙江全省的“民生议事堂”，就是浙江省政协在破解政协协商越往基层越弱化痛点，推动县域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的过程中，形成

的一个具有浙江鲜明辨识度和广泛影响力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生动实践。

当前，浙江正在全省层面有序推进“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平台建设，并出台了《政协浙江省委员会关于推进“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规范和推动了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各地政协也结合自身情况，做了多样态、多维度的实践探索。本文以浙江县域基层政协的实践探索为样本，对各地的具体做法进行了梳理整合，在此基础上分析探讨其取得的显著成效，以及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浙江县域“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实践的基本做法

1. 完善平台搭建，加强阵地建设，解决“在哪议”的问题

本着“不建机构建机制”的原则，各地政协结合自身实际，不断加强阵地建设。临海市打造了民生议事堂、联村委员工作室、民情联络站“三位一体”委员履职平台体系。杭州富阳区统筹构建“1+X+Y”平台体系，对各个层面基层协商的组织者和协商活动的开展进行了细化说明。1是镇街建立协商议事堂，主要开展专题协商，X是村社建立协商议事厅，主要负责基层协商活动。Y是通过建立百姓茶座、议事长廊等灵活阵地，开展微协商，解决困扰群众日常生活的民生小事。

2. 健全制度体系，强化机制保障，解决“谁来议、议什么”的问题

在协商主体选择、协商内容、评价机制构建等方面。各地政协都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实践。在协商主体选择方面，富阳区政协坚持基层政协组织指导和基层自治相集合的原则，采用“固定+临时”两方面人员组成，特聘组建“协商议事员”队伍的方式，尽力保障利益相关主体的参与以及决策的科学。在协商内容方面，杭州西湖区坚持全方位议题征集机制、围绕民生实事难事、关键小事等，通过群众出题、委员荐题、党政点题的方式，让议题设置更精准。

（二）浙江县域“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实践成效

1. 激发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了政协的影响力
政协搭台，邀请各方。基层搭台，政协嵌入。

作为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载体的“民生议事堂”，日益成为了驱动城乡社会治理变迁的重要资源。缺能人、缺平台是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离群众远、不接地气是影响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发挥的重要原因。“民生议事堂”平台的搭建，为基层治理难与政协协商向基层拓展的耦合提供了可能性，不仅给了基层群众平等协商对话的机会，把“麦克风”架在群众家门口，同时也有助于政协智力雄厚、眼界宽阔优势的发挥，真正实现了让“小人物”走进大平台、“大人物”下沉到镇街村社，推动了精英治国和普通民众的良性互动，让基层治理效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基层治理效能的发挥，也逐步改变群众对基层政协软大空虚的刻板印象，提升了政协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政协很近、委员很拼，民生议事堂很管用”，日益在老百姓中形成了口碑，成为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发挥重要的重要渠道。

2. 促进了公民意识觉醒，增进了社会价值认同

“民生议事堂”作为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的载体，对于增进社会价值认同，提升社会凝聚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这体现了党和政府转变了以往单向度依赖行政权力，通过“刚性管控”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定势，代之以更加注重通过凝聚社会共识、改善政治环境和调和多元主体利益差异等方式来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这种施政理念的转变，极大地增进了社会各利益主体的沟通交流，对于增进社会价值认同，凝聚民心民力大有裨益。

此外，协商民主在基层的落地生根，在理论上对于培育民众的公共精神，激发公民主体意识和权利观念具有重要的作用。“民生议事堂”将党政干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基层民众等各利益主体集中在一起进行平等协商、互动交流，本身就蕴含了一种培育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的建构力量。各主体之间的交流协商，不仅提升了民众的政治认同感，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了从单方面强调自身利益向相互理解过渡，客观上增强参与者的社会责任感。

（三）浙江县域“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存在问题

“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的不断推广和实践，对我国协商民主政治的发展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对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取向和核心要义，笔者通过走访玉环市楚门镇和临海汛桥镇的民生议事堂发现，该平台体系在建构和实践过程中还是存在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关于议题确立。当前我国基层协商的注意点主要聚焦于党政机关分配的工作，大多以基层政府至上而下确立的议题为主，由下而上问需于民确立的议题较少。二是协商主体，主要以属地政协委员、基层干部、利益相关群众为主，缺乏机关及部门干部以及相关领域的专业性人士。此外，镇街开展的民主协商多，村社开展的相对少。三是在协商过程中，由于各参与主体之间综合素质参差不齐，参与意识较为薄弱，加之部分干部没有在思想上真正认识到建立“民生议事堂”的初衷，他们往往重形式轻实效，将“民生议事堂”作为一种维稳策略和工具创新加以落实应用。因此，这也导致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沟通不畅、讨论博弈不充分等问题。

此外，在整个协商过程中，活动的组织者往往受传统权威型管控思维的影响，他们把主要精力过多的聚焦在制度、程序、规则等具体的形式层面，而忽视协商内容的充分准备。这对于民主自由协商氛围的营造，以及各参与主体自身功能的有效发挥极为不利。因此，基层群众不会、不愿、不善说，基层干部面对质询说不准、答不全的问题普遍存在。民情民意不能通畅有效的表达，又进一步造成了协商主体之间的信任危机。这些问题究其原因，除了与识别民众需求、促进民众参与、推进民智汇集、问效于民改进、智能闭环管理等体制机制不完善和技术升级要素匮乏等技术层面的客观条件有关外，还与党政干部民主意识薄弱、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观念淡薄等道层面的主观因素有关。

三、公共理性与数字赋能：基层政协工作的升级与超越

不断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加强

改进政协工作的行动指南和努力方向。“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作为基层政协全面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它的发展完善对于进一步健全基层民主协商制度，丰富中国式民主内涵，更好展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至关重要。此外，它的深入推进也是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作用，推动基层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更好服务于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抓手和有效之招。本文认为，从道的层面，培育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在术的层面，坚持数字赋能与制度重塑，是新时代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民生议事堂”平台工作行稳致远，实现基层政协工作提质增效，全面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路径。

一项制度要想在基层生根发芽，不仅需要来自政府层面合理有效制度设计的引导，更需要来自公民主体真正的心理认同和行动支持。因此，要想实现“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效能的最大发挥，归根到底要从“人”这个主体去着眼，培育一种民主协商所需要的公共精神，尤其是公共理性精神。^③这种精神以平等和权利为前提，以对话和协商为手段，它鼓励不同利益表达，试图通过合作决策，促进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

公共理性精神的成长和具有公共精神现代公民的培育，需要从政府、公民两个方面双向发力。具体而言，公民应在强调自身权利本位的前提下，顺应政府引导，在参与协商过程中，自觉树立共识意识、增强包容心态，从单方面强调权利诉求表达达到学会相互理解、善于反思自身利益取向，进而升格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来促成整个社会公共理性成长。此外，政府也要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下，通过制度设计和技术优化的方式，转变传统依靠行政权威，将基层协商民主视为一种工具创新加以落实应用的工具性理性，培育更多包含平等互助、开放包容要素在内的协商文化，进而增加干群之间互动交流和信任资本的积累。比如，安吉县挖掘的“请你来协商”五字内涵，其实就蕴含了政府引导、培育公共理性精神的深刻内涵。^④那么，关于政府对公共理性精神培育的引导，我认为应该从“问、参、议、评、集”各环节进行制度

重塑和数字赋能。

（一）问：以人民需求为基点，打造双轨互动的议题征集机制

“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作为政协协商向基层拓展的载体，它的定位就是要解决镇街、村社的大事、要事和民生小事。因此，议题的选择应坚持以解决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服务问题为现实导向。

著名的法哲学家哈贝马斯曾在其代表作《协商对话的法律》一书中谈到：“合理的协商政治必须是双轨的”。议题确立作为民主协商的前置环节，它不仅需要由下而上群众呼声的倾听，同时也需要政府至上而下，在保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做出更具理性和前瞻性的甄别预判。因此，在打造真正合乎民需的议题征集机制过程中，要注意把握上下之间双向互动的原则。具体而言，一是要搭建各种形式的民需表达平台，畅通民需表达机制，让民众真正的能说、敢说。二是政协委员和党政代表要根据民需反映情况，结合各方数据，优先选择那些切口小、关联广、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的问题作为最终议题。

（二）参：以平等开放为原则，构建科学多样的参与机制

中国式民主，是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也是各个环节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让尽可能多的民众参与到基层社会的协商和治理活动中来，真正做到协商于民，协商为民，是“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建设的初心和使命，也是中国式协商民主发展的趋势所在。

要真正做到汲民智、聚民力，以最科学的民主参与，获得协商民主的最大收益，就必须要在构建科学多样化的参与机制上做文章。该参与机制，既要保证议题相关人员的广泛代表性、也要保证参与人员的权威性和专业性。例如，杭州富阳区就对村社层面的“民生议事堂”参与者、相关主体的参与频次、专业性保障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它采用固定人员+临时人员，并以乡贤、热心人士为基础建立了一支特聘的议事员队伍，并为他们统一制作颁发证书。此外，还特别规定了属地政协委员至少要参与2次村社的基层协商，委员参与纳入履职考核。

这种既包含强制性规定在内的有情必来机制，又不断创新营造的不请自来氛围，极大地推动了精英治国和普通民众的良性互动，让每一位参与者都真正感受到了非你莫属的主体责任感和舍你其谁的参与成就感。

（三）议：以凝聚共识为指引，创建公共理性的协商机制

协商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的民主方式，贯穿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始终，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所在。政协作为专门协商的机构，它承担着凝聚共识和建言资政的双重使命。因此，如何创建公共理性的协商机制，如何统一思想，形成发展合力，既关系整个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效益，也关系基层政协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效能的发挥。本文认为，从公共精神培育与政协协商专业化提升两个方面双向发力，是创建该协商机制底层逻辑。具体而言：一是整个协商过程要坚持平等开放的原则，让每一位利益相关群众都能说、敢说。二是在充分考虑民众诉求意见的基础上，政协委员、专家学者、政府代表等经过调查研究、综合考量拿出初步的解决方案。三是针对政府部门、专家团提出的解决方案，各利益相关民众要通过理由陈述和投票的方式进行民主票决，将其最终呈现为提案。这不仅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也将民主协商的柔性和民主票决的刚性融为一体。

（四）评：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确立督促问效的改进机制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是衡量一切政治制度的重要指标。“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作为浙江省基层政协践行全过程人民的生动实践，在解决基层治理等社会问题时，应体现以民为本，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价值取向，重点围绕协商过程、协商结果落实等进行督促问效改进机制的重塑和技术赋能。

具体而言，一是要充分利用好政协委员的界别和智库优势。我们可以抽调一些退居二线、责任心强、联系群众与议政能力突出的政协委员，专门成立一个基层协商评估团，通过列席会议、查看台账等方式对协商过程进行督察评估，评估结果纳入考核。二是建立“委员督事”和“挂牌销号”制度，

对镇街、村社经“民生议事堂”集体协商后做出的决策，辖区的政协委员应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到具体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由各部门汇总分类后挂牌督办，对督办结果交由相关群众评议，评议合格予以销号，以此方式来推动基层协商成果的落实转化，进而达到让群众“不白来”、“没白说”，推动“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制度长效发展的目的。

（五）集：以数据集成成为载体，开发闭环智治的管理机制

政协协商的下沉与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需要建立科学民主的管理机制。“民生议事堂”作为实现该目的的载体，它管理机制的科学性不仅要体现在民主的质量上，还要体现在民主的效率上。因此，以最小的民主成本获得最大的民主收益是我们建立科学民主管理机制的方向。

数字化改革作为立足新时代，面向新未来提出的重要战略举措，基层政协工作的数字化改革，对于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落实政协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应紧抓浙江数字化改革的机遇，在宏观上找准发力点和突破口，系统架构，重点围绕“问、参、议、督、评”各环节和政协委员履职两个方面，科学开发集“议题征集、调研组织、协商管理、建议交办、成果评价、过程掌控、履职集成”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应用平台，真正让“民生议事堂”运转实现智治、协同和高效。

注释：

- ① 习近平.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11/03/c_1125186412.htm, 2019,11,03.
-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修正草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事规则》修正草案
- ③ 公共理性精神：各类主体在政治社会的框架体系中，以公正、责任和平等的身份理念对区域内公共事务展开充分深入的互动合作,进而达到协同共治效果的一种能力。
- ④ “请你来协商”五字内涵：“请”有机制，搭建有请必来的机制，营造不请自来的氛围。“你”有范围，根据

协商议题需要,界定受邀范围,增强非你莫属的主体责任感和舍你其谁的参与成就感;“来”有场所,按照就近就地就便的原则,切实解决在哪里协商的问题。

“协”有重点,聚众人之智,协众人之力,突出协商选入选材的重点。“商”有成效,按照商以成事的目标定位,凝聚最大共识度,找到最大公约数,形成最大推动力。

参考文献:

- [1] 曹伟.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创新的问题指向与实践路径研——以浙江为例[J].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7(01).
- [2] 葛慧君.创建“请你来协商”平台,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N].人民政协报,2019-5-22(003).
- [3] 盛世豪.习近平关于坚持党对政协工作领导的重要论述及

在浙江的实践探索[J].观察与思考,2020(2).

- [4] 唐亚林.“全过程民主”:运作形态与实现机制[J].江淮论坛,2021(1).
- [5] 郑辉.践行“全过程民主”的实践探索 and 理论思考[J].人大研究,2021(4).
- [6] 新时代副嗯嗯基层治理的地方政协探索——基于浙江“请你来协商”实践的分析[J].治理研究,2021(4).
- [7] 胡贵仁.基层协商民主中的公共理性培育:实践逻辑与发展理路[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1(1).
- [8] 李宏.打造政协工作金名片——浙江省政协推进“民生议事堂”建设纪实[N],2022-4-13(001).

【责任编辑:余伟】

人民政协制度功能转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内在逻辑

王 丽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70)

摘 要: 从人民政协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协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可以看到人民政协与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人民政协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而且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中具有独特的制度功能。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具有专业的民主协商平台功能, 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巨大包容性功能, 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重要职能功能将发扬民主与增进团结相互贯通, 形成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合力。人民政协要将其制度功能转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 具体为将民主协商平台功能转化为提高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效能、将统一战线组织功能转化为保证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体现民意、将凝聚共识的重要职能功能转化为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凝聚向心力。

关键词: 人民政协; 全过程人民民主; 协商民主; 制度功能; 凝聚共识

中图分类号: D6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2-0090-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上指出: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1],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也指出:

“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健全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2]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载入了历史决议, 成为党的百年奋斗的重要民主成就, 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这为人民政协提供了重大机遇和广阔空间, 人民政协通过提供的重要制度保障以及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和广覆盖的民主协商平台, 在体现广泛代表性的同时凝聚共识, 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真正落实落地。分析人民政协具有的独特制度功能, 并将人民政协制度功能转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 这不仅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实需要, 更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心任务的内在需要。

一、人民政协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协同发展的历史进程

人民政协坚持人民民主理论、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政党理论, 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在我国民主发展中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和任务, 而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党对我国丰富民主实践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政协迎合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需要而生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 迎合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需要, 顺利生成人民政协这一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早在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就与国民党结成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统治。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号召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

收稿日期: 2023-01-12

作者简介: 王丽 (1995-), 女, 汉族, 四川广安人,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

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3]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推动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来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争取和平与民主。我们党一直注重发挥平等协商在统一战线中的重要作用，促成每一时期的统一战线形成最大同心圆。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指出要在党的领导下，建构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的新中国。口号发出后，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共同表达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4]的共识，并开展了“新政协运动”。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明确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民政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变化，不再代行人民的职权，“而是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5]明确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和多党合作协商重要机构继续存在。毛泽东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的1954年12月发表了《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明确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仅我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是组成的阶级联盟，而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民主与和谐的社会主义政党关系，而人民政协推动了这一政党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并为其提供了重要场所。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更需要发挥人民政协的统一战线作用，凝聚各党派和各团体的思想共识，协调和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团体之间的关系。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明确了人民政协的地位和作用，实现了协商民主，才能凝聚全国民主力量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

（三）改革开放后明确人民政协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形式

改革开放后我国需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来推动经济发展，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和政治协商民主形式，通过各级政协组织协助党和政府拨乱反正，并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面临的矛盾冲突更多，更需要人民政协继续发挥统一战线功能，团结凝聚全国力量。人民政协不断参与国家治理工作，在政治民主生活中越

来越重要。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将人民政协正式嵌入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之中，1993年3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政党制度纳入宪法也能从宪法层面为我国政党制度的组织载体人民政协制度提供保障。1994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则对人民政协的性质界定增加了“人民政协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的表述。总之，改革开放后人民政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形式并被载入宪法，由于得到法律的保障，人民政协在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方面更加有力和有效。

（四）新时代明确人民政协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取得重大发展，离不开人民政协提供的重要制度保障作用。人民政协发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功能，通过民主渠道反映各党派和人民群众的诉求，化解了国家治理中的矛盾与冲突。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概括为新型政党制度，作为该政党制度的重要组织机构人民政协推动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和价值得到快速发展。民主党派是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作为参政党以党派名义开展民主活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议题展开调研，积极参加人民政协的工作，并通过提案这一重要渠道发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作用，比如“党的十九大以来，各民主党派提出的意见建议有495件。”^[6]人民政协重视政党类界别，又特别关注各民主党派的呼声，推动形成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局面，鲜明体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特点与风格的同时，也发展了全过程人民民主。

二、人民政协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具有独特的制度功能

从人民政协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其具有独特的制度功能。人民政协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专门协商机构，而且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不仅能广泛体现民意，还能凝聚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形成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合力。

（一）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具有专业的民主协商平台功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渠道，而人民政协制度是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的民主协商平台功能体现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个民主环节中。

人民政协的民主协商平台功能体现在民主决策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导向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而民主决策最能反映党和政府制定决策的价值导向是否切实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满足了人民的要求和呼声。因此，人民政协要发挥决策参与功能，并通过广泛的民主协商，让广大人民群众有重大参与感，了解政府决策运转的实际情况和可能存在的问题。并且，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参与民主决策不仅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原则，还能凝聚我国人民的智慧，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人民政协的民主协商平台功能体现在民主管理中。人民政协通过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有序参与民主管理，能更好地保障“人民依法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7]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通过民主管理，还能组织和动员广大人民积极融入社会民主生活，并通过积极参与城市、农村的基层社区治理来维护自身利益，是直接有效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展开。

人民政协的民主协商平台功能体现在民主监督中。“民主监督是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后关口”^[8]，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就要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和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并且，“人民政协监督主体具有社会监督主体不可比拟的广泛性和高素质特点，并在民主监督活动中体现高层次和直接性优势。”^[9]这些都表明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能利用好这些特点和优势，在国家方针政策和社会政策执行过程中进行民主监督，以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顺利发展。

（二）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巨大的包容功能

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不仅联系面广，而且代表性强，包容性大，可以广泛收集反映各方面各领域的意见和建议，体现了人民政协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广泛代表性和巨大包容性功能。

这些功能主要表现在人民政协构成主体、协商主体和协商内容、以及届别设置的广泛代表性和巨大包容性。

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其构成主体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巨大包容性，涵盖各党派、各团体和各民族等。广泛构成的主体进行参政议政，有助于增进社会稳定，同时也能加大人民群众对人民政协工作的认同。人民政协构成主体的广泛性、代表性和包容性不仅能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而且决定了在决策过程中，人民政协紧紧围绕团结和民主，征求并考虑各方面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要求。

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其协商主体和协商内容都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巨大包容性。首先，人民政协的协商主体包含政党、政府、社会组织等多层次主体，囊括来自各阶层和各类政治活动主体的力量。广泛代表的协商主体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以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协商国家治理事务，提高了国家治理效能。其次，人民政协的协商内容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进行政治协商、民主协商、社会协商、立法协商、行政协商等，广泛体现和容纳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充分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

人民政协由 34 个界别组成，广泛代表的界别设置整合了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体现了人民政协代表主体的广泛性和包容性。人民政协的界别设置涵盖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包含政党类界别、社会职业群体类界别、人民团体类界别、少数民族、以及特邀人士等，这些不同类的界别代表着各自社会群体的利益。并且，人民政协的界别设置会随着社会结构与社会现状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完善，以保证界别委员的代表性和多样性。人民政协各界别的委员分别联系着各界别的人民群众，通过界别委员有针对性地去做好群众工作，能更有效地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三）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重要职能功能将发扬民主与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功能

“民主的有效性前提是共同体的共识”^[10]，而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重要职能能发挥聚力的团结功能，在充分发扬民主中形成最大共识，并促进党团

结带领各领域各方面的人民群众形成共同奋斗的行为，形成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合力。

毛泽东同志在正式建立人民政协制度之前就提出“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协制度逐步建立，共识也就成了人民政协工作的立足点和中心任务。改革开放时期，人民政协工作同样强调共识的重要性，并注重通过协商来增进共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更加强调人民政协是广泛协商、凝聚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目前，我们党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需要人民政协广泛凝聚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思想共识，汇聚全国力量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且，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就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也需要充分发挥凝聚共识的重要职能功能，来凝聚全国力量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顺利发展。

凝聚共识重要职能功能同时也贯穿于人民政协三大职能之中，并与三大职能共同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凝聚共识的职能功能贯穿于政治协商中。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目的在于引导各民主党派都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各民主党派有了这些共识，能紧紧围绕团结和民主，真实有效地反映社情民意，共同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二是凝聚共识的职能功能贯穿于民主监督中。人民政协进行民主监督，目的在于防止滥用公共权力和产生腐败现象。而在人民政协民主监督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是得到人民群众认可的可靠民主，更是能形成宣传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并促成人民群众理解、支持这些方针政策的共同行为。三是凝聚共识的职能功能贯穿于参政议政中。参政议政能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委员的专长和作用，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组织调查和研究，为国家发展献计献策，并引导所联系的各界别人民群众形成宣传党的政策、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共同行为。

三、人民政协制度功能转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实践路径

总结出人民政协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具有

的独特制度功能，目的是将这些制度功能转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实现人民民主的价值追求与全过程民主的实践机制相统一。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式民主的合理性与独特优势，也使人民政协制度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

（一）人民政协搭建广覆盖的民主协商平台，能提高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效能

人民政协搭建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人民政协与政府机关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协商平台，逐步形成了参政议政、资政问政的民主协商模式。这一民主协商平台是“人民群众通过选举以外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管理”^[1]，丰富了我国的民主形式。人民政协通过搭建广覆盖的民主协商平台，将执政党与参政党、政府与人民群众有机联系起来，并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科学有效地反馈给执政党和政府，提高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效能。

首先，通过参政议政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搭建民主协商平台。中国共产党搭建民主协商平台便于各民主党派进行参政议政，而各民主党派在决策前和决策过程中通过民主协商平台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广泛协商，不仅能确保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各项大政方针能兼顾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各个层面群众的特殊利益要求，还能提高中国共产党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并且，人民政协能向执政党提供来自中国共产党以外的声音，充分照顾这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特别是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利益诉求，是广覆盖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其次，通过资政问政为人民政协与政府、人民群众之间搭建民主协商平台，实现人民政协能上通到政府决策安排，下达到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民主协商效果，真正落实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政协委员由各领域的代表人士构成，可以通过人民政协搭建的民主协商平台同政府部门开展广泛民主协商，主要有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等，这些都体现了人民政协的资政协商功能。问政协商则是通过人民政协与人民群众之间搭建的民主协商平台，真正深入基层、接访群众，并在与人民群众进行面对面的民主协商中，实现“问政于民”的民主协商效果。总之，通过搭建资政问政的民主协商平

台能科学有效地表达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使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效能得到充分发挥。

（二）人民政协容纳不同群体的利益，能保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代表性和巨大包容性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要不断扩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政治生活的范围与程度。”^[12]而人民政协基于统一战线组织和依托专门协商机构，不仅能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还能容纳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保证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中体现出广泛代表性和巨大包容性。

首先，人民政协要基于统一战线组织整合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保证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中体现出广泛代表性。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是包括不同社会力量的政治联盟，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的特点。人民政协的统一战线组织性质最鲜明体现在人民政协的界别设置上，目前界别数量稳定在34个，但随着我国统一战线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界别设置也还会继续不断扩大。并且，人民政协的界别委员具有代表性，这些都保证了参政议政主体的多样性和广泛代表性。人民政协每一个界别都是特定群体向党和国家反映利益诉求的桥梁，不同社会主体都可以通过不同界别表达切身利益的问题，因此，人民政协要充分发挥界别作用，反映并整合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

其次，人民政协要依托专门协商机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诉求，保证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中体现出巨大包容性。进入新时代，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各种社会问题增多，导致人们的利益差别也趋于多样化。并且，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主体来自不同党派、不同领域等，导致在涉及国家方针政策方面难免会有利益分歧和冲突。因此，人民政协要依托专门协商机构来进行利益关系协调，按照“尊重多数人，照顾少数人”的原则，包容不同的意见和建议，整合不同的利益分歧，反映各方面力量的利益诉求。

（三）人民政协履行凝聚共识的重要职能，能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凝聚力向心力

凝聚共识是人民政协履职的中心环节，而人民政协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有助于聚集众智、汇聚众力，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凝聚向

心力。此外，人民政协要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中国人民的最大共识，并在这一共识下推动形成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合力。

首先，人民政协要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其中，建言资政体现着人民政协的民主主题，凝聚共识体现着人民政协的团结主题，因此，人民政协将二者双向发力，能实现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人民政协一方面要广泛收集并表达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充分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另一方面要推动不同利益群体在关乎国家大政方针政策上达成共识，形成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合力。

其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共识，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离不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因此，人民政协要把这一最大共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为其汇聚力量、凝聚人心。中国人民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理想信念，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13]有了这一理想信念，中国人民团结凝聚起来。要注意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基于社会发展情况。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关系以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都日益多样化，在这一现实情况下，人民政协要聆听各方面群众的需求和意见，兼顾多数人的利益和少数人的合理诉求，达成新的共识。开启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围绕中心任务继续推进发展，特别是要推动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由于人口之多和规模之大，其中的利益冲突和争论必将增加。因此，人民政协要注重将凝聚共识贯穿于三大职能之中，在广泛协商的过程中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总之，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要基于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社会发展情况，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共识，并在实现这一共识的过程中，推动形成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凝聚力向心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01).

- [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39.
-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21.
- [4] 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6.
- [5]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84-385.
- [6] 周淑真.人民政协：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制度载体——历史逻辑、方位体现与职能机制考察[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02):20-28.
- [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91-292.
- [8] 王宗礼,李振江.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J].行政论坛,2021(4):12-18.
- [9] 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198-199.
- [10] 赵汀阳.一种可能的智慧民主[J].中国社会科学,2021(4): 4-23+204.
- [11] 江泽林.“两会制”民主视域下的人民政协——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政治制度[J].中国社会科学,2021(12):110-130+201-202.
- [12] 包心鉴.论协商民主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特有功能和制度优势[J].社会科学研究, 2022(1): 1-7.
- [1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90.

【责任编辑：余伟】

我国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价值意蕴、困境挑战及实践路径

张琛琪, 刘继荣

(中北大学, 山西 太原 030051)

摘要: 跨境民族是指跨越不同国境间居住的同一民族。为了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必须全面推进我国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但是, 由于人文内涵和社会特征的复杂性, 我国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较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群体而言任务更为困难和艰巨。从宏观角度而言, 我国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受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 从微观角度来看, 我国约有30多个跨境民族分布于不同省区,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因此, 必须着眼全局, 认清现实, 在全方位制定路径的基础上, 推进我国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

关键词: 跨境民族;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团结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2-0096-06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和意义进行了多次阐述, 作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论断。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的背景下, 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研究成为当前学界的一个新的理论增长点。另一方面, 我国的跨境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个特点鲜明的群体, 应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对象。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许多现实的困境与挑战阻碍我国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 如何深入推进我国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期民族工作中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一、我国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

(一) 维护民族团结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现实需要

中华民族是一个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共同体, 其中大量的少数民族居住于边疆地区。有学者统计, 在我国长达 2.2 万多公里, 与 14 个国家山水相连的边境线上, 有多达 31 个民族跨境而居。在我国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与内蒙古自治区中, 有蒙古族、朝鲜族、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等民族跨境分布; 在我国西北地区的边境线上, 分布着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俄罗斯族等跨境民族; 在与南亚和东南亚接壤的西南与

收稿日期: 2023-03-25

基金项目: 2022 年度山西统战理论政策研究立项课题“铸牢我国跨境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2022SXTZ040)

作者简介: 张琛琪(1999-), 男, 中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1 级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刘继荣(1978-), 男, 中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政治哲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华南地区,更是有多达十多个跨境民族,例如傣族、京族、苗族等。由此可见,我国跨境民族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占比巨大,且地处边境地区远离核心地带,易受内外部不同因素影响滋生一些问题。在传统安全视角下,跨境民族是分离主义与极端宗教等势力挑唆和煽动的主要对象;在非传统安全视角下,跨国毒品交易与人口贩卖等跨境违法犯罪与跨境民族问题交织;这些问题严重影响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以及国家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期民族工作主线下跨境民族地区社会更加稳定、民族更加团结、边防更加巩固。由此可见,推进我国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现实需要。

（二）推动各民族共同富裕加快跨境民族聚居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潜在动能

我国的跨境民族,大多聚居于我国边境九个省区,这其中,有45个州市属于边境城市,139个县沿边境分布,我国跨境民族大多聚居于此。在这45个州市的县级行政区中,曾经有将近一半位列2012年3月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公布的新时期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名单。因此,我国跨境民族聚居区曾经也做为脱贫攻坚任务的重要战场。经过党带领各族群众的不懈努力,在2020年底,跨境民族聚居区全部脱贫摘帽。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有着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追求的共同体,跨境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与国家整体的支持与帮扶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体现。特别是在“兴边富民”行动实施以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的力度不断加大,根据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21年边境省区共获得了95.4%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补助。所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的指引下,我国跨境民族群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一道,为了实现“兴边富民”而不懈奋斗,极大的推动各民族共同富裕,加快跨境民族聚居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三）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厚植爱国情怀的思想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

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1]我国跨境民族作为特殊的民族群体,教育引导跨境民族群体坚持文化自信、加强文化认同,与其他民族一道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的聚焦下,随着深化民族团结教育战略性任务的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实践中进一步巩固。在此之下,通过国家认同教育不断加强,民族团结教育的不断深入,我国跨境民族群众凝聚力向心力得到汇聚。我国跨境民族共同抵抗外来侵略,并肩作战,共同投身边疆建设,卫边戍边的历史记忆得到进一步唤醒;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荣辱与共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富民强边的美好愿景得到进一步激发。因此,通过抓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纲”,引导我国跨境民族群众不断增强“五个认同”,有利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进一步厚植各族群众的爱国情怀。

二、我国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困境挑战

（一）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身份认同是一个心理学和社会学上的概念,是指一个人对于自我特性,以及与某一群体之间所共有观念(国籍和文化)的表现的认同。身份认同往往用来表示“我群”与“他者”的感觉与认知。就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的复杂性而言,主要问题体现在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及政治认同上。

1、民族认同层面

从民族认同来讲,可以将我国的民族认同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高一级的整体层面之上,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另一个是在次级的个体层面上,对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当中的某一民族的认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推进以及民族团结教育持续开展的大背景下,我国跨境民族对中华民族认同感不断增强,但是由于跨境民族跨越国境线分布居住的特点,在我国跨境民族群体中不可避免的存在与境外同源民族的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呈现出多维性的特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国家与国家的边境线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即现代主权国家明确化、固定化的国境替代传统国家的习惯性的疆界^[2]。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秉持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精神与周边国家签订条约明确国境线的范围,解决了和大部分陆上邻国的勘界问题,我国边境线上许多同源的族群被客观上分隔到不同国家形成跨境民族。因而在我国跨境民族当中许多依靠自身血缘维系的族群没有随着所处国家的不同而改变,仍保持与境外同源族群间强大的民族认同。

2、文化认同层面

站在文化认同的角度,我国民族的文化认同即包括对中华文化的主流认同也包括不同民族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同。而我国跨境民族作为特殊的文化群体,其对自身民族的文化认同往往能够跨越国境向外延伸,这是由以下三个特点决定的:第一,跨境民族有着共同的起源,在被现代主权国家边境线分隔之前有着共同的社会发展轨迹,形成了共同的历史记忆。第二,跨居国境两端的不同分支,虽受不同国家不同政治制度和不同发展道路的影响,但仍具有共同的文化成分与相近认知观念——这里的文化成分指那些具有传统性及相对稳定性的社会意识及文化现象,如起居出行、礼制仪轨、文学艺术、岁时节令、宗教习俗等;认知观念指价值判断、价值标准、态度倾向等。第三,跨境民族情感上相互亲近——体现在对共同传统文化的保护以及对彼此发展的关注。

3、政治认同层面

提及政治认同,主要是指对政治身份及国家归属的认同。我国跨境民族尽管在血缘、文化、情感上与相邻境外的同源族群有显而易见的相通性,但总体上讲对政治身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不存在异议,对国家归属即对祖国深厚的依存感不存在问题。然而,我国跨境民族的政治认同相比于其他少数民族群体而言仍具有特殊性。在现实当中,存在着个别民族团结教育工作落实不到位,对党中央有关民族工作的指示精神没有抓实、抓细、抓牢的情况,致使部分跨境民族群众对自身政治身份没能得到清晰认识。同时,我国跨境民族群体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边界的不确定性在现实上会呈现

动态迁移的趋势,最终会对有着稳定边界的政治认同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 外部势力渗透煽动的严峻性

对我国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避免的要遭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跨境民族聚居区形成了社会稳定、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的有利局面,特别是开展“一带一路”建设以来,我国跨境民族在边境地区对外开放中扮演了促进国家间友好交往的重要角色。但是,受国际环境变化、周边国家地缘政治震荡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在我国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遭受到国际敌对势力、跨国民族主义、极端宗教思潮等外部势力带来的严峻挑战。

1、来自国际敌对势力的挑战

长期以来,国际敌对势力为了达到遏制中国分裂中国的目的,妄图以我国跨境民族聚居区为据点展开分化与破坏活动。特别是近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反华势力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编造、散播我国民族问题的谣言,歪曲、攻击党的民族工作大政方针,纵容、支持我国的民族分离势力。如美国国会每年都会抛出所谓涉人权提案;一些政要和国会议员频频发表涉疆和涉藏的不当言论;境外武装组织频频在我国境内跨境民族群体中进行宣传,煽动边民外逃等。国际敌对势力已经成为破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程的祸根,需要格外加以警惕,严加防范。

2、来自跨国民族主义的威胁

冷战结束后,跨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日益增大,跨国民族主义者以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同源或相近族群为依据,大肆鼓吹同源族群要成为一个共同体,从而谋求建立其所谓“民族国家”,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和破坏力。与我国边境疆地区部分跨境民族同源的有关组织和团体,常常以“大某某族主义”为旗号,亦或者发出某某族群“回乡”的号召,对我国边境地区的个别群众发出错误信号,造成我国跨境民族部分成员身份情感认同混乱,甚至产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离心倾向,威胁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3、来自极端宗教思潮的蛊惑

一段时期以来,外部势力通过借助宗教分化我

国的活动愈演愈烈, 宗教渗透已成为威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问题^[3]。在这样的背景下, 极端宗教思潮的渗透也成为阻碍我国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外部因素。我国跨境民族的宗教信仰程度较高, 以云南为例, 全省 15 个跨境民族人口中宗教信徒占全省宗教信徒总人数的 48.6%。此类现象在我国对外开放持续深入的大背景下, 给极端宗教思潮的渗透留下了可乘之机。就我国跨境民族地区而言, 极端宗教思潮的渗透主要表现在私建教堂、滥收僧尼、非法发展信徒等现象。极端宗教思潮的渗透, 不仅威胁我国宗教健康发展, 也对我跨境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威胁。

(三) 跨境民族聚居区发展水平的滞后性

我国跨境民族聚居区受多重因素影响, 发展水平存在滞后性。跨境民族聚居区的发展水平会直接影响我国跨境民族群众的心理获得感和幸福感, 特别是跨境民族习惯用邻国同源族群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参考, 如果跨境民族聚居区发展滞后的状况得不到改善, 就会诱发跨境民族群体心理失衡, 造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弱化, 阻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1、跨境民族聚居区经济基础薄弱

我国跨境民族大多聚居于边疆地带, 在实施脱贫攻坚和“兴边富民”建设以来, 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丰富, 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 社会发展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 极大的增强了我国跨境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但是, 我国跨境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东部沿海地区有较大差距,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充分与不均衡直接影响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推进^[4]。从人口来看, 边疆九省区人口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特别是东北三省占全国人口比重由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8.3% 下降到了 7%, 人口流失明显。从城镇化水平来看, 2020 年边疆九省区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6.5 个百分点, 边疆地区城镇化仍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 截至 2020 年底, 边疆九省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 13.8%, 人均 GDP 占全国同期水平 68.5%。

2、跨境民族聚居区社会发展缓慢

我国跨境民族大多居住于边境地区, 从地理条

件上来看, 多为有沙漠戈壁或高原山地分布的偏远地带, 地广人稀、交通闭塞。因此, 在这样的因素影响之下, 我国跨境民族聚居区社会发育历史起点低, 生产力发展速度缓慢, 教育水平落后, 基础设施不健全。社会发展程度的高低是决定民族群体发展的关键因素, 而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影响着民族群体及其个体是否能够更好地平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带来的心理效应。现实来看, 我国跨境民族聚居区的社会发展程度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仍有明显差距, 即便同边疆省份内的其他地区相比, 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跨境民族聚居区较为缓慢的社会发展, 使得跨境民族聚居区的群众对个体与群体, 群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诸多阻碍和挑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 是指“各族成员对这个共同体客观存在的感知和认识, 以及对其产生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依附感”^[5]。因此, 积极推动跨境民族聚居区社会发展, 缩小跨境民族聚居区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异的客观存在, 是我国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中之重。

三、我国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一) 着眼大局, 奠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

1、坚持党的领导

奠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体现了民族团结平等的民族政策保障了各民族共同繁荣, 为我国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政治前提。在党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 我国跨境民族聚居区整体上保持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的安定氛围, 特别是与冷战后跨境民族现象造成许多国家战乱与动荡的态势相比, 我国被世界公认是跨境解决民族问题最好的国家。因此, 要坚持党的领导, 通过充分发挥好党在统筹民族工作各方面的制度优势, 积极探索出一系列与时俱进的民族政策, 使我国跨境民族群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其他成员一道, 一致团结

向前、共圆伟大梦想。

2、深化制度建设

奠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要深化制度建设。第一,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包括我国跨境民族在内的各族群众当家作主,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要确保国家治理与民族自治相统一,保障跨境民族聚居区内包括各民族在内的成员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共享发展成果。第二,要加强我国跨境民族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选拔一批思想坚定、政治过硬、能力突出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在我国跨境民族聚居区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第三,要持续推动我国跨境民族地区法制建设,依靠法律意识和法制思维处理跨境民族聚居区的事务,使我国跨境民族聚居区法治体系建设更加现代化、规范化。通过以上制度建设的深化,我国跨境民族地区治理能力进一步提高,为我国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一套行之有效长效机制。

3、营造良好地缘格局

奠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要营造良好地缘格局。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理念,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以来,我国与各邻国的关系的到进一步深化。在这其中,我国通过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在内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与周边各国一道共同打击利用跨境民族从事民族分离主义和极端宗教活动的行为;同时,我国通过积极协调双边合作,与邻国联合打击利用跨境民族的贩毒、走私、拐卖人口等犯罪行为,保障了我国跨境民族聚居区的安全稳定,为铸牢我国跨境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 立足优势,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

1、推进跨境民族聚居区经济繁荣发展

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关键在于推进跨境民族聚居区经济繁荣发展。我国跨境民族沿边境分布,这些地区大多地处偏远,自然条件欠佳。同时,跨境民族群体自然会自然产生比较心理,比较境外同源民族经济发展情况。因此,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大力推进我国跨境民族聚居区经济

发展,特别是要因地制宜,根据边境地区特点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好统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提升我国跨境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水平,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对内要根据边境不同省区原有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和各民族差异等,统筹兼顾好发展与安全、发展与保护关系^[6]。通过协调区域协作,依靠产业对接、人才共建、技术共享等举措,促进我国跨境民族聚居区产业发展升级与经济结构优化。对外,我国跨境民族地区要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扩大对外开放格局,利用与境外同源族群间相近语言相似文化的特点与便利,深度推进双边经贸往来。

2、加强跨境民族聚居区民生工程建设

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重点要在加强跨境民族聚居区民生工程建设上狠下功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下,近年来我国跨境民族聚居区医疗、教育、养老及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很大改善。要继续立足优势,持续推进我国跨境民族地区民生工程建设,我国跨境民族聚居区要继续实施好“兴边富民”等推动边境地区民生工程发展的各项战略举措,巩固好边境地区脱贫攻坚来之不易的成果,通过群众切身感受最深的民生工程增强跨境民族群体获得过幸福感,进而激发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增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认同。

(三) 凝聚共识,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1、深化我国跨境民族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观点的认识

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要深化我国跨境民族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观点的认识,特别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历史观、以及国家观认识并开展相关教育活动。通过深化我国跨境民族群体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认识,使我国跨境民族群体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民族的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观点、我们党和国家关于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妥善处理跨境民族问题的相关政策,正确看待跨境民族现象;通过深化我国跨境民族群体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认识,使我国跨境民族群体了解其马克

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立场和关于人类社会基本规律的科学理论。通过使我国跨境民族群体正确认识长期以来包括我国跨境民族群体在内共同抵御外来侵略,共同投身卫边戍边建设,共同缔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事实,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充分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由包括我国跨境民族群体在内的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旗帜鲜明的反对任何歪曲、否认历史事实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通过深化我国跨境民族群体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认识,使我国跨境民族群体领会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和观点,从而认识到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

2、动态整合我国跨境民族的文化格局

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要动态整合我国跨境民族的文化格局。“国家的长治久安离不开文化的繁荣昌盛,各民族间关系的团结稳固离不开对共同文化的归属和认同。”^[7] 我国的跨境民族聚居区,部分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可能滞后于对自身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也存在个别简单地把本民族传统文化同中华民族文化分割开来的实际情况。对此,要通过正确引导跨境民族群众坚持多元一体的文化发展理念,探索出一条使单一民族文化与中华主流文化整合的路径,大力培养跨境民族群体跨文化的吸收能力和整合能力。通过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理解、融合、共享,使我国跨境民族群体的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联系起来,通过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视角,充分认识本民族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动态整合我国跨境民族的文化格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厚植文化基因。

3、加强我国跨境民族群体“五个认同”

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要加强我国跨境民族群体“五个认同”,多渠道开展

民族团结教育。“五个认同”包括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8]。“五个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也是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主要内容。要在我国跨境民族地区依靠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灵活多样的活动持续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加强我国跨境民族群体对“五个认同”的认识进而宣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既要通过不同阶段的学校教育,深化对在校中小学、大学和职业学校等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中的跨境民族青少年群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在学校日常教育体系中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内容;同时要加强舆论引导,对“五个认同”思想通过报刊网络等各种媒体加以宣传,广泛构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舆论阵地。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N].2021-08-29(1).
- [2] 李学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跨界民族问题的形成与历史演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3(02):7-12.
- [3] 张强.警惕西方势力利用宗教因素助推“颜色革命”[J].科学与无神论,2018(03):23-28.
- [4][6] 王永莉.边境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J].民族学刊,2021,12(12):1-10.
- [5] 赵红伟.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8(01):20-25.
- [7] 乔志龙,滕驰.文化认同视域下的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固[J].新疆社会科学,2019(02):50-55.
- [8]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7.

【责任编辑:温开照】

关于推进广州市文旅融合发展的研究报告

——以“保护开发东江纵队抢救香港文化名人历史遗迹”为例

谭国戡

(广东南方软实力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25000)

摘要: 广州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 是多种文化的多元融合区, 文旅产业发展资源丰富, 历史遗迹众多且大部分保存完好, 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建设、接待成熟度均具优势, 利于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其中, 东江纵队营救香港特别行政区文化名人的相关历史遗迹众多。但目前广州市内关于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历史遗迹的旅游产品仍存在产品类型单一滞后、红色文旅资源分散、缺少整体区域宣传等问题。本文以保护开发东江纵队抢救香港文化名人历史遗迹为视角, 研究其保护与开发的现状, 逐一分析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相应的保护建议及对策, 推进广州市文旅融合发展。

关键词: 文旅融合发展; 东江纵队; 香港文化名人; 历史遗址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2-0102-07

一、东江纵队抢救香港文化名人历史回顾

抗战伊始和华南事变前后, 多数文化人士先后从内地疏散到香港, 并将香港发展成为当时抗日救亡行动的重要据点。日军占领香港之后, 抓捕了大量抗日积极分子, 许多文化人士亦在其中。当时因避难而困在香港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乔冠华、胡绳、夏衍等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有八百多人。这批中国的“精英”一度深陷虎穴、命悬一线。^[1] 情势急迫, 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局紧急电示南委(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和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 “要尽一切努力, 要不惜任何代价, 不怕困难, 不怕牺牲, 将困留在香港的文化界

人士、爱国民主人士、爱国抗日人士和国际友人营救出来”。^[2] 广东和香港党组织接到命令后, 以最快的速度研究并制定了周密可行的抢救实施方案: 一是确定营救对象, 并尽快与他们取得联系; 二是确定分陆路(东线)、水路(西线)撤退; 三是撤退路线分段、分区, 从港岛地区, 到九龙、宝安、惠州、老隆、韶关, 沿途均设立秘密接待站。沿途党组织和游击队还作了详细分工, 确保万无一失。这一场秘密大营救, 时间紧、任务重。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险阻, 克服重重难关, 成功营救了八百余名文化界爱国人士及其家属。主要参与实施这一场成功大营救行动的便是由广东党组织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即后来的“东江纵队”。本次大营救行动不仅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致电表扬, 更赢得国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 被称为是“抗战以来

收稿日期: 2023-01-12

基金项目: 2022 年度山西统战理论政策研究立项课题“铸牢我国跨境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2022SXTZ040)

作者简介: 谭国戡(1975-), 男, 广东南方软实力研究院副院长, 广州市政协第十三、十四届委员会委员, 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数字贸易纠纷专业委员会召集人, 广州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咨委会委员, 民盟中央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律师学院, 硕士生导师、兼职教授。

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最初起源于1938年成立的多支游击队，包括由曾生等人创立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王作尧等人创立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等。这些队伍在1939年4月至5月间接受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下辖的两个大队。1942年1月，根据中共南方工委的决定，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梁鸿钧任总队长，林平任政治委员。后来在1943年12月2日，中国共产党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基础上扩编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为便于辨识，本文统称为“东江纵队”。

保卫祖国、为民先锋是东江纵队队员们崇高精神的最好形容。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积极参与实施的大营救行动，保护了一大批祖国的文化精英，充分展现了东江纵队的爱国精神力量，彰显了共产党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与爱护，对一切抗日爱国知识分子以诚相待、患难与共。

回顾抗日战争时期这场大营救的伟大革命历程和感人事迹，重新探寻东江纵队抢救香港文化名人历史遗址及路径，旨在保护历史遗存，引导广大群众牢记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大意义，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

二、东江纵队抢救香港文化名人历史遗迹的保护与开发现状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应加强粤港澳大湾区文旅深度交流合作，共同开发旅游资源，发展高端旅游项目，建设人文湾区。广东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策源地，其中，东江纵队营救香港特别行政区文化名人的相关历史遗址众多，如：惠州的东湖旅店旧址曾是大营救中的秘密接送站之一，众多爱国民主人士与文化精英在其庇护下脱险，如今被称为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坐落在河源的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指挥部旧址也曾在大营救活动中发挥关键作用，具有革命纪念意义。此外，在广州、韶关、梅州、汕尾、东莞、

江门等地均有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的相关史料及遗址。详情如表1所示：

如下图1可知，广州市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其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条件为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相关遗迹的保护开发奠定了基础。广州关于东江纵队营救香港特别行政区文化名人的相关历史遗址众多，譬如位于广州市中山四路谈家巷2号之一的东江纵队交通站旧址。当时，为配合东江游击武装斗争，东江纵队从1941年开始在广州建立地下组织，后在如今的中山四路谈家巷2号之一建立地下交通站。此外，从化区等地方均有大营救的相关史料及遗址，如位于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北面约15公里处的吕田黄沙坑村的东江纵队从化大队活动基地、东纵北江机关遗址等。大营救相关遗址的保护开发

陆路	东线	香港—九龙—牛池湾—西贡镇—大鹏湾—惠阳游击区—坪山田心村。
	西线	香港—九龙—荃湾—大帽山—元朗—深圳河—水围村—梅林坳—白石龙村—坪山田心村。
	东线、西线在坪山田心村汇合后继续北上惠州—老隆（龙川）—韶关，再辗转到大后方桂林、重庆或苏北等地。	
水路	香港—长洲岛—汕尾或澳门，再辗转到大后方桂林、重庆或苏北等地。	

表1 香港特别行政区文化名人大营救路线

可促进广州市文旅产业进一步发展，而红色文旅全域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则有助于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充分发挥革命传统的积极作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三、保护与开发东江纵队抢救香港文化名人历史遗迹的现存问题

深挖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现有红色旅游产品的特点和东江纵队营救香港文化名人相关历史遗址的现状，发现在东江纵队抢救香港文化名人历史遗迹的开发与保护中，存在如下问题：

（一）红色旅游产品类型单一，乡村红色文旅发展滞后

有关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历史遗迹的红色旅游产品停留在类型单一的浅层次开发上，对红色精神的挖掘和当地特色内涵挖掘不够深入。大都为传统意义上的观光型旅游产品，容易让游客缺乏参与感和体验感，也比较缺乏创新点，使得游客体验不佳。而有许多极具地方特色和传统文化水平极高的红色文旅资源，因开发层次低，而无法形成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品牌。有关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历史遗迹的红色旅游，在旅游产品多样化、精品化、知名化方面，存在一定的进步空间。



图1：广州市红色文化发展布局图

（来源：《广州市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发展规划(2021-2025年)》）

除此之外，有关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的乡村红色文旅发展滞后。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的乡村红色文化旅游建设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收入占比远小于接待游客量占比，存在着前期投入大、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文旅建设人才缺失、地方特色不够突出等问题，不少革命遗址遗迹位于较偏远的山村或岛

屿，交通不便、人烟稀少。

因此，广州市红色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如何将行山路线、历史事件与史迹遗址结合，充分挖掘好红色村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文化、凝聚好乡村振兴的建设力量提供有利之机，是一大难题。

（二）区域间雷同与开发无序，红色文旅资源分散

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战斗足迹遍布许多地区，各地红色文化交流与旅游合作中的资源整合力度较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红色革命旅游产业的发展，各地区在红色文化交流与旅游合作中的资源整合和共享机制有待完善，红色革命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不够充分。

具体而言，行政资源整合力度较低，广州各区遍布着许多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红色旅游资源，分布情况不一，呈跨区域分布特征，开发时只注意“点”的利用，但忽视“线”“面”的整体开发，不利于红色旅游资源的整合。由于各区发展情况不一样，对于红色旅游景区整体规划较难达成一致，容易导致规划设计和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不协调、不一致。各区域在旅游线路规划上也容易产生分歧，导致各区域的红色景区相对独立，难以串联一体，缺乏整体性和发展性的科学规划，制约着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目前而言，存在着红色文化景点规划滞后、维护程序不规范、管理部门不明确、运营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因此，对于广州的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红色文化资源，如何进行有效开发、整合、共享，值得深思。

此外，由于地方对文创资源的无序开发和景点之间低价同质竞争，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的红色旅游还停留在“文物旅游”的阶段，“文化旅游”的开发还不够成熟，也尚未达到“体验旅游”的阶段。对于红色文化的内涵提炼还存在很大的不足，相关的历史背景挖掘不深，也缺乏革命人物、革命场景的塑造。

（三）缺少整体区域宣传，红色文旅交流流通性不足

与其他国内知名的红色精神品牌相比，广州的红色名片有待擦亮。以东江纵队营救香港文化名人

为例，其宣传渠道和营销模式也较为有限和老套。宣传无法“破圈”是导致文旅产业明明拥有较好建设优势却无法得到与之配套的经济效益的原因，文旅景区所在地的发展也因此受到一定制约。

目前，广州市各地区内的红色文旅资源共享程度低，红色文旅产业链尚未打通，即在红色文化旅游的交流与合作中未能充分实现人才、资金、资源有机结合，红色文旅大多停留在观光层面，缺乏文化挖掘和深度体验。红色文化遗产游径的旅游线路大多局限于走文化遗迹的模式。存在流于表面、缺乏特色等同质化问题，融合模式单一，求速轻质，导致红色文旅融合的文化价值缺失。红色名片的影响力有待加强，宣传和推广力度仍待进一步加大。

（四）旅游模式发展落后，未能与先进科技相融合

通过笔者走访调查，可以发现目前广州市关于东江纵队抢救香港文化名人历史遗址及遗迹的开发程度较低，多数仍停留在传统的旅游模式，没有对历史遗址及遗迹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导致现存的遗址浏览大多都只依赖观赏的模式，没有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相融合。再加之，陈年遗址未能得到保护和改善，基础设施不完善，游客的体验感、沉浸感较差，未能得到较好的旅游收获，游客的复游率较低。同时，宣传手段上也没有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宣传方式上，导致广州红色旅游的知名度较低。

四、保护与开发东江纵队抢救香港文化名人历史遗迹的建议与对策

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的相关红色文旅资源丰富，为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和红色景区的建设以及讲好统战故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广州文旅的深度交流合作上仍有可完善的空间。

（一）强化红色文旅资源整合机制，促进深度合作交流

要加快建立广州在红色文化交流与旅游合作中的资源整合和共享机制、合作机制，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协调有序的合作机制，发挥好各参与主

体在红色旅游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制定科学有效的方案，对各种资源进行整合，深度挖掘各种资源的开发潜力，促进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红色文化旅游产业的深度发展。通过连结香港与广州的文化遗产游径，将历史文化资源与人民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串联。同时，以广州文化遗产游径及特色旅游资源为依托，塑造独特的红色旅游线路，通过价值挖掘，强化香港和广州之间的红色文化遗产的关联性，增强红色文化交融性。以拓展红色文旅交流与合作，促进红色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共同塑造和丰富广州人文精神内涵。整合广州红色文旅资源，构建协同发展机制。

建立多主体、多层次、全方位的红色革命文旅交流合作格局。加强红色文化旅游重大项目和重要事项的紧密对接，建立红色文旅相关行业协会、企业间的区域合作机制，研究解决对接合作中的重大问题。要充分运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优势，整合广州旅游资源，增强红色文化旅游融合意识，链接香港与广州红色景点资源，提升综合效能和交流合作的整体水平，探索深度合作之路，共建旅游经济带。

（二）加大建设投入，疏通乡村红色文化旅游发展道路

在加强广州红色文旅资源整合机制的同时，做好乡村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相关的红色革命史迹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道路通畅、完善旅游基础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首先，加大建设投入，畅通乡村红色文化传承人才培养渠道，建设专业人才队伍。安排对接广州红色文旅人才建设的专项经费，加强对乡村红色旅游管理服务人员和服务人员培训，开展定期培训。通过提升红色景区管理人员的管理技能，增加宣讲人员的知识储备，提升红色旅游质量。

其次，在建设过程中要处理好红色文旅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坚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利用红色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保证村庄的绿色发展的方向不偏离。在推进乡村自然风光改造、自然资源利用的时候要秉持生态文明优先的原则，树立良好生态共建共享观念。

协调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坚持系统发展、可持续发展,坚持长远规划与短期建设相结合。

(三) 以点带面建设旅游路径, 打造广州红色文旅产业

广东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深入推进大湾区文化圈和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建设,吸引海内外游客前来领略科技之光、文明之光、时尚之光。”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广州应结合文化特点,以点带面建设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红色革命旅游路径,推出文化名人大营救红色文旅景点。通过规范文旅市场服务秩序,推动治理对接。建立公开透明的文旅市场准入标准和运行规则,打破行业、地区壁垒,加强规范制度对接,相互通报支持旅游业发展的政策、法规、规划、标准,加快建设无障碍旅游区。加强协调联动,实行广州旅游企业及从业人员诚信信息共享,加强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红色旅游市场安全监管和联合整治等。

将历史事件与史迹遗址结合,发掘更多革命故事。在发展红色旅游的同时,还可结合老区当地的其他特色资源,开发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等组合型旅游产品,共同打造一站式特色旅游品牌。亦可参考日前广州编制的《广州市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发展规划(2021-2025年)》,开发党团“红色之旅”精品线路,与旅游企业合作打造红色旅游、党团文化阅览专线。

(四) 转变传统旅游形式, 开展广州红色文旅深度合作

要着重提升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红色旅游资源的效益,可以从其旅游形式的转变入手。在保护革命旧址本身,保护革命旧址环境的前提下,将原有的以红色文物、史料的陈列展示、参观游览为主的“文物旅游”,开发转化为以体验红色年代艰苦生活、危机使命为主的“文化旅游”,采取情景式体验的旅游模式,寓教于乐、寓教于情,真正做到让游客在充满代入感的红色情景中感悟生活、体会红色精神,同时也达到休闲游乐的目的。结合当地自然人文景观,开发健康步径、越野线路、剧本杀开发、露营营地建设等体验型项目,结合目前露营、徒步

新旅游方式开发与爱国主义沉浸式教育。

以大别山房车露营公园为例,房车露营是紧跟时代潮流又吻合新县资源特点的新型旅游形式,与国家大力推进的休闲旅游相契合,正是红色旅游景区迫切需求的新业态。在大别山房车露营公园里,游客不仅可以体验到房车、露营等新兴的旅游方式,还可以感受红色旅游文化和当地风土人情,一举两得。截止到2022年3月,大别山红色旅游景区已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50多个考察团前来学习、调研。

正如上文所述,可以创新东江纵队营救香港文化名人相关历史遗址的开发建设形式,在深挖“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历史事件的革命内涵与红色精神深度的基础上,可将相关遗址密集、史迹史物留存丰富、具有独特人文、自然景观的地区作为“文化大营救体验旅游区”。根据史料与亲历者或其后代的笔述口述资料,在山林中重建大营救中极具特色的草寮招待所,将草寮招待所与露营地相结合,供游客参观与体验,体验大营救中文化名人在此生活的场景。举办定向越野赛,制定越野线路,吸引越野爱好者参与并宣传。根据大营救故事撰写开发相关剧本杀,可写圆桌决策类——设定人物身份为决策者与计划者,制定营救路线分配批次人员名单等,逃脱风险类——设定人物为逃难文化名人,将脱离敌人封锁与防守作为解密关卡,代入式体验当年的大营救过程。此外,可将东江纵队营救香港文化名人相关红色资源与广州其他分散的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红色旅游资源串联起来,将传统的红色旅游线路进行有机重组,增加其丰富性。同时要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区域合作,以建立区域合作为契机、在产品开发、线路安排、智慧旅游、宣传营销、环境保护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开发旅游精品路线、推出一批具有“大营救”文化特色的主题活动。

(五) 科技赋能纪念馆建设, 打造数字化沉浸式“红色+体验”项目

建设升级关于东江纵队营救香港文化名人的纪念馆,数字赋能场馆建设,将多种高科技技术运用到陈列展览中,实现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赋予历史鲜活生命。^[3]可以通过收集、调研选择观众所喜

爱的展览形式，还原历史情境，安排讲解人员生动描述、通过各种辅助设施渲染，让观众走近历史，感受真实的历史。利用科技的力量，让陈列品更好复原、再现，丰富观众的观感。同时还可以通过VR虚拟技术，让游客能够如临其境，感受到东江纵队营救香港历史文化名人的场景，与东江纵队队员们、历史文化名人们通过高科技技术，“穿越时空”进行面对面交谈。

在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影响之下，纪念馆也应保证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的基础原则，依靠新型的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来实现宣传方法的创新与转换，构建数字化博物馆，以此来打破博物馆的空间局限性。比如，在宣传手段上，建议运用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小红书等自媒体平台进行各类宣传活动，拍摄宣传影片，擦亮广州红色名片。

推动红色文旅融合发展，就要充分利用好广州的电子制造优势，推进可穿戴设备、物联网、虚拟VR、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红色旅游中的应用，在红色文化产品上注入创造性，对红色文旅资源进行数字化转化和开发。^[4]

（六）加强建设试点示范区，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根据《广州市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发展规划（2021-2025）》，当前广州市应当加强建设红色旅游试点示范区，加快建设有关东江纵队营救香港历史文化名人历史遗址的旅游试点示范区，为其他遗址推进红色文化旅游提供有效、良好的榜样，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带动全广州市的红色旅游发展。

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加强政策扶持力度，整合支持红色文旅发展的相关政策，探索放宽红色文化景区经营性限制。^[5]以高质量的“红色旅游吸引人、

红色精神感染人、融合产业留住人”的集聚效应，显著提升区域内游客满意度、红色文化影响力和旅游综合效益，使红色旅游融合发展持续向纵深推进。^[6]

五、结语

通过整合具有东纵精神的观光展览类、情景体验类文旅资源，持续深入发掘蕴含其中的东纵精神，以“旅游+”产业思维营造浓厚的东纵文化氛围，创新文化旅游营销方式，推广营救体验路线，全域激活红色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新动能。将东江纵队抢救香港文化名人事件的革命文化路径进行有效链接，构建红色革命史迹旅程，形成以东纵精神为核心的文旅品牌，促进广州红色文旅特色产业新发展，从而助力广州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加快建设，也有利于充分发挥革命传统的积极作用，弘扬革命文化，充分发挥革命传统的积极作用，讲好英雄故事，赓续红色血脉。

参考文献：

- [1] 肖毅.试论华南抗日武装——东江纵队的历史功绩[J].红广角, 2011(10):48-50.
- [2] 立波.东江纵队与香港抗战[J].党史纵横,2017(07):10-14.
- [3] 付豫珏, 蒋红霞, 雷蕾.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路径探析——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为例[J].经营与管理,DOI:10.16517/j.cnki.cn12-1034/f.20221013.002.
- [4] 广州市人民政府.广州市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发展规划（2021-2025年）[G]: 25.
- [5] 广州市人民政府.广州市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发展规划（2021-2025年）[G]: 30.
- [6] 吴若山.创新开展融合试点 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J].河南省文化旅游手机报, 2023:01.16.

【责任编辑：陈童敏】

从弘扬革命文化视域传承黄学增革命精神

俞 娟

(岭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48)

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弘扬革命文化用好红色资源,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黄学增是大革命时期广东四大农民运动领袖之一,与澎湃、阮啸仙、周其鉴齐名。黄学增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斗士,他积极组织开展广东地方早期党组织建设、农民运动和工人罢工等革命活动。黄学增在领导岭南多地革命斗争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大革命时期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革命的实践和理论的探索,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重大贡献。黄学增的一生短暂而光辉,他为革命事业进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充分体现出胸怀理想、勇于实践、探究真理、英勇斗争和无畏牺牲的伟大革命精神。从弘扬革命文化视域传承黄学增革命精神具有重要的新时代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革命文化;黄学增;革命精神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2-0108-05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1],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弘扬革命文化,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要部分,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2]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是宝贵的红色资源和精神财富,必须积极发掘和传承弘扬。1960年,周恩来总理来到湛江视察工作,提出要学习宣传湛江籍革命先烈黄学增同志的革命精神。1900年9月14日,黄学增出生在广东省雷州半岛上的遂溪县乐民镇墩文村的贫苦农家。他后来成长

为大革命时期广东四大农民运动领袖之一,与澎湃、阮啸仙、周其鉴齐名。^[3]1929年8月,黄学增在海口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9岁。革命先烈黄学增的一生短暂而光辉,他为革命事业进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国化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从弘扬革命文化视域传承黄学增革命精神,探究胸怀理想、追求真理、英勇斗争和无畏牺牲的伟大革命精神必将转化为奋进新时代引领新征程的强大动力。

一、胸怀理想

保持理想、信念之光永不熄灭是共产党人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的宝贵精神财富。邓小平同志说:“过

收稿日期:2023-03-23

基金项目:教育部2022年度人文社科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专项项目(22JD710018)、广东省2020年度教育规划项目(2019GXJK012)、岭南师范学院2020年度教改项目(2020(46))、2021年度科研项目(YB2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俞娟(1972-),女,岭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黄学增从小聪明好学有理想、有志气。早在乐民高等小学读书时，黄学增就写下《竞争说》一文，十分推崇竞争精神。他认为：“人当竞争时代，断不可无竞争心。无竞争心不能立于竞争世界，竞争乃当今之要务也。学问以竞争而精，实业以竞争而兴，国家以竞争而文明。世界愈竞争，愈发达；愈发达，愈竞争。人无竞争，诚不能立于竞争世界，能竞争，乃可以言富强。”^[4]黄学增胸怀崇高的革命理想，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熏陶。1920年夏，黄学增考上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彼时广州正在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校学习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先后加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很快发展成为主要成员。1921年6月，黄学增入读广东省宣讲员养成所，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广东省宣讲员养成所先后由陈独秀、陈公博主持，由谭植棠任教导主任，宣讲员养成所是以“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为办学宗旨的机构。在宣讲员养成所学习期间，黄学增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广东中共早期党组织32名共产党员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黄学增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加入国民党，成为跨党党员之一。1924年7月3日至8月20日，黄学增入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农讲所第一届成员，时任所长就是后来被誉为“农民运动大王”的澎湃。讲习所旨在培养农民运动的指导人才，使之可以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在农讲所里，黄学增集中学习了“本党主义之解释”、“国民革命的基础知识之灌输”、“农民运动之理论及其实施方法”、“集会结社之实习及宣传之训练”、“军事训练”等教学内容，期间还来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参加了为期10天的军事训练。黄学增在宣讲员养成所学习期间，接受过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等人的教导，在农讲所学习期间聆听过孙中山、廖仲恺、鲍罗庭、谭平山、澎湃等人的训导。^[5]这些珍贵的学习教育经历，对其确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影响深远。

二、勇于实践

毛泽东指出：“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了解、勇于投身理论指导实践的运动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黄学增注重将革命理论积极贯彻到革命实践中去，组建社团组织、协会等，不仅使得理论有了立足土壤，且有力推动了实践的发展，体现了勇于实践的精神品质。

1. 积极组建多个马克思主义青年社团组织。

1922年夏，黄学增回到家乡敦文村，秘密组织“雷州青年同志社”，发动群众反匪反霸，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活动。成立民间社团“雷州青年同志社”，是为在乡村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此推动农村变革，这是在中国乡村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早尝试。社里聚集了不少雷州籍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后来成为广东南路党组织及农民运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对广东南路后期不少革命活动产生较大影响。1923年，黄学增在广州以同学会名义组建“雷州留穗同学会”，团结雷州三县在穗读书的青年们学习党的理论和军事革命理论，壮大了革命力量，团结了志同道合者。1925年9月，黄学增与邓颖超发动在广州的“雷州青年同志社”联合新学生社、香港学生联合会、香港青年社等团体组成革命青年联合会，邓颖超当选为主席。同年10月，黄学增等同志组织“广东、高雷、罗阳、钦廉、琼崖八属旅省革命团体联合会”，组织旅穗革命青年随国民革命军南征，参加各类国民革命活动，协助革命军工作。

2. 组建广东地方早期党组织和农民协会。黄学增从农讲所毕业后，以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被派到花县等地负责组建地方早期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等革命工作。因工作能力十分出色，获得上级嘉奖。在黄学增等人努力下，花县等地方早期党和农民协会纷纷成立，大大推进了当地的农民斗争。1924年底，黄学增来到宝安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推动开展宝安县农民运动，在宝安地区创建早期党组织，1925年7月中旬，中共宝安县支部成立，黄学增任书记，

培养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他深入宝安县沙井、松岗一带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组建早期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在宝安地区播下革命火种,为后期开展革命斗争打下良好基础。^[6]

3. 指导省港大罢工运动。1925 年 5 月 30 日,上海五卅运动爆发。6 月 2 日,黄学增在广东大学操场主持召开被视为吹响省港大罢工号角的“援沪工人惨案”大会。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6 月 19 日,省港大罢工运动全面爆发,苏兆征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7 月 3 日,黄学增与廖仲恺、邓中夏、黄平等人,受聘为省港大罢工委员会顾问,负责指导省港大罢工斗争。在党的领导下,黄学增作为省港大罢工委员会最高执政机关核心成员之一,组织领导、团结指挥工人们积极开展有计划、有策略、有战术的革命运动,省港大罢工前后坚持 16 个月之久,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对香港经济的操控,保障了广州的金融安全。

三、探究真理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是无数共产党人的终生追求。黄学增是中共早期理论工作者,他积极探索、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撰写过多篇理论文章,并用来指导革命斗争实践,体现了探究真理的革命精神品质。

1. 中共理论刊物《红旗》的特约撰稿人。1928 年 4 月,黄学增与周恩来、叶挺、朱德、苏兆征、邓中夏等人受聘为中共理论刊物《红旗》的特约撰稿人,要求按期为中共理论刊物《红旗》供稿,切实为全省工农兵革命运动提供理论指导。1929 年,黄学增先后在《红旗》第 15 期、16 期公开发表《五卅运动后广东农民运动的状况》和《省港罢工时代之广州四郊农民》两篇指导农民运动的理论文章。文章分别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开展情况,指出土地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需要继续深入开展,并强调发挥工农联盟的重要性。^[7]

2. 为《高州民国日报》、《学习》半月刊等报

刊撰稿。1926 年 12 月 24 日,在《高州民国日报》副刊《高潮》上发表《读宫俊先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后》,文中指出共产党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与无政府主义完全不同,提出共产主义的实现途径,并立场坚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解放的先锋队,文章表达了他的革命理想信念,显示出他高超的理论水平。

1929 年,黄学增在《学习》第 4 期发表题为《盲动呢?不动呢?公开呢?秘密呢?》的理论文章,对琼崖党组织的思想路线和斗争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在《学习》第 5 期发表《阅了农民问题决议案以后》一文中,根据广东情况,结合自己多年从事农民运动的体会,对党的“六大”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和农民问题决议案表示“完全接受与拥护”,并对土地关系、农民斗争、游击战争策略、土地革命政策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意见。

3. 关于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1926 年 4 月,黄学增主持并在深入开展农村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 35000 多字的《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长篇调查报告,连续发表在《中国农民》第一卷第 4 期和第 5 期。报告详细介绍了广东南路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农民运动等状况,这篇报告全景展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广东南路农民的社会生活状况。1926 年 10 月,黄学增在《人民周刊》上发表《为电白农民求救》,揭露电白县土豪劣绅、地主民团等的罪行,要求惩办他们,解散不法民团,并取消一切苛捐杂税、赔偿农民损失等,明确表达了斗争立场,坚决打击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以及切实维护农民根本利益诉求。

四、英勇斗争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彻底“改变世界”,改变“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现状,无数革命先烈和共产党人不屈不挠,敢于斗争、勇于胜利。作为早期共产党员,黄学增全面领导了广东南路 15 县 2 市的农民运动,还组织领导了广东西江和海南岛的革命武装斗争,是海南岛

红军和琼崖苏维埃政府的早期创始人，体现了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品质。

1. 全面领导广东南路农民运动。黄学增作为广东南路革命斗争的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为广东南路农民运动奠定了坚实的革命基础。当时广东南路劳苦大众深受帝国主义、军阀、土匪、劣绅土豪等多方势力的压迫，生活异常痛苦。1926年3月至1927年3月，黄学增担任担任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主任和中共广东南路地方委员会书记（1927年1月），全面领导以农民运动为中心的广东南路15县2市的革命斗争。黄学增就任后，迅速组织开展各项工作。一是农会建设方面，着手筹备、规范、改组南路各地农会工作，建立起广东南路多地农民协会，至1926年底，南路地区农会会员发展到12万人左右；二是农民自卫军建设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三是宣传教育方面，通过开办学校、讲习所和补习班，接办改组《高州民国日报》和增设副刊《高潮》，加强宣传教育革命思想，培养农运骨干；四是组织建设方面，发展当地中共组织，吸收发展优秀人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发动南路群众成立青年同志社、妇女解放协会等社团组织；五是组织领导南路人民废除各类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斗争；六是主持并深入开展南路农民社会调查活动，发表长篇社会调查报告《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在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作《南路办事处会务报告》，撰写并发表文章《为电白农民求救》等。

2. 领导广东西江革命斗争。1927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公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到处屠杀残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先后在上海和广州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西江重镇肇庆发动了四一六反革命大屠杀，使地处肇庆的革命组织机构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共产党人、工农骨干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4月19日，在危急时刻，广东区委巡视员黄学增以杉木商人身份，秘密赶到高要县禄步黄洲村，向设在当地的原西江党组织负责人以及有关农军骨干同志传达广东区委准备发动武装暴动的指示。组织决定重建中共西江地委领导机关，以加强对西江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由黄学增担任地委书记，同时成立“广东省西江拥护武汉政府大同盟农军”，设立临时指挥部，由黄学增担任总

指挥，领导全区的武装暴动。4月下旬至8月底，中共西江地委统一领导并发动了西江地区最大规模的肇庆起义和郁南都城、罗定横岗等农军暴动。同年9月，根据广东省委的暴动策略及组织安排，将中共西江地委改为中共西江特别委员会，由黄学增担任西江特委书记，并成立军事委员会，由黄学增担任军委主席，主要负责指挥西江下游系列武装暴动。1928年1月，西江特委机关从高要县迁至广宁县，2月在螺岗圩发动武装暴动。此时西江地区农民的武装暴动对于有效牵制桂系和粤系新军阀部队，发挥较大作用，并积极策应南昌起义军南下，声援配合广州起义，有力打击了西江地区反动势力的统治，点燃了西江两岸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热火。^[8]

3. 领导琼崖革命斗争。1928年春，周恩来指示广东省要作好武装割据琼岛准备。琼崖“五月暴动”打响后，革命力量损失很大。危急时刻，黄学增被省委任命为琼崖巡视员，赶赴海南岛力图恢复革命力量，继续开展革命斗争。1928年6月16日，黄学增抵达地处乐会县第四区阳江圩的琼崖特委，前后历时一个多月时间，深入乐会、万宁等县区乡了解具体革命情况，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改组特委（黄学增任特委书记），并成立琼崖苏维埃政府。整顿琼崖红军，将红军司令部改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健全红军建制，统一番号，扩充兵员，加强军械局建设，保证弹药供应。经过艰辛努力，琼崖革命力量终于渡过难关，使党组织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红军人数达到3000多人，并开辟了多个武装根据地。1928年11月，黄学增在香港出席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被选为候补常委。会议决定把南路和琼崖两个特委合并，改称南区特委，黄学增出任书记。1929年1月底，黄学增当选中共广东省委常委，5月26日，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重返海南指导琼崖工作。1929年7月，因叛徒出卖，黄学增在海口被捕。

五、无畏牺牲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

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9]。我们要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黄学增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斗士,他不怕艰险,无畏牺牲。在其革命斗争生涯中,他被法国殖民政府、国民政府通缉过,被土匪绑架过,被地主武装民团追杀过,但他初心不改,意志愈坚。1926年6月,在从梅菪前往雷州的路途上,黄学增不慎被土匪劫持,之后脱险,他大无畏地表明:“在梅菪早已知道有土匪的,不过为着党和农民的利益,不得不去,而且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人,时时是准备牺牲的,故大胆地绝不畏怯”。^[10]1929年7月,因叛徒严腾蛟出卖,黄学增在海口市福音医院被捕,他在监狱中坚贞不屈,始终严守党的秘密,视死如归。时任琼崖实业专员的军阀黄强,是黄学增就读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时的校长,试图对其“劝降”,但黄学增丝毫不为所动,掷地有声地声明:“我是共产党员,相信共产主义能够胜利,感到能够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是无上光荣的事。今日被捕,要杀便杀,学增生不能再为革命多做点事,死也要死得清白坚贞!”^[11]8月12日,黄学增在海口英勇就义,年仅29岁。黄学增以不畏牺牲的精神品质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传承。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国家强。进入新时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我们学习研究先烈们为革命事业英勇奉献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有助于凝心聚力、攻坚克难,激发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智慧和力量。我们要以落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12]为契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深入了解包括黄学增在内的无数革命先烈的革命精神,传承其红色革命文化,战胜前行道路上各种风险和挑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 [1][1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人民出版社,2022:43.44.
- [2]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8-01-06(001).
- [3][11] 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4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67.188.
- [4] 陈国威.黄学增评传[M].北京:新华出版社,2020:12.
- [5][10] 陈国威,徐冰.黄学增年谱[M].北京:新华出版社,2021:33-37,110.
- [6] 高良坚.论黄学增对深圳、肇庆、花都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主要贡献[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No.72(03):74-78.
- [7] 窦春芳.与彭湃齐名的农运领袖黄学增[J].党史博采(纪实),2013,No.406(07):28-31.
- [8] 黄少杏.一处尘封88年的中共西江地(特)委机关驻地遗址[J].红广角,2015(03):46-47.
-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外文出版社,2022:7.

【责任编辑:温开照】